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 目 录

### 专 论

- 3 理查德·萨克瓦 / 超越世界秩序的冲突

### 欧亚地区：空间、身份与政治变迁

- 28 封 帅 / 世界历史中的欧亚空间——源起、建构与衰朽
- 73 朱永彪，魏丽珺 /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评析
- 108 孙 超 / 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 141 石 靖 /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 169 汪金国，陈亚州 /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冯绍雷

副 主 编：陈大维（常务）

刘 军

本期执编：张 昕

封面设计：王 洪

####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021-62233816；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9 年第 5 期 ( 双月刊 )

## Оглавление

### ***Р. Саква***

Конфликт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мир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3)

### ***Фэн Шуай***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развитие и упадок ..... (28)

### ***Чжу Юнбяо, Вэй Лицзюнь***

Анализ влияния Китая,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73)

### ***Сунь Чао***

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создание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108)

### ***Ши Цзин***

«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й конфликт сепаратизм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 (141)

### ***Ван Цзинго, Чэнь Ячжоу***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Монголией 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169)

#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9 年第 5 期 ( 双月刊 )

## Contents

***Richard Sakwa***

Beyond the Clash of World Orders..... (3)

***Feng Shuai***

Eurasian Space in World History---Origins, Construction and Decay..... (28)

***Zhu Yongbiao, Wei Lijun***

Assessment of Influence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 (73)

***Sun Chao***

Informal Institutions, Construction of Centralized Stat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entral Asian Politics.....(108)

***Shi Jing***

“Confederation of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and Regional Separatism Conflicts in the Post-Soviet Era..... (141)

***Wang Jinguo, Chen Yazho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 and the SCO: A View of National Identity..... (169)

## 专论

## 超越世界秩序的冲突\*

理查德·萨克瓦\*\*

**【内容提要】**国际体系是一种由“基本制度”和“次级制度”组成的双层结构。在这个模型中，上层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制度和国际法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下层的国家主权；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权力政治仍在上演。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诞生于模型的下层，后借普遍主义之势扩展到全世界，如今却以上层的国际社会自居。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它在思想、规范、政治经济和权力等四个层面上都变得激进化，这使它与外部秩序的接触愈发艰难，甚至催生了欧盟的价值论政治。俄罗斯希望加入转型后的旧西方世界，但是遭到拒绝，最终陷入“安全困境”和战略死胡同。这种结果迫使它转向新修正主义立场，与中国等新兴力量联合，共同维护国际社会的规范原则，同时反对霸权行径，批评西方的双重标准。未来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反霸权联盟也面临新的挑战。

**【关键词】**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 国际社会 大国政治 俄罗斯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5-0003-(25)

\* 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出自 Richard Sakwa, *Russia against the Rest: The Post-Cold War Crisis of World Ord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尤其是该书第二章。文章的较早版本曾发表为 Richard Sakwa,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lash of New World Orders”, 收录于 *Multipolarity: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ed. Peter W. Schulze (Frankfurt/ New York: Campus Verlag, 2018), pp.27-51. 目前的版本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一次基地重大项目（于滨教授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讨论会后形成的。感谢萨克瓦教授授权本刊发表其中文译本。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的国际格局与中俄关系：传统、现代与未来”（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2）的阶段性成果。

\*\* 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 1945 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基础上建立的两极体系，确认了当时的权力均衡格局。虽然“代理人战争”在世界范围内不断上演，但是两极体系在这个格局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子体系，确定了欧洲核心地区的势力范围。在此之后，二战后的安排中形成了一组“游戏规则”，为欧洲超过一代人带来了某种形式的和平。这个秩序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它重新为欧洲国家体系引入了主权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 1975 年 8 月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中得到确认，而其中关于人权的“第三条款”(Third Basket)开启了超越体系的进程。这些内容又在 1990 年 11 月的《巴黎宪章》(Paris Charter)中被进一步明确阐述。该文件虽然强调一个“统一而自由的欧洲”，却又在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它虽然再次宣称所有欧洲国家拥有平等主权，但并没有对大国政治的现实做出任何规定。它导致了这样一个在理论和严酷现实意义上的“无人区”，而在“冷和平”的年代，即从 1989 年冷战终结到 2014 年所谓“新冷战”开始，欧洲一直处在这个无人区里。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扩张引发了一个经典的安全困境，即一国提升安全之举会刺激另一国做出防御性的反应，开启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sup>①</sup>

北约扩张就是一个“过度制衡”的显著案例：北约感受到来自一个或将复兴的俄罗斯的威胁，这促使它采取一系列先发制人的举措；这些举措最终制造了潜在威胁，而这却是北约最初的制衡举措想要抵消的。反过来，俄罗斯也感到自身面临威胁，于是采取对抗措施进行回应，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邻国对俄罗斯威胁的感知，最终影响到整个大西洋联盟。<sup>②</sup>从现实主义的观点看，这一轮新的对抗是不必要的。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头二十年里，俄罗斯并没有挑战美国的首要地位，甚至没有挑战大西洋安全体系，而是试图寻找一条能够兼顾多方安全利益的途径。但是到头来，合理的方案并没有出现。俄罗斯的反抗最终使北约采取霸权政策，包括使用各种新遏制手段，使其陷入了战略死胡同。这种情况促使俄罗斯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组建一个反霸联盟(alignment)，致力于建构一种反对一元秩序的多元主义的国际体系。

---

① 经典论述参见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Andrej Krickovic, “Catalyzing Conflict: The Internal Dimension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May 2016, Vol.1, No.2, pp.111-126.

## 国际体系

根据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思想，国际体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双层结构。形象地说，它是一座双层建筑。上层是发展中的全球治理工具和进程（英国学派称之为国际社会的“次级制度”，secondary institutions），它的顶端是联合国，再加上不断分支生长的由国际法和规范期望所构成的网络。英国学派还区分了国际社会中的各种“基本制度”（primary institutions），包括主权、领土、均势、战争、国际法、外交和民族主义，这些元素诞生在欧洲，后来被扩展到世界的其他地方。<sup>①</sup>所谓的“次级制度”不仅包括联合国，也包括那些寻求在多元的国际体系中增进团结的其他实体。<sup>②</sup>它们涵盖国际金融治理制度，最初是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涵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它们当中也有关于法律和环境的国际公约，以及那些涵盖战争规则和国际人道主义实践的国际公约。这些次级制度根据定义是普遍适用的，而基本制度则产生排他性实践，西方核心会将自身的“文明标准”强加于人，并充当守门人的角色，这在殖民主义的环境下表现得尤其明显。<sup>③</sup>

尽管大部分的次级制度最初来源于西方，但它的发展从一开始更多是受到共同章程的管理，而不是一味地扩张。<sup>④</sup>例如，联合国的建立不仅来源于各种西方传统，也来源于苏维埃、伊斯兰和其他的思想。随着次级制度的强化，并真正变得更加普遍，它威胁到了自以为是常态的西方霸权模式，同时也为这种霸权消亡后的秩序提供了支撑。英国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从国家、领土、均势、外交和主权等制度中演化而来的，它形成于欧洲，又先后通过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革命扩散到全世界，从而成为真正普遍的存在；而国际

---

①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② Barry Buz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Polity, 2014, pp.32-36.

③ 参见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④ 这种观点被多位作者阐述，其文章见于 *The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eds. Tim Dunne and Christian Reut-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社会的很多制度是在二战期间由盟国创立的，反映的是西方价值，并且最初是相对排他的。倘若我们不去挑战这种谱系分类，那么应该注意到，从一开始，一种普遍主义的动力不仅嵌入了国际社会的基本制度，也嵌入了次级制度的顶端，后者从那以后便被归结为“全球治理”的制度，并且被越来越多地阐述，其权威也日渐增长。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经典著作《无政府社会》（*The Anarchical Society*）强调国家关系中合作和规制的元素，突出跨国思想产生规范和利益的方式，这些规范和利益以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形式被制度化。<sup>①</sup>他显然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上”，而是在“这些国际组织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国际社会的制度”中，发现了“存在于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的基本成因”。<sup>②</sup>布尔的论述保留了相当多有关国家中心型世界的传统思维，但是他的另一种观点调和了这种思维，即国家存在共同利益，国际社会的合作制度能够最好地促进这些共同利益。<sup>③</sup>这些制度就是普遍主义和国家间合作的架构，它们在二战以后逐渐延伸发展起来。<sup>④</sup>而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国际社会”一词，它是对全球治理制度的一种广义的概念化总结。冷战结束后，人们期望这些制度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性和实质内容。但是事实却相反，随着冷战的两极格局让位于单极格局，这些制度仍然笼罩在大国政治的阴影之中。

由这里，我们来到第二个层级，或者说是我们理论建筑的底层。在国际社会的团结表象之下，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世界秩序。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诞生于 20 世纪早期，后来被伍德罗·威尔逊阐述为一种基于大西洋体系的普遍秩序。二战后，它被描述为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冷战期间，它遭遇苏联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模型的抗衡，这种模型是基

---

①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1995. For a recent analysis, see Buzan, *An Introduction*.

②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pp.xvii-xviii.

③ 相比赫德利·布尔，对国际社会不那么国家本体论式的表述参见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④ Anne-Marie Slaughter,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一书认为，存在一个由“政府间网络”所组成的密集网络系统，对跨国合作起到越来越多的协调作用。

于社会主义对资本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超越性主张。我们也可以认为存在其他类型的世界秩序，包括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定义的“第三世界”。不过，世界秩序的杰出方案是大西洋共同体，以及范围更广但愈发过时的所谓“西方”。在英国学派的早期论述中，由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发轫于欧洲，连续波浪式向外扩张，直到覆盖整个世界。这确实是一种“扩张”，将一个体系进行扩展，以至于怀着特殊矛盾心理的俄罗斯很快便被囊括在其中。<sup>①</sup>然而，原始的扩张模型是基于一种单层体系，随着“次级制度”的发展，以及它所涉及的在实际问题（比如环境）上分享主权，这种单层设计的模型已经变得不再适用。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是在这第二个层级上出现的。它在今天的主要替代者，是由俄罗斯、中国和一些与之联合的国家所组成的反霸权联盟。这个替代联盟的本质，并不是要照搬国际社会顶端的规则和规范，而是要否定这个部分中（以任何形式）“从属于”美国主导的秩序。与美国主导的体系相比，这个反霸权联盟并不缺乏规则基础，而且在某种形式上要做得更好，因为目前它还不具有美国那么大的权力，以至在它的规则中强加例外。要理解这个世界秩序的替代模型，有三点至关重要：第一，它并不是重回原始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主义，因为它始终坚持国际社会的各种制度所产生的规则。第二，它是“反对”霸权（“anti”-hegemonic）的，而不是“对抗”霸权（“counter”-hegemonic），因为它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单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所谓的“秩序”）能够将其特殊的价值和权力结构强行推广为普遍的存在。它不单是一次反对传统上被称为“西方”的国际秩序的运动，而是希望超越秩序竞争的思维，建立一种合作性更强的全球秩序，符合其自身有关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第三，它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一个集团，或任何其他更具实质意义的组织形式，即便在它内部确实包含那些凝聚力大幅提升的实体，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所组成的金砖国家（BRICS）。这种联合也能够反映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本质，即一个权力和规范体系的结合体。规范具有根本的重要地

---

<sup>①</sup> Iver B. Neumann, “Entry in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conceptualised: The Case of Rus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1, Vol.37, No.2, pp.463-484.

位，尽管有的美国总统强调它的某一个方面甚于其他。例如，相对于保持美国“首要地位”（primacy，一个容易相互矛盾的名词），巴拉克·奥巴马更关注促进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民主，这种立场是对美国主导地位的一次重要的再定义。<sup>①</sup>

##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四重激进化

1989年后发生了一次激进转型。世界秩序的苏联模式，连同它的理论基础一道瓦解了。就在那时，在嵌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并保留共产党领导的框架之下，中国正在开启它的卓越转型。共产主义秩序在苏联的瓦解，使得冷战以及国际关系的雅尔塔体系走向了终结。到1991年底，苏联已经解体，一个极度虚弱的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继承了它的衣钵。俄罗斯似乎将不再处于世界秩序模型的中心，它在后共产主义的未来年代所依赖的，反而是成为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在俄罗斯的领导层中，很多人怀有这种渴望。然而，关于俄罗斯融入该秩序的条件和模式并没有商量的余地，反倒是被假定好的，正是这种情况制造了紧张和误解，最终引发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破裂。

伴随着冷战结束时的明显“胜利”，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四种形式发生了激进演化，每一种形式都对应着一种世界秩序的经典模型。第一种是黑格尔式的，其中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叙事被再次倒转，回到了理想主义的方向上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宣称自己是世界秩序唯一可行的模型，是人类必将面对的未来——除了某些坚持专制独裁的顽固派。这是历史终结论的思维，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关于全球化的简单化模型。它将一组特定权力和思想的规则规范吹嘘成是普遍适用的。

第二种是康德的版本，人权和某种共和的理想通过愈演愈烈的、资金充足的民主促进项目得到推动，这些项目时而摇身一变，成为赤裸裸的策动政

---

<sup>①</sup> 2018年4月26日，杰弗里·曼科夫（Jeffrey Mankoff）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举办的基地重大项目会议上发表的观点。本文内容也是在本次会议期间首次得到展示。关于他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分析，参见 Jeffrey Mankof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权更迭的政策。照此解读，1975年8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第三条款”成了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的基础。人权与国际政治密不可分地绑在了一起。<sup>①</sup>它的结果之一便是，美国主导的秩序将其自身嵌入了与国际社会的某种监护关系之中。<sup>②</sup>这有助于解释美国对联合国的规范权力和现实权力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联合国依然是制裁国际干涉行为的唯一合法实体，由此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

从这里引出了第三点，即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所说的“当前政治形势”（present political conjuncture）。世界秩序的形态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更广泛变化有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种框架下，我们需要思考当下时代的“后革命”特征。早在戈尔巴乔夫开始他那大胆的、在一千国内批评者看来不负责任的举动，企图将改革由共产主义的手段特征变为它的本质属性之前，以解放人类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就已经开始了大退潮。随着二战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宣告结束，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8月抛弃美元锚定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向浮动汇率，战后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共识开始瓦解。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世界迈向金融自由化，而1979年5月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当选标志着——正如1978年9月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所言——“劳工的前进”（Forward March of Labour）停下了脚步。<sup>③</sup>1980年11月罗纳德·里根的当选进一步表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攻势和地缘政治攻势已经发动。就在这里，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浪潮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劳动的属性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公民权利的理解。如此看来，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似乎最终胜过了他的

---

① 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文献作过论述。近期出版的带有介绍性质的佳作，参见 Franke Wilmer,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5. 亦参见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Essential Readings* (eds. Rhonda L. Callaway and Julie Harrelson-Stephen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7) and Daniel P.L. Chong, *Debating Human Right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4.

② 讨论之一参见 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Order and Imperial Ambition: Essays on America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Cambridge: Polity, 2004.

③ Eric Hobsbawm,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Marxism Today*, September 1978, pp.279-286.

批评者，而他在培勒林山学会（Mont Pelerin Society）的同事们则四处奔走，征服了世界。<sup>①</sup>

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的衰落，似乎象征着一种现存秩序的自然、无可避免的失败，及其替代者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的奇谈狂论会引发如此的共鸣<sup>②</sup>，为什么“全球化”成为1989年之后流行的意识形态。在那之前，很少有人提到过“全球化”这个词语，但是自那以后，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时期统领一切的组织概念。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全球化假定国家在内部退却，而跨国进程和跨国企业在全局层面获得赋能。技术和劳动形式的确正在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惠及那些真正从事劳动的人，大部分利益归中间商（通过外包）和处在社会最顶层的1%的人所有，而工人乃至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已经有30多年停滞不前。<sup>③</sup>工人们被规训了，劳动过程发生了转变，沦为全球市场上对竞争力的明码标价。

最后是第四种模型，我们可以将它归结为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第四个层面，权力被行使，军事力量被部署，集团法则被强制实施。俄罗斯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之间打入“楔子”——这种恐俄心理持续存在，并被反复强化。美国以嫉妒之心维护它的“首要地位”，这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也体现在它的盟友体系内部，并且始终要求这个共同体分担更大的责任。

简言之，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于四个层面——思想层面（若非意识形态层面）、规范层面、政治经济层面和权力层面——正是这种层次和复杂性使得该秩序如此富于变化、充满力量并最终具有吸引力。恰如

---

① 关于其中最有力同事中的两位——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以及整个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扎实有力的绝佳研究参见 Nancy MacLean, *Democracy in Chains: The Deep History of the Radical Right's Stealth Plan for America*, London: Scribe, 2017.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Vol.16, pp. 3-17. 更长篇幅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③ 有力的阐述参见 Thomas Piketty and Arthur Goldhammer,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伊肯伯里（Ikenberry）和德德尼（Deudney）的著名论断，要加入这个秩序容易，离开它却很难。<sup>①</sup>正是这些特质使得它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变得十分艰难，这一点至关重要。试问，如此具有活力、权力和吸引力的体系，何必要在平等的位置上与其他秩序进行接触呢？对于这种现象，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在欧盟与其邻国尤其是俄罗斯的关系中作了充分描述，他认为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基于外交和妥协的“国家间”关系，而是一种扩大欧盟的规范影响力范围的单边进程。<sup>②</sup>这催生了一种“价值论”式的政治，本人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有过论述，它的基础是否定“政治”属性作为外交实践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更不必说否定一种国际参与的各方在接触中求变化的变革式对话关系。<sup>③</sup>

### 冷和平与世界秩序：霸权 vs. 多元主义

关键在于，外部国家很难制定适当的政策来应对这个四重的世界秩序。如果政策在某一个层面遇到挑战，反应可能会在别的层面出现。这引发了俄罗斯对“双重标准”的谴责，但更恰当的说法可能是“四重标准”。站在西方的角度，同时在这四个层面上做出行动并没有什么异常。“软实力”的概念就是将整个体系进行理论化的一次尝试，它在理论上不能自洽，但在政治上十分有力。在这个意义上，约瑟夫·奈（Joseph Nye）（该词语的发明者）的说法相当正确：软实力实际上是西方国家的特定专属，无法被别的国家付诸实践，中国和俄罗斯类似尝试只会引发嘲弄和谴责。<sup>④</sup>文化外交及其相关实践不同于软实力，后者（根据奈的定义）是霸权国家的独有特征。而这种概念混淆被中俄联合的反霸权特性放大了。

---

①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Myth of the Autocratic Revival: Why Liberal Democracy will Prevail”,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9, Vol.88, No.1, pp.77-93.

② Sergei Prozorov, *Understanding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 The Limits of Integr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③ Richard Sakwa, “Europe and the Political: From Axiological Monism to Pluralistic Dialogism”, *East European Politics*, 2017, Vol.33, No.3, pp.406-425.

④ Joseph S. Nye, “What China and Russia Don’t Get About Soft Power: Moscow and Beijing are Trying Their Hands at Attraction, and Failing – Miserably”,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13, Vol.29, <http://foreignpolicy.com/2013/04/29/what-china-and-russia-dont-get-about-soft-power/>

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挑战。以苏联体系为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替代模型崩溃后，俄罗斯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旋即回归戈尔巴乔夫时代知识分子所谓的“历史主干道”。<sup>①</sup>事实证明，历史既有很多主干道，也有很多偏僻小路。冷战结束时，俄罗斯渴望加入“旧西方”(Historical West)，但它相信自己的加入将改变其特征，使其转变成一个“大西方”(Greater West)。俄罗斯声称自己是国际社会资深的基本成员，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并试图以此撬动旧西方秩序的转型。在继承戈尔巴乔夫的遗产方面，莫斯科认为自己比旁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以结束那场在它看来愈发徒劳无益的冷战，因此它理应在重新组建的大西方中获得某种特殊地位。苏联集团的自愿解体，代表着莫斯科的诚意宣誓，希望加入扩张后的西方秩序。这种想法也适用于区域层面：“共同欧洲家园”的理念（今天被称为“大欧洲”[Greater Europe]）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合作性的泛欧洲共同体。然而，莫斯科被实际给予的是既有组织——旧西方，以及欧盟所代表的小范围欧洲——的客座会员资格。出于历史、身份、地理和安全等原因，这种类型的会员资格无法令俄罗斯方面接受。莫斯科不会为了加入旧西方，而走进某种新殖民主义的学徒制中。正是从这个基础性的分歧上，涌现出了其他所有的矛盾。

为什么旧西方拒绝自我转型并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原因很好理解。它害怕规范被稀释，尤其是涉及人权；如果俄罗斯加入或附属于北约这样的组织，制度会出现脱节；它也担心美国丧失领导地位，尤其是在危机情况下（比如前南斯拉夫的各种冲突）。在1993年12月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中，各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纷纷登场，这种状况加剧了西方的害怕和担忧。在理论层面，关键问题是，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宣称自己等同于国际社会。按照这种理解，世界秩序并不是在由国际社会规制的国家间合作（团结主义[solidarist]）的实践中形成的，而是在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领导下形成的。国际社会的制度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相互融合，难分彼

---

① 经典讨论参见 Афанасьев Ю. Иного не дано. М.: Прогресс, 1988.

此。<sup>①</sup>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领导的联盟总是能够为所欲为——事实上，作为雅尔塔秩序的产物，联合国仍然是一个反抗性组织，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拥有否决权，而且它们的南方伙伴国家也在其中。因此，多边进程和西方霸权阵营之间有潜在的分歧。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直不够融洽，这引发了美国议员们对联合国会费比例不合理的抱怨。美国贡献了联合国主体预算的 22%，还有近 29% 的维和开支。<sup>②</sup>通过组建各种“意愿联盟”，美国一直试图用各种方法绕过联合国的权威，比如 2003 年在伊拉克的做法。“民主国家联盟”（League of Democracies）这一理念的目的也是要实现某种类似的独立自主，摆脱国际社会在规范领域的束缚。

这种国际社会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殊途同归”（co-terminality）的隐含主张首先遇到了俄罗斯的挑战，俄罗斯还获得了其他复兴或崛起国家的支持。俄罗斯的基本观点是传统的国家中心式的：国际体系由多个拥有自身利益的国家组成，冷战后那种宣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某种普遍性（通常以“全球化”的面目示人）的颠倒观点是不能被接受的。俄罗斯主张多元主义的模型，它的理念框架来自“多极性”（multipolarity）的思想。而位于第二个层级上的，是民族国家及其各种区域组合，由此创造了一个一些人所谓的“多重秩序的世界”（multi-order world）。<sup>③</sup>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强调，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来都不是真正全球性的，苏联集团、中国、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国家都不在其中。阿查亚强调，“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有限的国际秩序，而不是一种包容性的全球秩序。”他认为，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受到侵蚀已有时日，其中包括丢失了美国国内的一些重要选民，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这种侵蚀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相反，他认为，一个“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正在出现，其中“自由主义秩序的元素保存了下来，但是被纳入了一个由多

---

① 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如何利用联合国促进自身影响力的批评，参见 Shirley Hazzard, *Defeat of an Ideal: Self-Destru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73.

② Ben Quinn, “US Spending on Foreign Aid and UN Likely to be Biggest Target for Cuts”, *Guardian*, February 2017, Vol.28, p.13.

③ Trine Flockhart, “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16, Vol.37, No.1, pp.3-30.

重的、相互交叉的国际秩序所组成的复合体。”<sup>①</sup>

多极性的思想认为，在一个单层的国际体系架构中存在不同的极；而在本文所展示的二元模型中，各种次秩序（sub-orders）和国家，横向上在国际关系的范畴彼此互动，但是纵向上在所谓的规范范畴与国际社会发生联系。这两个方面都不是排他性的，规范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在国家和国际社会制度（例如联合国）之间的规范关系中，权力和国际关系中的其他考虑因素也发挥着不小的作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的模型，在横向的国家互动层面是多极的，但在纵向上，这种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sm）受到国家秩序和以国际社会为代表的秩序两者之间互动的折中缓和。国际社会普遍主义的规范抱负，遭到相互竞争的国家 and 集团的特殊化属性的挑战。主权在纵向的秩序上是被分享的，但是在横向的国家间关系中，它是被争夺和捍卫的对象。

弗洛克哈特（Flockhart）指出，“一种‘秩序间’关系的复杂网络将决定未来‘多重秩序的世界’的特征”，但是对她而言，世界的秩序还停留在国家的单一层面。<sup>②</sup>这种精妙的分析同样用在了一种双层模型上，不同点在于，她认为多个“秩序”或者国际社会是处在一个总的国际体系之中的。尽管这里引述了弗洛克哈特的洞见，但是本文提出的模型十分不同。在本文的模型中，国家间的互动被它与国际社会的纵向关系所缓和，另一种类型的多元主义在整个国际体系中运行。在2016年2月13日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中国前副外长、时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的演讲暗示了这一观点，她强调：“中国支持现行国际秩序。你也许注意到我使用的是‘国际秩序’这个词。中国很少谈论‘世界秩序’。中国所指的是包含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内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体系。”中国官方避免使用“世界秩序”一词，因为它隐含着内在的权力假设。傅莹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对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实践持保留看法，但也不认可关于中国正在创建一个平行秩序的观

---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After Liberal Hegemony: The Advent of a Multiplex World Order”,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Vol.31, No.3, pp.271-285.

<sup>②</sup> Flockhart, “The Coming Multi-Order World”, p.5.

点：“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sup>①</sup>

俄罗斯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主义，被它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所平衡。俄罗斯自称是国际社会的一名创始成员（中国也是如此）。这种观点有着深刻的历史维度，因为有大量文献对欧洲霸权出现之前的全球秩序作过描述。<sup>②</sup>今天，关于国际社会拥有自主权的假定限制了主导国家的行动自由，引发了华盛顿普遍主义者的敌对反应（无论是披着新保守主义还是自由国际主义的外衣）。另一方面，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国际社会仍然深深扎根于西方霸权结构，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将普遍主义推而广之；换句话说，他们就是要让国际社会真正独立运行，成为全人类及其组成国家的共同意愿的最高体现。<sup>③</sup>更平实地说，今天人们对于全球金融、法律和政治治理制度独立自主运行的要求逐渐增多，反对自由主义霸权的监护式主张及其在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制度中的支配地位。<sup>④</sup>

而对于自由国际主义霸权的批评则更进一步，质疑这种秩序究竟是否具有多元主义的属性。这种思维在大量文献中得到阐述，它们从“帝国”的角度来描述美国主导的单极时代。<sup>⑤</sup>换句话说，威尔逊式的自由国际主义代表

---

① Fu Ying, “Putting the Order(s) Shift in Perspective”, 13 February 2016, <https://www.securityconference.de/en/activities/munich-security-conference/msc-2016/speeches/speech-by-fu-ying/>

② 参见 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参见 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4, Vol.58, No.4, pp.647-659; idem, “Advancing Global IR: Challenges, Contentions, and Contrib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6, Vol.18, No.1, pp.4-15.

④ 对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思想及其如何付诸实践的仔细审视，参见 Andrew Hurrell, *On Global Order: Power, Values,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其中包括对区域多元主义和“帝国重生”的讨论（分别参见第10章和第11章）。

⑤ 代表作品参见 Andrew J. Bacevich, *The Imperial Tense: 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American Empi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Alejandro Colas and Richard Saull,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American “Empire”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5; Gary Dorrien, *Imperial Designs: Neo-Conservatism in the New Pax Americana*, London: Routledge, 2004; Richard Falk, *The Declining World Order: America’s Imperial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04;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London: Sphere, 2002; idem,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着一种独特的一元论思维，在冷战不对称地终结后，由于缺乏实质性的替代方案，这种思维变得激进化，在与霸权秩序外部国家的互动中变成了价值论。这种激进化的结果便是毁灭性的但又徒劳无益的军事征伐，使得整块整块的区域失去稳定，最终以难民潮的形式反噬欧洲，并助长了经济移民的蓬勃浪潮。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直到 2010 年前后，西方预期中国将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加入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种预期在很多方面得到了证实；但是中国对责任的定义（就像俄罗斯那样）使它在纵向上坚持国际社会的公正规则，但在横向上抵制霸权的行径。在此之前，西方认为中国能够接受被推着走上“正确的”方向，但是在此之后，西方认为中国走上了完全错误的道路。<sup>①</sup>就在这个节点上，新遏制战略出台，其中包括美国“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此后在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各种国家安全文件中，中国与俄罗斯一起，被描述为“修正主义”国家。如今，反霸权联盟有对抗激进化的潜力，而这只会加深旧西方和反霸权国家之间正在生成的全球裂痕。<sup>②</sup>

## 世界秩序的冲突

俄罗斯早些年的想法能够反映出，旧西方自己显然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混为一谈了。俄罗斯自认为是缔造战后国际社会重要组成元素的国家之一，也就自然而然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成员。旧西方向“大西方”转型的最终失败，激化了俄罗斯国内对其世界地位的常年争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曾在 1996 年 1 月至 1998 年 9 月担任俄罗斯外长，并在此后至 1999 年 5 月担任俄罗斯总理，他在上述任职期间

---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London: Verso, 2004; Ray Kiely, *Empire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US Hegemony and Neo-Liberal Disord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Charles S. Maier, *Among Empires: American Ascendancy and Its Predecesso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ichael Mann, *Incoherent Empire*, London: Verso, 2005.

①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瓦尔代”中俄论坛上瓦西里·卡申（Vasily Kashin）提出的观点。

②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上海“瓦尔代”中俄论坛上亚历山大·罗曼诺夫（Alexander Lomanov）提出的观点。

采取了一种“竞争共存”的外交政策立场，这种立场源于早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存”思想。在 2000 年至 2012 年间，普京相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可以好过仅仅是“共存”，于是他提出了一项与西方进行接触的“新现实主义”议程。这项政策在莫斯科看来是失败的，即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总统任期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 2012 年的第三个总统任期开始，普京实行了一种新修正主义框架下的抵抗政治。它包括发展欧亚一体化的制度，并与批评西方霸权的国家进行联合。与此同时，对于西方原本可能变成的样貌，以及欧洲在未来某一天可能变成的形态，俄罗斯仍报以渴望的目光。不仅如此，俄罗斯对概念的理解也发生了演变，以至于它在今天维护国际社会的独立自主，反对旧西方的霸权。尽管对国际法的规范秩序（它被描述为上层国际社会更大秩序的一部分）的维护反映出俄罗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重心转移，但它也代表着一种沙皇和苏维埃传统的回归。<sup>①</sup>

这种对国际体系多层次属性的重新认可，反映在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理念中：在横向上，它批评霸权的野心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双重标准；但在纵向上，它要维护国际社会的独立自主。俄罗斯宪法第 15 条第 4 款宣称，国际法的地位居于国内法之上，而尽管 2015 年 12 月的一项法令规定宪法法庭有权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裁决，但是宪法条款本身并没有被修改。传统上对多极性的倡导，如今变成了一种对多层次的多元主义、以及国家中心型国际关系的多元主义的更加精巧的防御。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并不是要自我孤立于国际社会，而是要挑战旧西方定义国际社会规范的权利。<sup>②</sup>俄罗斯已经重新拾起了传统上国际法守护者的自我形象。正如傅莹针对中国所暗示的，这并不意味着组建一个反对旧西方、对抗霸权的“世界秩序”或集团，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反霸权政治。这并不是要破坏国际社会的架构，而是反对以普世自居的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行径。

冷和平的紧张冲突和莫斯科的挫折造就了一个反霸权的国家联盟，它反

---

① Lauri Mälksoo, *Russian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Christopher Browning, “Reassessing Putin’s Project: Reflections on IR Theory and the West”,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2008, Vol.55, No.5, pp.3-13.

抗旧西方的霸权行径，但是捍卫国际社会的独立自主和普遍主义理念。这个替代群体的领导者当然是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在双边关系及其所嵌入的各种制度和网络中，仍然存在紧张的节点。尽管如此，这个替代联盟在管理全球事务中怀着相同的愿望，而且要共同努力，使全球治理的架构变得更加独立。俄罗斯的所谓“转向亚洲”（turn to Asia），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层面，可以被理解为是它抗衡美国霸权的长期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更实质的意义上，它是要坚持规范的抱负，创建一个更多元的国际体系。同样发挥作用的还有现实因素，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的需要，以及俄罗斯与快速发展的东亚区域进行的衔接。<sup>①</sup>这种转变表明，俄罗斯正在部分重塑它的自我形象，远离西方，更接近“欧亚”（若非“亚洲”）的身份认同。这并不等于俄罗斯抛弃长久以来想要加入一个转型后的“大西方”或“大欧洲”的愿望，尽管在莫斯科的确有人这般呼吁，同时呼吁采取一种经济发展的动员模式。

在这个模型中，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从霸权秩序中脱离了出来。它恢复了国际体系中的多元主义，而国际体系的规范性正是建立在多元主义的基础之上。换言之，文化多样性、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多元主义的政体建设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某些国家的历史经验能够充当其他所有国家的普遍范例。这个模型也实现了俄罗斯的一个长期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超越军事集团窠臼的国际安全体系。<sup>②</sup>这种多元主义建立在以下信念的基础之上：每个国家都要解决自身的挑战，历史经验不能从一个环境移植到另一个环境（后共产主义时期民主促进的自负与幻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吸取比较经验，而是反对照搬模型的程式化做法。我们反对将规范的转移作为国家间关系的合理框架，上述信念正是它的理念基础。这并不意味着要恢复势力范围和捍卫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家主权，因为伴随着抵制西方霸权而出现的，是增强国际社会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理念的行动。黑格尔和康德的模型都遭到了否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纯粹霍布斯式的世界观。

---

① Alexander Korolev, “Russia’s Reorientation to Asia: Causes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Pacific Affairs*, March 2016, Vol.89, No.1, pp.53-73.

② 阐述该目标的一个例子是普京发表的“Victory Day speech”, *New York Times*, 9 May 2016.

## 新的全球危机：新冷战或其他

冷战后俄罗斯发现自身所处的战略僵局，如今已经演变成俄与西方关系中的更大僵局。正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说，“俄罗斯不可能被西方以它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转变成一个民主制度，或是被争取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俄罗斯：它是欧洲的邻居，但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它与相邻国家没有共同的价值、愿望和政治系统。”<sup>①</sup>2016年3月17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列举了美国所面临的五个主要全球战略挑战，俄罗斯被放在头号位置，之后是中国、朝鲜、伊朗和恐怖主义。他把俄罗斯和中国称为最“令人感到压力的竞争者”，并且宣称他的政策基础是在东欧以“强有力而平衡的方式遏制俄罗斯的侵袭”。<sup>②</sup>

所有这些言论都反映出全球事务中的根本紧张关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到2014年，冷和平的死胡同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是简单的“新冷战”，而是俄罗斯希望取得一次战略突破，以摆脱它所感知的冷和平年代的僵局。在俄罗斯看来，在这个进程中它有众多的盟友。自共产主义衰落以来，“新世界秩序”——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标志性演讲中使用的词语——的理念首次重返人们的视野。以西方为中心的老的全球化正在衰退，一批区域国家集团开始发挥影响，希望创造一个更多元的世界体系。

俄罗斯现在将自己划归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尽管它并未排除跻身“西方”的选项，前提是要打破冷平时期的战略限制。这种模棱两可的姿态试图确保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意味着俄罗斯新建立的伙伴关系不会转化为排他性联盟。俄罗斯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新的时期，制裁与反制裁将会是常态。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不会重演，但也不会出现新的“大国

---

① Walter Russell Mead, “Washington and Brussels: Rethinking Relations with Moscow?”, *Putin's Russia: Really Back?* Ed. Aldo Ferrari, Milan: Ledi Publishing for ISPI, 2016, p.46.

② Lisa Ferdinando, “Carter Outlines Security Challenges, Warns against Sequestration”, 17 March 2016, <http://www.defense.gov/News-Article-View/Article/696449/carter-outlines-security-challenges-warns-against-sequestration>

协调”，因为行为体的类型各异，发挥影响的方式也不同。新的体系将会是一种“竞争和相互依存的辩证组合”。<sup>①</sup>过去的“旧西方”（美国及其盟友）如今将受到由俄罗斯和中国所领导的“大欧亚”（greater Eurasia）的平衡，其他国家则会有选择性地与某一方或者双方进行联合。双方都不会参与深层次的一体化，但是大欧亚仍将是一个大的方向，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和经济潜力来吸引参与者，同时不会排他到形成集团法则的程度。结构现实主义能塑造偏好，但不能决定选择。

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过后，美国的“首要地位”重新获得了它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曾经享有的重要性。尽管奥巴马试图将美国的战略焦点转向亚太地区，美国却再一次成为欧洲安全复合体的基石。就像冷战中那样，集团法则成为大西洋集团领导层的核心关切。特朗普政府在经历最初的一些摇摆不定、以及美国首要地位的形态由“领导”变为“伟大”之后，很快便回到了大西洋团结的传统上来。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相信，俄罗斯的威胁已经十分严重，以至大西洋共同体中最危言耸听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波兰和立陶宛）所说的那种程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达到了 2% 的防务支出门槛，不过其他国家仍然对新一轮对抗的整个基础持怀疑态度。

另一方面，一波截然不同于以往的反霸权制度和组织的浪潮正在涌现，它基本上是新生事物，但是力量正在增强。这次浪潮并不像冷战期间那样正式和激烈，因为俄罗斯缺乏苏联的吸引力、思想信念和经济资源。各国没有理由刻意站到大西洋国家的对立面，它们之间有着如此多的贸易和政治上的纽带。即便如此，单极化的危险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后冷战时期军事干预的经验就是醒目的警示，也就是，当一个国家脱离单极阵营，或是企图将它的经济纳入更严格的社会控制，以至于威胁到跨国公司时，这个国家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美国法则伴随着普遍管辖实践的悄然普及推广，代表着一种新型权力，威胁着世界各国的主权。作为回应，对抗霸权的运动正在积聚活力和动能，而这是从真正的挑战中生长出来的。

虽然俄罗斯的吸引力相当有限，但中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这

---

<sup>①</sup> Fyodor Lukyanov, “The Goal is to Streamline Chaos and Rationalize Diversity”, Valdai Discussion Club, 20 January 2016, <http://valdaiclub.com/news/the-goal-is-to-streamline-chaos-and-rationalize-diversity/>

意味着它已经处在能够施加霸权影响的位置上。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思想理念都是全然包容性的，是建立在“双赢”的话语基础上，坚持构建一种新的“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创立是要解决具体的安全和发展问题，起初它们当然没有被设想成任何“反霸权”联盟的组成部分，但是国际政治的逻辑开始驱使它们走向那个方向。这两个组织的思想基础仍然是不结盟，避免任何强加的两极格局——甚至包括“东西方冲突”所描述的两极格局的最一般形式。上海合作组织的确在管控成员国之间的潜在冲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起初是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潜在冲突，现在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潜在冲突——但是它这么做的合理性也在于反对霸权。中国传统上反对结盟，尤其是考虑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与苏联的不愉快经历，就连与俄罗斯进行“联合”（alignment）这样的软性词语也引发了极大的不安。<sup>①</sup>尽管如此，正如习近平在 2015 年 9 月 28 日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所说，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寻求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sup>②</sup>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目标，及其反霸权联盟伙伴的共同目标，是要改革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和整个南方世界能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sup>③</sup>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俄罗斯都扮演着先锋角色。俄罗斯想要加入转型后的西方世界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与此同时，旧西方的制度和实践却得到了强化。作为回应，俄罗斯成为创建“非西方世界”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波波·罗（Bobo Lo）认为，“克里姆林宫寻求建立另一种思想和政治的合法性，挑战西方关于全球治理和道德普遍主义的理念。”<sup>④</sup>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俄罗斯挑战的是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合理之处，而很多国家都对此心存不满，这种情况促进了替代组织的创设。同样道理，这种挑战针对的是道德普遍主义的实践，而不是它的原则，因为俄罗斯无意反对《联合国宪章》（UN

---

① 这体现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海“瓦尔代”中俄论坛上于滨的发言中，他对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角色，以及中国视角下的国际政治变化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

② Xi Jinping, “Working Together to Forge a New Partnership of Win-Win Cooperation and Creat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 General Assembly, 28 September 2015, <https://qz.com/512886/read-the-full-text-of-xi-jinpings-first-un-address/>

③ Alexander Lukin, *China and Russia: The New Rapprochement*, Cambridge: Polity, 2018.

④ Bobo Lo, “Frontiers New and Old: Russia’s Policy in Central Asia”, *IFRI Russia/NIS Centre, Russie.Nei.Visions*, No.82, January 2015, p.9.

Charter) 和《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等基础性法案。

考虑到俄罗斯及其伙伴的遭遇,后冷战时代基于价值理念的政策是被工具性和选择性地加以实施,以提升西方的霸权,而不是真正地促进公平正义。在莫斯科看来,谴责俄罗斯的同时却放沙特阿拉伯一马,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后者对人权和公民权的践踏来得更为惊人。莫斯科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它没有认识到,旧西方对《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中所列举原则的信奉,的确是它的行为基础。同样地,根据上文模型中的三个层次,西方在实行基于价值理念的政策时,倾向于淡化和掩饰霸权、权力对政策的扭曲。

针对西方“强加于人但又以普遍性自居的模型”的批评,激发了“对替代品的需求”。<sup>①</sup>然而,这种替代只能是部分的,因为俄罗斯并不完全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而是新修正主义的(neo-revisionist):它谴责的是霸权国家的行径而不是原则。莫斯科力图缓和道德普遍主义的随意和惩罚式的实际应用,同时确保全球治理工具能够真正反映全球关切。它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在单一世界秩序中重塑一极,而是要创建另一个世界秩序,这个秩序的存在本身将确保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正如瓦尔代(Valdai)俱乐部的一份讨论文件所述,“大西洋共同体是拥有统一价值的特例。相形之下,在强调多样性的重要作用上,非西方国家站到了一起。它们坚信,一种‘现代国家和社会’的统一象征是既不值得实现,也不可能实现的。这更符合多极世界的状况。”<sup>②</sup>不过,即便是这份瓦尔代俱乐部的文件,也没有认识到多重秩序的视角中潜藏的激进主义。

在对后两极世界的挑战中,俄罗斯发挥了引领作用。但根本问题在于,这些重塑全球秩序的努力是否代表着一次持续转型的开始——它将会重构世界政治的模型;还是说,这只不过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在长期巩固过程中的一次暂时的异常现象。如果是前者,那么俄罗斯的新修正主义立场也许能在长期获得胜利。如果是后者,那么制裁和其他形式的压力将持续存在,到

---

① *War and Pea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New International Balance as the Guarantee of Stability*, Materials for Discussion at the 12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Valdai Discussion Club, Sochi, 19-22 October 2015, p.4.

② *Ibid*, p.5.

最后俄罗斯要么屈服，要么衰落成为无足轻重的国家。在俄罗斯的政策中，以上两种视角都有所体现，但它的基本假设，是当前自由主义秩序的框架不利于俄罗斯，这个假设最晚形成于 2007 年普京慕尼黑讲话之时。俄罗斯十分渴望享受自由主义秩序的好处，但这会使它付出高昂的代价，损害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的长期基础。有部分俄罗斯精英已经接受了这种观点，即美国将在长期陷入衰落，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失去活力。因此，俄罗斯有理由实施抗衡战略，联合中国等崛起国家，构建新生的替代世界秩序。然而，这种预判也有可能是一个错误；当前发生的些许变化可能并不是一次崛起浪潮的组成部分，它会误导俄罗斯，使其认为替代全球架构的肌体正在生成。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俄罗斯的战略就是根本错误的，它将把俄罗斯进一步推入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僵局，以及政治和发展的死胡同。<sup>①</sup>一个稳定的秩序可能就要形成，而俄罗斯将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行动脱离了现实。

乌克兰危机增强了欧洲和大西洋国家的团结，但是同时，大量的挑战也暴露出了欧盟的脆弱。叙利亚危机表明，在恐怖主义和难民等问题上，北约已无力保障欧洲的安全。欧盟缺乏适当的安全工具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这迫使成员国自寻出路，损害了欧盟的制度和政策。2016 年 6 月 28 日，欧洲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全球战略”(Global Strategy)文件表明，欧盟要在欧洲内部实现更大的安全协调。这份文件强调，“和平与稳定不再是一个既成事实。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和乌克兰的不稳定局面，处在大黑海区域旷日持久冲突的风口浪尖，对欧洲安全秩序的核心构成了挑战。欧盟将团结一致，坚定支持国际法、民主、人权、合作以及每个国家自由选择未来的权利。”<sup>②</sup>2015-2016 年法国和德国的恐怖袭击浪潮表明，欧盟在情报和边境方面需要进行更多协调。在 2016 年 7 月 8-9 日北约华沙峰会上，北约和欧盟在促进海军巡航和其他问题的合作方面有所动作，但与此同时，欧盟中独立

---

① 对该问题的一次大胆讨论，参见Ivan Timofeev, “World (Dis)order: An Advantage for Russia?”, Valdai Discussion Club, 30 June 2016, <http://valdaiclub.com/news/world-dis-order-an-advantage-for-russia/>

②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une 2016, p.33.

的力量也在增强。在 2016 年 6 月 23 日的英国公投中，有 52% 的人支持脱离欧盟，但是现在要预测这次公投的后果还为时尚早。它能够大大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当然这是指欧元区内部和防务层面的一体化。民意并不十分支持“更多欧洲元素”，但是英国脱欧不太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碎片化。

## 结论

俄罗斯与中国联合，共同维护对国际社会规范的承诺和一种多元主义的国际关系，这个事实对现实主义的观点形成了挑战。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21 世纪将由美中关系而不是美俄关系塑造，中国的力量增长将引发“与美国的激烈安全竞赛”。在他看来，俄罗斯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与中国联合，第二种是与美国联合，第三种是保持中立。面对美国的压力，俄罗斯正在与中国联合：美国及其精英“不尊重俄罗斯的合法安全关切，推动北约东扩”。<sup>①</sup>一些中国学者赞成这种观点，认为中俄关系将保持稳定，而中美关系将变得越来越动荡；美国领导人不太可能宣布放弃霸权野心，所以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将是对华盛顿“单极愚蠢行为”的一种制约。<sup>②</sup>然而，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都没有准确捕捉到现代国际体系的变化。在双层模型中，以联合国、全球经济政治治理机制和国际法架构为中心的国际社会，软化了国家主权（自由主义的观点）；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国家保留了独立自主的能力，并卷入了等级权力的游戏。次体系（sub-systems）之间的频繁相互作用构成了二元国际体系中的国际政治。就此而言，国际社会是一项共同努力，是由多个国家在二战后创立的，以缓和武装冲突的无政府状态和短视的经济民族主义；但在国家间关系层面，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仍在上演。

---

① Alexey Khlebnikov, “Russian Experts Debate the World of Tomorrow in Valdai”, *Russia Direct*, 25 October 2016, <http://www.russia-direct.org/analysis/russian-experts-debate-world-tomorrow-valdai>. 也可参见 2017 年 1 月 18 日的一次访谈, [http://valdaiclub.com/multi-media/video/john-mearsheimer-we-are-moving-to-a-multipolar-world-with-three-great-powers/?sphrase\\_id=42994](http://valdaiclub.com/multi-media/video/john-mearsheimer-we-are-moving-to-a-multipolar-world-with-three-great-powers/?sphrase_id=42994)

② Lanxin Xiang, “The Peak Moment for China-Russia Ties”,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July-Sept. 2016, No.3, pp.152-156.

俄罗斯反霸权战略的根本目标并不清晰。它仅仅是要提升俄罗斯加入“大西方”的议价权力吗？诚然，俄罗斯在东方世界的一些伙伴国家认为事情就是这样，俄罗斯作为欧洲国家的基础身份最终将会胜出，使其与东方国家的联合和反霸权战略沦为工具和偶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完全能够理解，任何企图击败、破坏或以军事手段挑战大西洋体系权力的行为，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之举。诚然，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是调整旧西方的行为，由此确保俄罗斯享有更大的军事和政治安全，并保持持续转型的动力。但是由于缺乏调解模式、甚至基本的共同语言，这种新修正主义的调整战略已经具备了再度军事对抗的特征，损害了所有国家的安全。

反霸权集团是被国家利益的认知塑造形成的，但除此之外，它也怀有对国际体系转型规范的承诺，这可以追溯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晚期的理想主义。这种特性造就了俄罗斯新修正主义的矛盾之处，但也赢得了一批俄罗斯政策的追随者，他们来自全世界那些同情反霸权议程的群体。虽然俄罗斯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反抗外部世界，在近邻国家中也没有几个真正的盟友，但是在这种规范的框架下，俄罗斯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佩，他们集合了这样的一群人：传统主权论者、和平主义者、反帝国主义者、全球化的批评者、国际事务中霸权危险的谴责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左派和右派民粹主义者。俄罗斯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一些大国的联合有着反霸权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它拥有一个发挥平衡作用的联盟的特征，这也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预言。然而，这样一种解释错失了正在起作用的更深刻的变化，也就是反霸权的动力，它要确保多边的国际社会规制大国之间的横向关系；只不过，通往这种世界秩序范式的道路并不平坦。

（翻译 丁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can be envisaged as a two-level construct of primary institutions and secondary institutions. In this two-level model,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centred on the UN, the institutions of glob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the structures of international law, temper the sovereignty of states; but at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es retain their autonomy and engage in class power plays. Since the WWII, the U.S.-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was born at the lower level of this model, expanding to the whole world with universalism, which now poses itself as the upp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With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U.S.-led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became radicalized at four levels including of ideas, of norm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of power, which made it more difficult to get engaged with the external order and even gave birth to the EU's value-based politics. Russia aspired to join the historical west but was rejected, eventually trapped into "security dilemma" and strategic impasse. This has forced Russia to turn to neo-revisionism, aligning with emerging players including China, maintaining together norm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bjecting to hegemony and criticizing the West's double standards. Meanwhile, there still exist uncertainties for the future world order and the anti-hegemony alignment also faces new challenges.

**【 Key words 】**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Great Power Politics, Russian Diplom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двухуровневую структуру, состоящую из «баз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и «вторич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этой модели высше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истемой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правом, смягчило нижний уровен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но на уровне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обладает способностью быть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и политика власти всё ещё имеет место.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а нижнем уровне модели зародился либераль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ША, который позж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лся по всему миру благодаря тенденции универсализма,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на верхнем уров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С окончанием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она стала радикальным на четырёх уровнях: идеология, нор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 и власть, что затрудняет контакт с внешним порядком, и даже породило политику теории ценностей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Россия

надеялась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тран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ому старому западному миру, но была отвержена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опала в «дилемм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зашла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Этот результат заставил её перейти к новой ревизионистской позиции, объединиться с новыми силами, такими как Китай, и совместно защищать нормати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ыступая против гегемонистских практик и критикуя западные двойные стандарт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будущем мировом порядке всё ещё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 и антигегемонический альянс также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новыми проблемам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рядо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итика державы,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欧亚地区：空间、身份与政治变迁**

## 世界历史中的欧亚空间 ——源起、建构与衰朽\*

封 帅\*\*

**【内容提要】**空间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任何重要政治行为体的权力与影响力变迁，最终都会在空间的维度上反映出来。因此，从空间的维度出发开展区域宏观议题研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新颖、有效的分析视角。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区域空间之一，欧亚空间从诞生伊始就与俄罗斯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俄罗斯权力的区域映射，欧亚空间塑造了俄罗斯，也被俄罗斯所塑造。地处大陆腹地的欧亚空间是全球所有地理空间中距离海洋贸易通道最远的地方，俄罗斯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与区域特点结合在一起，在内陆深处创造了大陆秩序的试验场。经过来自东方的蒙古帝国远征的洗礼，俄罗斯凭借来自欧洲的工业力量，逐步成长为欧洲边缘的重要帝国，在几百年的扩张过程中，将原本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西伯利亚地区和高加索、中亚地区纳入了共同的区域空间中，从而构成了欧亚空间的核心版图。借助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当时大陆秩序发展顶点的苏联模式获得了巨大的威望，使欧亚空间的非核心区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然而，在与海洋秩序的全面竞争中，其内在缺陷充分暴露，最终导致欧亚空间再次进入危机与重构的新阶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项目“欧亚合作与中俄关系的战略定位”（项目批准号：16JJDGJW003）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和杂志编辑部对文章提出的重要修改意见，文章的错漏由作者本人负责。

\*\* 封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兼职研究员。

段。欧亚空间的发展历史既反映了区域空间演变的一般规律，又在很多重要节点体现出明显的特殊性。欧亚空间的演变进程与中国的成长过程相互交织，对中俄两国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欧亚空间 俄罗斯帝国 苏联模式 欧亚经济联盟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5-0028-(45)

---

## 一、引论

任何曾经或正在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区域都有权利拥有一部专门为自己撰写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的欧亚空间自然当之无愧地拥有这样的地位。而在撰写大部头欧亚史之前，我们也有必要通过一篇文章厘清欧亚空间在世界历史中的演变脉络和发展逻辑，展示欧亚空间在世界历史变革中的地位与意义，并为后续研究提供提纲挈领式的参考，这便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想要完成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因为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重要区域空间既代表着特定权力的辐射范围，又意味着特定规则和秩序的影响区域。它的诞生和成长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期间会受到诸多要素的复杂影响。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学术界，以欧亚空间的发展与演变为核心内容的系统性研究仍然凤毛麟角，这与该主题的重要价值并不相称。<sup>①</sup>

---

① 现阶段相关研究成果包括 Dimitri Trenin, *The End of Eurasia: 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1; Bruno Macaes, *The Dawn of Eurasia: On the Trail of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8; Barry Cunliffe, *By Steppe, Desert, and Ocean: The Birth of Eur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Stylianos Sotiriou,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asia*,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9; Igor Torbakov, *After Empire: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d Symbolic Politics in Russia and Eurasia in the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Stuttgart and Hannover: ibidem Press, 2018; Maria Raquel Freire, Roger Kanet, *Key Players and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Kadri Liik ed., *Russia's Pivot to Eurasia*,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2014; 李自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空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顾炜：《中俄战略协作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演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万青松：“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第3-50页。等等

一方面，这是“空间”的问题。任何关于空间历史的研究尝试都是非常困难且难以把握的。政治学意义的空间“并非自然形成或给定的东西，而是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发明的社会性建构”<sup>①</sup>。空间会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状态下应运而生，并且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经历持续的建构过程才最终成型。在这一过程中，空间的“名”与“实”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也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萎缩甚至消亡。事实上，无数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政治空间概念，在数百年之后都只剩下了遗迹与传说，而在同样的地理范围内，新的政治空间又会重新建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因此，对于空间建构这一复杂进程的探索，既需要对空间历史的核心线索加以挖掘，又需要对支撑空间建构的多元要素进行系统分析，其中涉及权力、身份、资本、文化等多重要素，研究难度较高，成文尤为不易。

另一方面，这也是“欧亚”的问题。欧亚（Eurasia）本身是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概念，无论是其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还是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都没有定论。“欧亚”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虽然它的起源很早，但作为对空间的指涉意义，却是在冷战结束后才流行起来的。<sup>②</sup>这一时期，世界各国在各种学术研究和部分政府文件中，需要指涉原苏联空间却又不愿意直接使用“苏联”一词时，往往采用“欧亚”作为折中方案。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在推动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多边机制建设时，也广泛使用了“欧亚”作为指代该区域的核心概念。当然，欧亚概念的流行与后冷战时代俄罗斯对于本国身份认同的重新界定，也具有密切的联系。政治话语体系更替的背后，体现出俄罗斯对于自己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的重新认知。<sup>③</sup>但无论如何，“欧亚”概念的再次流行是典型的时代产物，欧亚概念的内涵模糊性与外延宽泛

---

①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 Peter Katzenstein, Robert Keohane and Stephen Krasner (eds.), *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p.235

② 参见 Винокуров Е, Либма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СПб.: Центра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ЕАБР. 2012; Алексей Токарев. Между великими// Коммерсант. Власть. №46. 23 ноября 2015. С.28.

③ 关于各国对于“欧亚”概念的认知，可以参考万青松：“大国政治的欧亚时刻——地缘政治经济视域下‘欧亚’认知的演进及其寓意”，《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第3-50页。

性，为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提供了很多便利，但反过来也给较为严谨的学术研究带来了许多麻烦。当我们在谈论欧亚空间或欧亚秩序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在空间外延方面保持一定的模糊性，以便使讨论能够顺利进行。但这种模糊性的存在，客观上也会削弱论证的严密性。这种矛盾关系的存在，也使很多研究者有意回避了这一主题的论述。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区域空间研究实际上是以地理空间为背景，以时间为主轴，探寻在不同时间段内特定核心政治行为体将特定地理空间塑造为政治空间的模式与方法，以及在该空间形成之后持续发展、演变直至瓦解的全过程。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以区域空间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分析工具，将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影响的欧亚空间——它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和梳理欧亚空间的成长历程，判断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世界的影响，并讨论中国与欧亚空间的辩证关系，最终对于整个欧亚空间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判。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区域空间研究的系统性开展产生抛砖引玉的作用，也能够为我国欧亚研究提供一些方法与视角层面的有益补充。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为了保持逻辑的一致性，会在全文中始终使用“欧亚空间”概念来指代位于欧亚内陆、以俄罗斯为核心政治行为体的广阔地理文化空间。笔者会在行文中介绍不同历史时期该空间的不同名称，但在文章叙述中不以历史名称取代“欧亚空间”概念。

## 二、区域空间演变的宏观逻辑

与书本一样，空间也是记录历史的重要工具，所有权力的变化最终会以某种方式在空间的维度上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空间的演变史。

当前我们所处的后冷战世界是一个“由地区构成的世界”<sup>①</sup>，区域空间与区域秩序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常常会给我们带来

---

<sup>①</sup> 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一种错觉，似乎区域空间的建构成型是理所当然之事，任何自然地理空间都会自然地成为政治空间的一部分。然而，只要回顾人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全球所有地理空间都被整合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区域空间，实际上只是在近两百年来才渐成主流。在此之前，全球不同地理空间中只有零星区域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区域空间，而且由于不同空间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空间秩序与特点千差万别，很多区域都曾经将自己的区域空间看作是世界的全部。区域空间从雏形初现发展演变到今天，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事实上，区域空间的生成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区域空间的巩固需要各种要素的支撑，而区域空间的演变又要遵循特定的逻辑。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基本理论和逻辑，就很可能陷入庞杂的历史叙事之中而毫无头绪。因此，在我们具体分析欧亚空间成长的进程之前，有必要对区域空间生成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以及对空间巩固后所遵循的基本演变逻辑，进行扼要总结，以此作为分析欧亚空间问题的理论基础。

### （一）权力、帝国与区域空间的生成

区域空间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类历史到达一定阶段后的产物，塑造区域空间边界的原初要素是权力。

想要形成区域空间，需要保证在特定区域内所有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建立常态化的联系，从而使区域内各行为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为政治空间的形成创造条件。而能够使区域内行为体建立起广泛联系的原初推动力量，便是核心政治行为体的权力。权力是一切区域空间得以形成的基础，没有任何其他要素可以替代。而在实践中看，早期区域空间的生成往往离不开帝国权力的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区域空间最早的雏形诞生于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200 年）各文明所出现的地区，<sup>①</sup>但限于当时有限的生产能力和财富积累水平，他们所维持的区域空间往往较为狭小，且缺乏维持的能力，很难发挥独立的作用。大约在公元前 300-200 年以后，全世界范

---

<sup>①</sup> 参见[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夏菲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年。

围内才开始出现具有实际意义的区域空间的基础形态。例如东亚的秦汉帝国，欧洲的希腊、罗马帝国，以及印度的孔雀王朝等都在此列。从这一时间点到 20 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帝国”模式成为承载区域空间建构的主要方式。作为“从远古时期到 20 世纪一直存在的政治形式”，<sup>①</sup>帝国凭借自身在聚集财富和动员人力方面的优势，使得自己能够在核心领土之外，获得对更大地理空间和多民族人口的管辖权。帝国的扩张使得很多原本因为地理障碍而缺乏联系的地理区域共同被纳入帝国的版图，在帝国治理模式和语言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稳定的联系，帝国权力的范围则构成了该空间的边界，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空间在这种状态下逐步成型。

权力是塑造空间的基础条件，区域内的核心政治行为体能够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将该空间整合在一起，并形成最初的联系与历史记忆，权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空间范围的大小。然而，权力对于区域空间来说，仍是具有明显外生性特征的因素，其历史任务是使空间内的各主体形成并拥有建立有机的秩序系统的基本条件。区域空间雏形的出现，与真正具有内生性纽带和自我成长能力的区域空间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很多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由帝国主导的区域空间，都随着帝国权力的崩溃而瓦解；然而，一部分完成了自身内生性建构的区域空间，会在历史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后，继续成长和演变。

## （二）秩序、身份与区域空间的巩固

在空间的范围被特定权力塑造完成之后，最初被外力联系在一起的区域内部就会根据某种逻辑，尝试建立区域的专属秩序；只有当区域内所有行为体全部接受并认同了既有的区域秩序特征，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之后，一个具有独立生命力的稳固的区域空间才算真正形成。

区域秩序包含着全方位和多维度的内容，在政治层面，秩序反映为区域空间内的各政治行为体之间的名义与实际地位、各行为体互动的方式等，在这方面，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分布结构对于政治秩序的建构非常重要；在经济

---

<sup>①</sup> Dominic Lieve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ume II, Imperial Russia, 1689-19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9.

层面，秩序反映为整个区域空间内的总体经济生产方式和产业分工等内容，其中能够影响区域内部财富分配方式和流动方向的因素，对于秩序至为关键；在社会文化层面，在经过各种博弈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权力关系，在时间因素的推动下，会逐渐成为区域内民众所接受的行为规范，进而上升为各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在时间和记忆的作用下，内生性的行为规范，经过较长时间的稳定后被人们赋予伦理意义上的正义性。一旦这样的区域伦理认同通过交流深入人心，就会成为联结区域空间内部最强大的纽带。当所有复杂因素通过不断磨合与博弈，最终找到稳定的平衡点之后，稳定的区域秩序就成为维系区域空间发展的核心内生性力量，并且成为区域空间的主要标志。往往到了这一阶段，区域空间就能够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在区域空间的建构历史上，帝国秩序曾是大部分区域空间最初的秩序来源。因此，在全球很多区域空间的发展史上，政治行为体之间存在等级制关系，空间内部的“中心-外围”结构等典型特征都曾是相关区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直接影响着这些区域空间的当代形态。在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由于人类生产和交通能力的限制，全球大部分区域空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依托于各种历史帝国的区域空间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秩序。然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伴随着欧洲文明的扩张开始席卷全球，长时间分散的区域秩序逐渐连成一体。同时，工业文明所奉行的秩序内容，在全球的秩序竞争中也充分展现出难以替代的优势，逐渐被赋予全球秩序的意义。在19世纪以后，地球上所有的空间都被纳入到了人类文明的范畴之中，各自被赋予了不同的秩序安排。而全球各区域空间秩序的运行规则，都主动或被动地向全球秩序靠拢，最终造就了现代世界。<sup>①</sup>但即便在这种历史的大趋势下，不同区域空间的核心国家也会尝试凭借自身优势，在现代秩序的大框架内建立具有本区域特点的秩序体系，政治行为体力量的持续提升与区域空间地理范围的有限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围绕着空间与秩序的竞争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长时段来看，竞争本身是秩序进步的原动力，竞争

---

<sup>①</sup> 关于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和基本形态可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与挑战促使全球秩序向着更加文明、更加完善的方向不断改进。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欧亚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就扮演了这种挑战者的角色，虽然结果令人遗憾，但也是欧亚空间全球性影响的重要体现。

### （三）秩序竞争与区域空间的兴衰

当人类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后，区域空间范围变化的实质意义已经变为特定区域秩序的扩张与收缩，而秩序的变化又表现为区域空间的兴衰。

在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和民族国家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欧洲区域秩序拓展到全球之后，世界体系运行的逻辑也被深刻地改变了。全球范围内接受了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各区域秩序也只能选择在这个框架内进行调整。在现代主权国家体系的规则内，帝国时代以军事权力为核心的领土吞并和扩张不再是体系所能接受的常规行为，军事消灭和武力占领的成本变得异常高昂，在经济上和制度上都已经不再是合适的政策选项，而在自身力量可及的范围内推动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体系规则和稳定秩序，成为大国力量发挥作用最有效的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领土范围已经不能反映核心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趋势，于是区域空间的意义就变得更为重要。区域秩序的构建离不开区域内核心国家的推动，而在区域秩序的建构过程中，秩序也塑造了核心国家自身的特征。核心国家与区域秩序之间形成了互构关系，并一起构成了区域空间的主要内容。当某个区域空间能够更加有力地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流入，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时，其区域秩序的认可度和接受度也会随之提升；当周边区域在经济上被更多地纳入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之后，也将逐步认可该区域空间的秩序和规范，最终改变自己在区域空间层面的身份认同。这种状态反映在地理空间上就体现为区域空间的扩张。但由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各种区域空间已经完全占据了全球所有的地理空间，因此，某种秩序的扩张几乎就必然意味着其他区域秩序的收缩。处于扩张型区域空间周边的国家或地区，也会通过几乎同样的路径放弃原空间的身份，转而投入临近区域空间的怀抱，于是就出现了部分区域空间无法维持、区域空间被迫收缩的现象。

在现代世界的规则体系下，区域空间的变化取代了帝国时代的领土或殖

民地扩张，成为展现区域内核心国家权力消长的重要标志。而在很多时候，当深层次的区域空间收缩已经发生、边缘国家身份认同业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核心国家不愿接受区域空间变化的结果，唯一可以运用的手段，就是通过军事或其他强制性权力迫使中小国家在政治层面上停止转换空间的尝试。但这种行动成本高昂，且仅能在短时间内维持表面的稳定。在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极其容易诱发武装冲突，当今很多正在发生的热点冲突问题都属于这一类别。这也使得很多区域空间的边缘地带变成了问题多发区。

时至今日，核心大国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秩序的竞争，区域空间内的成熟秩序如果具备普世意义的吸引力，便可能具有全球秩序的意义，其吸引力会超越原有区域空间的界限，促成区域空间的生长。而那些被证明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秩序规则，也会逐渐被区域空间内部的行为体所抛弃，从而造成区域空间的萎缩，甚至最终消亡。区域秩序的影响力能够超越核心国家的边界，在地理空间层面勾勒出区域核心国家的力量边界，而区域空间的变化，又会反映出其权力和所坚守之秩序的变化状态。

#### （四）区域空间的演变趋势与构建逻辑

政治学意义上的区域空间实际上类似于一个有机体，既有孕育和诞生的时刻，又有成长的过程，还会经历衰朽与死亡。在全球历史上，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观察到区域空间完整的生命周期，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区域空间演变逻辑的历史性变化。

一方面，从横向的时间维度上看，全球区域空间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紧密、从相互孤立到合作竞争的发展进程。在工业革命之后，各区域秩序也被迫向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靠拢，其内容逐渐趋于同质化。

如图 1 所示，在现代世界体系扩展到全球之前，帝国是区域空间的主要载体，帝国的权力外延奠定了区域空间的边界，而不同帝国的治理模式也构成了区域空间秩序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区域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分散性与多元性特征，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帝国所推动建构的区域空间大多是相互独立的，不同区域之间的有机联系很少。虽然他们在相同的时间共同存在于同一个地球，但他们所处的却是不同的世界。大部分由帝国维系的区域

空间都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在区域空间内依托于轴心文明而自发生成的区域秩序，在很长时间内都会被帝国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秩序，而自己又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唯一代表。文明、秩序和区域空间内各政治行为体的持续互动，构成了帝国时代区域空间成长与演变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反过来又塑造了帝国自身的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区域的文明底色与未来发展的方向。

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欧洲国家拥有了相对于其他空间文明压倒性的力量优势，这种力量使得他们能够超越原有的地理空间限制，将原本分散的“小世界”通过各种方式整合进入统一的世界体系中。各个区域空间都不得不接受欧洲区域秩序的核心内涵，于是便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秩序。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而主权原则的不断巩固，使得国家边界的变更逐渐变得得不偿失。于是，区域空间的建构和整合成为展现大国权力提升的重要形式，而秩序竞争的结果成为决定区域空间变化的主要形态。<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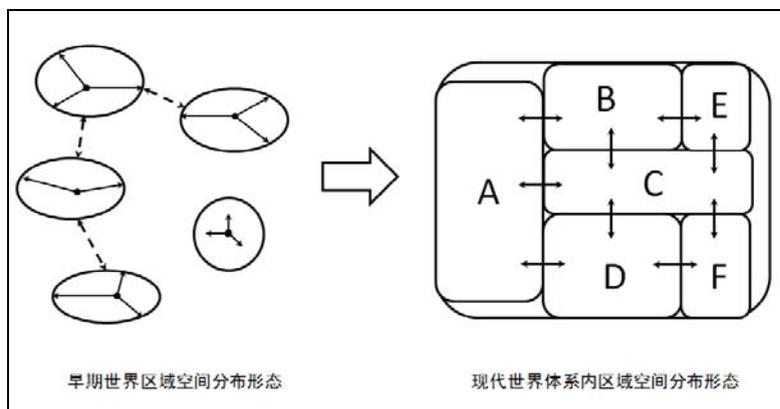


图1 区域空间全球分布形态的历史演变

另一方面，从纵向上看，区域空间内部秩序是由位于不同层级的复杂要

<sup>①</sup> 参见[英]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素共同建构的，要素组合方式呈现出金字塔型结构。

如图 2 所示，权力要素提供了构成区域秩序的表层逻辑，也是推动区域空间诞生的原初力量。在任何状态下，区域空间内部的力量分布都是影响空间秩序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该空间各行为体的话语权和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它也是区域秩序内容中最容易理解和观察的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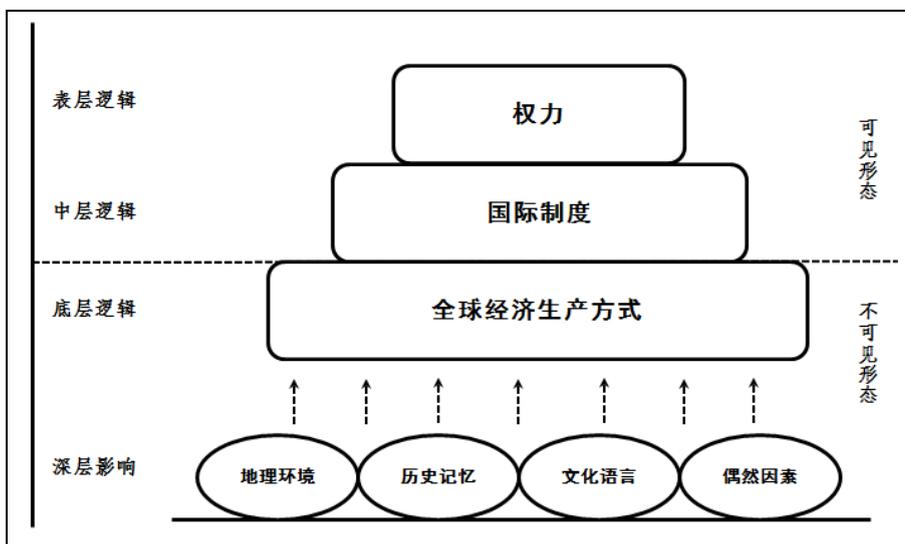


图 2 区域空间内部秩序构建的基本逻辑

国际制度构成了区域秩序的中层逻辑，制度要素可以被看作是区域行为体奉行的基本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其内容包括对于获得区域身份的基本要求、区域内行为体互动的规则与行为规范等等。这些规则可能是通过互动协调摸索出来的，也可能是区域内影响力最大国家国内制度的区域性推广。规则本身的吸引力构成了区域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影响区域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

如图 2 所示，前两个层次属于区域秩序构建中的可见形态，很容易被观察者和研究者所接受，但对于区域空间和区域秩序来说，他们并非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更加重要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不可见的形态。从根本上说，构

成区域秩序的底层逻辑是全球经济生产方式的变化，无论是区域空间的范围还是区域秩序的内容，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由于经济生产力的限制，帝国时期的区域空间不可能呈现出现代形态，而在现代经济生产方式形成之后，帝国形式的空间也不可能长久维系。时至今日，资本和贸易的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构成所有区域空间稳定与活力的根源，资本的大量注入体现出该区域产业价值链具有更高的价值，区域内国家更容易将本国经济嫁接在成熟的产业链上，从而取得在全球资本体系中获利的机会，这是区域内国家持续发展的原动力。现阶段，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流动趋势，实际上决定了特定区域秩序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与影响，而区域秩序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关键看该秩序能否适应这种底层逻辑。权力和制度如果与此逻辑相向而行，那么将会充分发挥其在秩序建构方面的作用。反之，如果与其相抵触，那么必然事倍功半，行而不远。

除此之外，在不可见形态中，还有很多我们难以准确界定和量化的诸多因素，如地理环境、历史记忆、文化语言，甚至很多难以预计的偶发事件等。这些因素同样能够对区域空间秩序建构产生微妙的影响，但其作用的发挥也需要适应以经济为核心的底层逻辑。<sup>①</sup>

综上所述，关于区域空间的变化逻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其一，区域空间的形成具有较为明确的历史起点，区域空间本身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持续演变的。

其二，区域空间内部秩序的建构是有逻辑、有规律的，全球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方向构成了区域秩序建构的底层逻辑。

其三，因为适合人类生存的地理空间是有限的，因此诸多区域空间客观上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现代国际体系中表现为区域秩序的竞争。

其四，如果某种区域秩序在全球秩序竞争中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那么这种秩序就将通过持续博弈的过程，最终成为全球秩序的基础模板；反之，如果某种区域秩序在秩序竞争中明显落后于其周边区域的秩序，该区域空间

---

<sup>①</sup> 由于文章的篇幅所限，我们暂时无法将这一层次所有无法量化的要素展开系统分析，留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加以说明。

的基础就将逐渐松动，空间外延将不断缩小，甚至走向消亡，而它原本所覆盖的地理空间，也将以秩序重构的方式重组成为其他区域空间的一部分。

当我们从空间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世界时，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空间的演变史。文明的兴起使人类具有了占据一定空间的可能，区域秩序的建立使人类具有了维持和巩固特定范围空间的能力，技术的进步又使人类的力量能够覆盖所有已知的地理空间，造就了区域空间之间以秩序竞争为核心的演化逻辑。然而，宏观逻辑只是历史发展的线索和历史叙事的骨架，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就将错过绝大部分精彩而伟大的历史篇章。因为在宏观历史逻辑的背后，每一个具象化的区域空间在持续数百年的历史演进中，都经历了时代洪流的反复冲刷，他们所代表的区域秩序的精华内容也逐渐融合，成为全球秩序的一部分。作为其中的重要代表，欧亚空间在过去近 800 年的人类文明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与中国产生了复杂且深远的纠葛。欧亚空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能够成为我们观察区域空间变化规律的一面镜子。通过梳理世界历史中欧亚空间的变化特征，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欧亚内陆国家权力变动的总体走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较为典型的案例的剖析，让我们对空间演变的逻辑与方向建立起更加深刻的理解，希望能够为欧亚研究的发展添加一些新元素和新视角。

### 三、欧亚空间的兴衰史：从蒙古征服到冷战终结

从诞生伊始，欧亚空间就是一个与俄罗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空间。在欧亚空间迄今为止近 800 年的演变时间里，见证了它从罗斯公国到俄罗斯联邦的曲折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区域内核心政治实体的俄罗斯，既被欧亚空间的诸多元素所改造，又深刻地塑造了欧亚空间。其发展过程总体上符合区域空间演变的一般规律，但在很多重要节点上又展现出极具魅力的特殊性。欧亚空间的存在，给所有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全程案例，对于学科理论探索的丰富和欧亚区域认知的深入，都具有重要意义。

#### （一）欧亚空间的源起：蒙古帝国的征服

1240年，蒙古帝国历时5年的“长子西征”<sup>①</sup>已经接近终点，此时东欧诸国几乎全部沦陷于拔都率领的铁蹄之下，虽然强敌压境，但罗斯诸国始终无法团结起来，最终几乎全部沦陷。在1240年12月初，由拖雷的长子蒙哥——未来的蒙古大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开始围攻基辅，仅仅几天时间，基辅便宣告沦陷。在基辅的大火和废墟背后，以基辅为核心的俄罗斯历史结束了。罗斯诸国名义上都成为拔都新建的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一部分，俄国史书中将其称为“鞑靼桎梏”时代。<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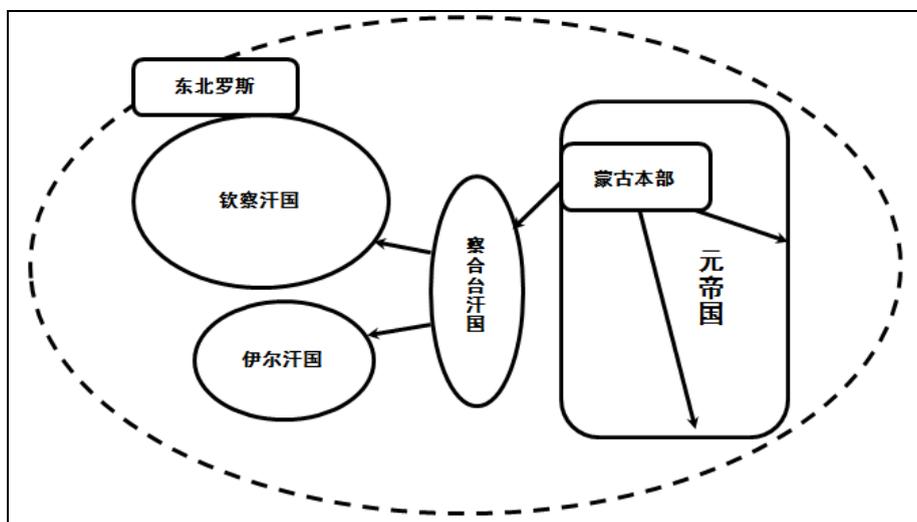


图3 蒙古帝国架构内的欧亚空间形态

基辅的沦陷及随后蒙古军队在东欧地区的持续胜利带来了区域政治空间的重大调整。在13世纪中叶，欧亚内陆的广阔区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系统地整合到了同一个政治架构中，一个相对完整的欧亚空间——此刻

① 关于“长子西征”，最权威的记载来自《元史·太宗本纪》，载曰：“太宗七年，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还可参见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台湾联经出版社，1979年，第270节；以及[伊朗]费志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三十八章、第三十九章。

② 参见 Селезнев Ю.В.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понятия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ское иго»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заметк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2. №.4.

“欧亚”的概念尚未出现，空间的名字是蒙古帝国——的雏形在 13 世纪便首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很大程度上，13 世纪欧亚空间能够完成整合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毕竟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无论是东亚的农业帝国还是相当弱小的欧洲诸国，实际上都没有跨越整个欧亚大陆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更遑论整合整个欧亚空间。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仍从属于相互独立的文明圈，虽然会有少量的商贸和人员联系，但基本上仍处于相互孤立和隔绝的状态。然而，13 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出现与蒙古帝国的崛起，令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足够强大的草原游牧霸权。在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蒙古人拥有了一支战斗力远远凌驾于同时代欧亚大陆诸大国之上的军事力量。到 13 世纪中叶，东到长江流域，西至东欧平原，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域都被纳入到蒙古帝国的总体政治框架之中，开启了欧亚区域空间建构的新的一页。<sup>①</sup>

在欧亚空间的建构史上，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由欧亚内陆的草原文明主导的欧亚空间建构运动。因此，蒙古帝国框架内的欧亚空间与后来的空间形态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特殊性：

一方面，蒙古帝国建构欧亚空间的唯一凭籍只有强大的军事权力，这就意味着欧亚空间很难在蒙古帝国的框架下形成稳定且有效的区域秩序。缺少稳定根基的区域空间很难持久。

从国家治理能力来说，相比于欧亚大陆上已经存续近千年的王朝或帝国，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缺乏足够的文明积累，蒙古人独特的草原生活方式也使其缺乏处理定居的农业区和欧洲城邦的治理经验。因此，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无法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超越原有区域的治理方案和全新的秩序内容，甚至在蒙古帝国的框架内，帝国本身的一体化也注定是短暂的。

在多次东征与西征之后，蒙古帝国名义上的疆域已经过于辽阔，受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方式与速度，单一中心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对整个帝国区域实

---

<sup>①</sup> 在 13 世纪中叶，蒙古军队西征的步伐基本达到极限。但在这一时间点上，蒙古与南宋的战争仍维持在长江一线，直到 1279 年南宋才最终灭亡。然而，1260 年，忽必烈虽然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中获胜，但其他蒙古汗国拒绝承认忽必烈为蒙古大汗。蒙古帝国的内部政治结构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变化。

施有效的管辖。于是，成吉思汗按照蒙古传统习俗，将帝国领地分给四个儿子分别统领，并以三子窝阔台为大汗，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sup>①</sup>然而，这种治理模式最大的风险在于，当帝国框架内部的诸多汗国分别独立管理之后，必须与汗国领地的文化、宗教与经济相结合才能实现有效治理。很快，各汗国内部的凝聚力就超越了帝国框架本身的意义，而蒙古选择大汗的忽里勒台制度又为这种内部倾轧提供了条件。分散的治理系统逐渐取代帝国框架，统一的区域内将逐渐形成多种性质不同的次区域秩序，这就在很短的时间内事实上消解了现存的区域空间。

1241年冬，在蒙古军队攻克基辅一年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汗便去世了。在随后的10年里，四大汗国围绕着继承人问题展开了多次博弈，直到1252年，蒙哥才在拔都的全力支持下终于成为获得四大汗国共同认可的蒙古大汗。然而，仅仅7年之后，蒙哥就在对南宋的战争中意外身亡。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了汗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忽必烈获得了胜利，并且毫无疑问地拥有了蒙古本部与汉地的控制权。忽必烈于1260年宣布自己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但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其他汗国的认可。1271年，忽必烈依照汉制建元称帝，建立元朝，并定都于大都。于是，在蒙古帝国的东方部分，一种更加适应中国本土的治理方式逐渐成形，并且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正如格鲁塞所说，“一个中国-蒙古帝国开始产生，而蒙古帝国就它原来的意义来说已经消失”。<sup>②</sup>在13世纪60年代以后，蒙古帝国实际在政治体制上已经转变成一种松散的政治结构，但联络整个欧亚空间的驿道和遍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商贸网络仍然蓬勃发展，贸易和联动使得曾经一度非常乏味的欧亚内陆再次成为繁荣的贸易空间。<sup>③</sup>

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国框架下的欧亚空间，在其有限的存在时间里仍然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轨迹，成为今日俄罗斯国家形态的重要塑造者。

---

① 杉山正明将其称之为“中央政权外有多个政治权力核心的一种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参见[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2页。

②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60-261页。

③ 参见[日]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

虽然从差不多 8 世纪开始，罗斯国家就一直受到草原游牧部族的骚扰，但此前任何来自东方草原的力量，都无法与蒙古帝国整合欧亚空间的行动相提并论。作为这一时期欧亚空间的西部边界，罗斯国家的发展轨迹从根本上被钦察汗国的建立所改变了。

蒙古征服加快了基辅罗斯的衰落和瓦解的步伐，莫斯科逐渐取代基辅，成为罗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征服罗斯国家之后，拔都将自己的统治中心设在阿斯特拉罕附近的萨莱（Sarai）。这里是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不仅水草丰美，而且临近哈萨克草原，更有利于历代钦察汗参与蒙古帝国事务。而对于地理相对偏远的罗斯国家，则采取扶持代理人的方法进行间接统治。于是，钦察汗设立了“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头衔，作为自己在东北罗斯地区收缴赋税、实施政治统治的代理人。从 14 世纪初开始，莫斯科大公以牺牲其他试图反抗蒙古人的罗斯公国为代价，获得了世袭这一头衔的权利，最终在诸多东北罗斯国家中脱颖而出，主导了俄罗斯的统一进程。<sup>①</sup>

当然，初次生成的欧亚空间对于俄罗斯的塑造作用远不止于此，很多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微妙变化，都在未来俄罗斯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痕迹。由于钦察汗国对于南俄草原的控制，罗斯国家的经济政治重心完全转向东北，割裂了基辅罗斯时代罗斯国家与拜占庭的紧密联系，也进一步隔绝了罗斯与西欧的交往，使得俄罗斯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完成了国家建构，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历史记忆。由于蒙古自身治理能力的缺失，无力将自己的秩序与文化灌输给罗斯国家，仅仅满足于成为罗斯的宗主，因此，在蒙古人的统治结束后，俄罗斯仍然赓续了东正教的传统，使之成为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的根基，但在其精神文化中，则或多或少地融入了东方草原民族的精神气质，包括强烈的不安全感和对于占有空间的渴望。从此，“在俄罗斯的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sup>②</sup>，逐渐构建了俄罗斯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特殊身份认同，这种微妙的差异对于未来俄罗斯的发展以及

---

①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7-19 页；相关影响还可参见 Donald Ostrowski, *Muscovy and the Mongols: Cross-cultural Influences on the Steppe Fronti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第 2 页。

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宣布诸罗斯国家不再效忠可汗，蒙古帝国架构在欧亚空间中的最后一块版图宣告崩塌，新的统一的俄罗斯专制国家取代封建制的罗斯国家出现在欧亚空间的西侧。其实，在此之前100多年，蒙古帝国所建立的统一欧亚空间就已经实际瓦解。1335年，统治中东地区的伊尔汗国瓦解；1368年，明朝军队收复大都，元朝的统治宣告终结；1370年，帖木儿帝国建立，察合台汗国实际灭亡。曾经在同一帝国架构内实现整合的欧亚空间，在其出现大约百年之后归于解体。

平心而论，欧亚空间在13世纪的突然出现更像是一次历史的偶然事件。从理论上说，13世纪的人类社会还缺乏足够的科技水平和治理体系，无法承担起为如此庞大的空间提供内生秩序的任务。事实上，作为区域核心行为体、推动完成这次空间整合过程的，是当时在欧亚大陆上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蒙古帝国，这几乎注定了这次空间构建过程难以持久，因为“你可以在马背上赢得一个帝国，但绝无可能在马鞍上治理它”<sup>①</sup>，缺乏内生性秩序供给能力的欧亚空间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然而，这次“提前到来”的空间整合，对于俄罗斯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出现实际上深刻地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将东方庞大空间的历史记忆像种子一样埋在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深处，并且给予了它未来在东方与西方之间选择和对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次早熟的欧亚空间建构，在随后的历史中就像警钟一样，时时提醒着欧亚大陆大国：整合欧亚空间的尝试是可能成功的，一旦其他大国主导了空间整合过程，就将在国际竞争中占据巨大优势。在几个世纪之后，当科技和人文等各项条件充分完备之后，俄罗斯也同样沿着蒙古帝国曾经走过的道路，再次开始了整合欧亚空间的尝试，以此作为帝国扩张的方向。而它在这一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与遭遇的挫折，都可以从蒙古帝国的欧亚空间建构过程中找到根源。

---

①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烨、卿文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 （二）欧亚空间的形成：边缘大陆帝国的扩张

在蒙古帝国瓦解之后，欧亚空间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大体上保持了碎片化的状态，而恰恰就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世界的形态被彻底改变了。

在 15-17 世纪，人类重新发现了世界。地理大发现使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欧洲航海家在几百年间开始在全球海域展开探索，海洋从阻断人类联系的地理障碍，变为联通世界的纽带，建构在海洋运输基础上的新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渐成为支撑世界经济运行的基础。

在 18 世纪中叶，人类又重新定义了力量。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使得机器取代了手工劳动，令人类的生产能力突飞猛进，同时带动了人类的社会结构、政治体系、思想理念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到 18 世纪末，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欧洲国家已经创造并积累出了先前世代难以想象的财富与力量，他们有能力克服现有的地理阻隔，打破世界原有的碎片化状态，将自己所奉行的体系和原则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在这一时刻，欧亚内陆空间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闭塞与衰落。在地理大发现之后，海洋成为承载全球贸易的主要通道，关键的海峡、岛屿和港口成为资本和人口新的聚集地。与之相对应的是，欧亚内陆区域却成了全球资本流通和贸易往来的“边缘地带”。<sup>①</sup>因此，在 18 世纪以后，欧亚内陆地区就几乎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位置，现代秩序只能以外部输入的方式进入欧亚内陆。于是，哪个国家用何种的方式将这一区域纳入新兴的现代世界体系，就成为 18 世纪末欧亚大陆政治建构与空间建构的核心任务。而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历史节点上，真正有能力整合欧亚内陆空间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个，即处于 19 世纪全球体系核心位置的英国和当时欧亚内陆最具地缘优势的欧陆强国——俄罗斯帝国。

作为 19 世纪唯一的工业化强国，英国是现代世界体系向全球推广的主要动力。英国行动的底层逻辑在于初步工业化之后所引发的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全球工业制成品生产的“世界工厂”，它需要凭借全球最强

---

<sup>①</sup> 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形态，可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郭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大的海军力量，来维持全球贸易通道的畅通，并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打开全球农业国的大门，使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自己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种逻辑在政治上的外在表现，就是迫使原本分散的各个区域接受全球性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国际法体系，尽可能减少其内部阻碍贸易的各种要素。<sup>①</sup>因此，英国有动力去尝试整合欧亚内陆的碎片化空间。然而，阻碍英国参与欧亚空间整合进程的障碍也非常强大。英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地位源于海洋，它的海外殖民地体系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深入内陆对于英国来说是风险极大的行动。如果英国试图将欧亚内陆区域整合进它的体系中，那么只能采取由南向北的方式，即以英属印度为跳板，整合突厥斯坦地区（即现在除哈萨克斯坦之外的中亚大部分地区）和阿富汗，对于其他区域则鞭长莫及，收益相对有限。这便给了俄罗斯帝国历史性的机会。

19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在自己的东方所面对的地缘形势，可以说是相当有利的。作为欧洲东部边缘的帝国，从彼得大帝开始，俄罗斯就在全面学习欧洲，源源不断从欧洲吸收先进的思想与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后，俄罗斯和所有欧洲国家一样，实际上具备了压倒欧亚内陆地区其他区域文明的力量。与欧洲大陆各国相互牵制、相互平衡的“均势”状态不同，俄罗斯在东方所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真空地带。工业的发展和热兵器的广泛使用，使草原民族永久性地失去了自己的军事优势。虽然俄罗斯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力量，还无法与当时英、法等先进的工业国比肩，但对于欧亚区域各游牧民族和汗国来说，已经是难以抵挡的力量了。从 16 世纪开始，俄国人在西伯利亚进行了长期的探险和征服行动。由于西伯利亚严酷的地理环境，除了 17 世纪末在黑龙江流域与清朝发生了武装冲突之外，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重要力量的阻挠。到 18 世纪初，整个西伯利亚地区都被纳入了俄国版图。<sup>②</sup>

---

① 参见 Niall Ferguson, *Empire: The Rise and Demise of the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 London: Penguin, 2002.

② 参见[俄]齐保鲁哈：《征服西伯利亚——从叶尔马克到白令》，杨海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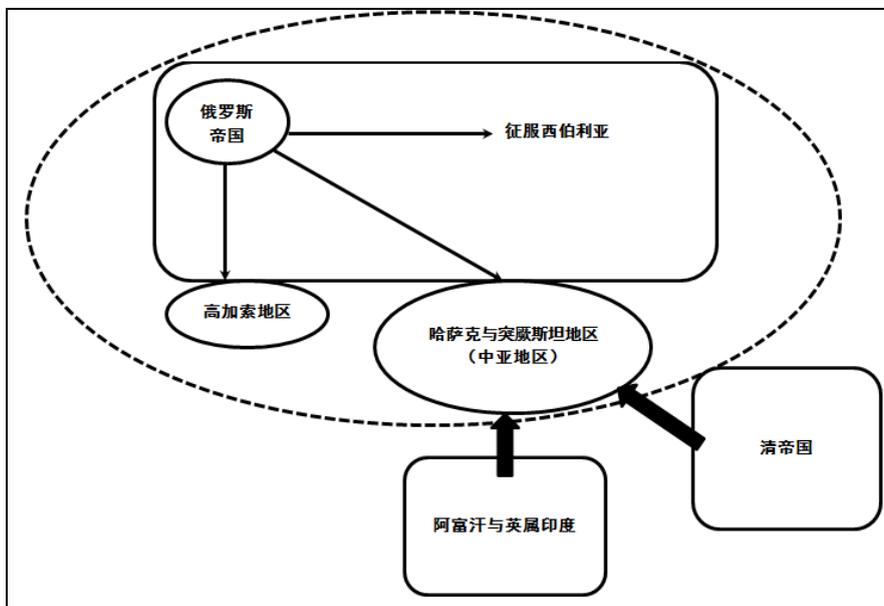


图 4 俄罗斯帝国架构内的欧亚空间形态

直到 19 世纪初，当俄国人在欧亚地区的扩张指向南方，并初步控制了高加索地区时，作为当时世界体系霸权国的英国才开始关注俄罗斯人在欧亚腹地的行动。事实上，与其说英国人关注俄国人在欧亚内陆的扩张，不如说是关注俄国的行动会不会构成对英国在亚洲殖民地的威胁，矛盾的关键就在于英国王冠上的明珠——印度。<sup>①</sup>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俄国加速了自己在中亚地区的行动，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俄罗斯就消灭了中亚地区三个汗国，将该区域纳入自己的版图，并且继续向东、南两个方向推进。<sup>②</sup>为此，英国在 19 世纪 70 年代发动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将阿富汗变为英国的保护

① 关于英俄两国对中亚的争夺，参见 Peter Hopkirk, *The Great Game: On Secret Service in High Asia*,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2006；也可参考杜哲元：“反思英俄中亚‘大博弈’——进程、实质、特点及历史镜鉴意义”，《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4 期，第 163-196 页。

② 详细进程可参考[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焯、卿文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57-358 页；王治来：《中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26-259 页。

国，作为英属印度与俄国力量的缓冲地带。<sup>①</sup>而在东线，关键的战役同样发生在 19 世纪 70 年代。1877 年，左宗棠率领清军收复新疆，并率军紧逼俄国控制的伊犁，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伊犁条约》，确定了双方的边界。<sup>②</sup>最终，到 19 世纪末，由俄罗斯帝国推动构建的欧亚空间的地理范围基本稳定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期间虽然其空间外延有过多次反复，但构成空间的核心地理范围一直维持在 19 世纪末的版图基础上。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欧亚空间整合完毕，除中东部分地区外，整个欧亚大陆都被纳入了现代世界体系的版图，新的经济与政治逻辑开始主导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亚洲的历史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视角看待 200 多年前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会发现，由俄罗斯主导欧亚空间的整合进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在现代世界体系推进过程中，已经被一步步边缘化的欧亚内陆空间，无力自行建构适应新的生产形态的区域秩序，不得不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获得新的秩序安排。而此时能够对欧亚大陆提供这种外生性秩序的力量，只有代表海洋帝国扩张模式的英国与在欧亚大陆上代表大陆帝国模式的俄罗斯。由于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远离国际贸易主航道，对于海洋帝国的吸引力有限。于是，在这种不平衡的竞争过程中，被迫加入大陆帝国的秩序体系几乎就成了他们从外部被“赋予”现代秩序的唯一宿命。

以英国为代表的海洋帝国，擅长建立殖民地体系，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构建符合自身利益需要的秩序网络；而作为欧洲边缘帝国的俄罗斯尚不具备这种更先进的秩序提供能力，加上其自身政治体制的集权特点，由它所推动的欧亚空间整合过程的外在表现形式，便是大陆帝国的领土扩张。<sup>③</sup>事实上，这两种治理层面的制度安排虽然存在明显差别，但推动这两种空间整

---

① 参见施展：“阿富汗的宿命与帝国地理”，《大观》，第八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年；也可参考姚远梅：“杜兰德线：侵略阿富汗的泥潭——从十九世纪英国人建立‘科学边界’说起”，《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五期，第 37-61 页。

② 关于左宗棠收复新疆相关情况可参见秦翰才：《左宗棠全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

③ 需要说明的是，在 19 世纪，殖民地体系和大陆帝国体系实际上都是当时世界上常见的制度性安排，对于这种制度形态进行道德上的普遍谴责是在 20 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流行之后才出现的。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的时候需要注意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

合模式的底层逻辑并无二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领土扩张的原动力也是工业经济体系转型的需求。在 1861 年废除农奴制之后，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也在悄然加速。但与英国等先进工业国相比，俄国的工业品在质量和价格上都没有竞争力，且无法通过海洋控制原料产地，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尽可能多地将欧亚内陆纳入俄罗斯帝国的框架，获得更多的市场和原料控制权，是支撑俄罗斯工业化发展的基石。欧亚空间，特别是其中的中亚区域，对于俄罗斯来说可谓重中之重。<sup>①</sup>

毋庸讳言，俄罗斯在高加索、中亚地区的扩张，对于当地居民和游牧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也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对欧亚空间的整合，实际上迫使上述区域内的文明与民族，接受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秩序规则。俄国扩张的出发点无疑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但客观上也承担了将欧洲诞生的基本秩序原则——尽管是打了折扣的——推广到欧亚内陆的历史使命，“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sup>②</sup>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现代体系全球推广的过程中，海洋方向的推进是世界历史的主线，而大陆推进则是一条支线。因为俄罗斯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在与欧洲强国交往的过程中习得的，是欧洲工业文明在欧洲边缘区域的映射。<sup>③</sup>相比于海洋帝国所建立的贸易体系，由俄罗斯帝国框架所建构的欧亚内陆贸易体系，从质量上讲是相对落后的，从形式上看也是相对封闭的。在与已经被海洋秩序所整合的空间展开直接竞争时，欧亚空间往往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当欧亚空间逐渐接近海洋秩序的辐射范围时，它的扩张过程就会被遏制，其边界被限制在帕米尔高原等亚洲内陆区域。亚洲沿海区域则普遍接受英国主导的区域秩序，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条件下等待着

---

① 其实，这种状态已经为后来大陆秩序相对封闭的市场体系埋下了伏笔。此外，中亚对于欧亚空间的重要作用在 20-21 世纪展现得更加清晰，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中亚地区的发展方向几乎成为能够决定欧亚空间存续与否的问题。在后续章节中，我们还将进一步分析和论述。

② [德]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66 页。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文中说的是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解释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空间整合活动。

③ 参见 Dominic Lieven, *Empire on Europe's Periphery: Russian and Western Comparisons*, in Alexei Miller and Alfred J. Rieber(eds), *Imperial Rule*, Budapest and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内部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总而言之，如果说 13 世纪蒙古帝国推动的欧亚空间的第一次整合，是一次“早熟”的历史事件，那么在 19 世纪以俄罗斯帝国架构为基础的欧亚空间的第二次整合，则是历史发展“瓜熟蒂落”的产物。如果说 13 世纪是欧亚空间塑造了俄罗斯，那么到了 19 世纪，则是俄罗斯塑造了欧亚空间。推动 19 世纪欧亚空间形成的直接力量，是俄罗斯帝国的权力和地缘优势。在俄国冒险家几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下，西伯利亚等自古以来的无主地与高加索、中亚地区一起，构成了统一的欧亚空间。作为当时欧亚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大陆帝国，俄罗斯以本国的政治架构为欧亚空间的整合提供了机制上的支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业化生产方式所推动的区域空间发展的底层逻辑。从这层意义上讲，它与英国一样，肩负着历史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消灭旧的亚洲社会，另一个是建设的使命在亚洲奠定西方社会的物质基础”<sup>①</sup>。在空间建构的过程中，俄罗斯获得了重大的战略利益，不仅实现了对欧亚区域广阔领土的控制权，而且以此支持自己在技术与制度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能够持续参与全球大国竞争。但每当与海洋秩序所建构的空间出现拉锯和竞争时，欧亚空间相对弱勢的地位也非常明显地暴露出来，时时提醒着俄罗斯关于欧亚秩序本身的弱点与局限性。在 20 世纪到来之际，作为欧亚空间建构基础的大陆帝国架构本身，已经走到了这种政治形态生命周期的尾声。如果希望在后帝国时代以新的秩序内容维持欧亚空间的存在与发展，就需要在欧亚空间内部探寻更加具有普世意义的内生性秩序体系。

### （三）欧亚空间的兴衰：建构全球秩序的理想

1917 年，俄罗斯帝国瓦解，由俄罗斯主导创建的欧亚空间遭遇了它形成以来的第一次危机。革命的洪流冲垮了罗曼诺夫王朝，更重要的是，20 世纪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思潮彻底消解了帝国的政治与道德合法性基础，维系欧亚空间存在的基础制度架构，随着俄罗斯帝国的瓦解而烟消云散了。

当 1918 年俄国内战爆发时，恐怕很少有人相信俄共（布）能够继续维

---

<sup>①</sup> [德]卡尔·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768 页。

持旧有的欧亚空间。来自欧亚空间内部各地的大小小白军武装多达 20 多支，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独立武装。协约国集团对白军提供了物质支援，并派遣少量军队直接参战，还在一段时间内对俄国海岸线进行了封锁，一时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似乎岌岌可危。<sup>①</sup>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俄共（布）在经过短时间的慌乱之后，很快稳住了阵脚，并且迅速调集力量展开反攻，到 1920 年底，就已基本肃清了俄国境内的白军，协约国干涉军大体上也都撤离了俄国，随后又逐次解决了少数民族独立运动。<sup>②</sup>

对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最终获胜的原因，历史学家和革命家们已经有非常多的解释，在此不再赘述。<sup>③</sup>但从欧亚空间的视角来看，这一结果的出现，再次证明了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欧亚空间内部的力量还远远无法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相抗衡，海洋秩序对于深入欧亚空间也仍然心存忌惮。在对自身力量进行了充分动员之后，红军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全面压倒了白军，迅速扭转了战局。而协约国军队始终不敢过于深入内陆，尽量避免与红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虽然欧亚空间的基础架构被革命所摧垮，但空间内部的自发秩序和空间外部的海洋秩序尚未做好重构空间的准备，布尔什维克政权继承俄罗斯帝国的衣钵，继续维持欧亚空间完整性的时间窗口仍然存在。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间点上，新生的苏俄政权需要解决很多问题才能维护欧亚空间的稳定，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在俄罗斯帝国瓦解后为欧亚空间提供新的秩序内容。这种新的秩序内容在范围上需要能够承载俄罗斯帝国的主要地理空间，又要在理论逻辑上容纳新兴的民族主义思想，同时，还要为欧亚空间诸多政治行为体提供有吸引力的政治框架与经济建设方案。按理

---

① 参见 Jonathan Smele, *The 'Russian' Civil Wars, 1916–1926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van Mawdsley, *The Russian Civil War*,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07;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② 列宁自己也并未事先预料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他在 1920 年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将其称为“历史奇迹”。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159 页。

③ 相关观点可参见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pp.808-824; E.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3, London: Macmillan, 1952.

说，同时满足各方面要求的秩序建构，在旧有理论框架中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 1922 年，俄共以一种剑走偏锋的方式重新构建了欧亚空间的基础架构，在短时间内几乎同时解决了关于秩序建构的所有问题，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的方式重新支撑起了一度濒临破碎的欧亚空间，并在 20 世纪中叶使欧亚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然而，当欧亚空间的势力和影响达到顶峰时，该架构内部根基不稳的固有缺点，却又在激烈的秩序竞争中被无限放大。最终无力承载过于庞大而臃肿的上层架构，在达到顶峰后不过几十年的时间里便土崩瓦解，上演了一出人类历史的悲喜剧。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 20 世纪欧亚空间的演进历程，那就是“成也苏联模式，败也苏联模式”。

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苏联模式在 20 世纪以前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念，是以人类为基本单位的普世性理念，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和引申，苏维埃政权将民族和民族主义解释为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现象，既肯定其进步意义，又认为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对其进行消解。为此，在现实的政治安排上，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没有在上位国家名称中保留“俄罗斯”这个沿用了数百年的具有明确民族特征的名字，而是采用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特殊架构。从理论上说，这一政治架构是超越民族国家架构之上的，所有独立的民族国家都可以在接受社会主义理念的基础上以平等身份加入联盟。在理想的情况下，苏联是没有确定的边界的，它所占据的空间可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扩展而无限延展。<sup>①</sup>在这种政治架构的逻辑指导下，苏联成为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在保证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占据了国际竞争中的道德制高点，成为很多亚非拉新生的民族主义政权所期望和憧憬的理想模式。

除了理论叙事与创造性的政治安排之外，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所采取的经济建设方案，似乎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1928 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以制定严格的经济发展计划，利用从农业集

---

<sup>①</sup> 关于苏联国家性的相关问题，可参考一篇有趣且深刻的对话体文章：施展、冯绍雷：“关于苏联、民族国家与‘人’-‘地’关系的对话”，《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2 期，第 137-143 页。

体化安排中累积的资金，并通过压低实际工资等方式，实现对工业化生产过程持续不断的投资，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重工业高速发展的目标。这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实质，是通过政治力量动员国家的人力和所有资源，去完成经济体系中的局部目标（重工业），并以此为逻辑起点，重新构建国家内部的经济体系。<sup>①</sup>这种经济方案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而是源于苏联领导人的建设经验，属于苏联的“原创”。时至今日，由于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当然可以很轻易地指出它的种种不足。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世界各国所看到情景与我们今天的感受大不一样。苏联在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实际上只有两个半，第三个五年计划被战争所打断），经济总量大幅增加，工业产值跃升至世界第二。拥有了高度工业化的建设体系支撑，军队从数量到武器装备都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在工业化进程的带动下，原本贫瘠的西伯利亚开始融入全国经济体系，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认知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凭借这种发展模式，苏联成功地避开了 30 年代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并且在 40 年代具备了与纳粹德国在战场上正面对抗的能力。在 30-40 年代，几乎所有亚非拉国家都有类似的认知，即“相对落后的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五年计划……是一条有效的捷径。”<sup>②</sup>

1945 年，当苏联红军将红旗插上柏林城头时，欧亚空间和它所代表的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肯定。长期以来作为现代世界体系全球扩展支线的欧亚空间，首次独立提出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秩序理论体系，大陆秩序第一次具备了成为世界秩序的潜力。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欧亚空间的边界得到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拓展。这一阶段欧亚空间的扩张以两种方式进行，一方面，在苏联军事力量的推动下，波罗的海三国成为苏联新的加盟共和国，而东欧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在苏联直接的军事占领下移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诸多亚非拉地区的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基于对苏联发展模式的向往，主动选择了苏联秩序，客观上也成为欧亚空间的一部分。

于是，如图 5 所示，以苏联模式作为基础架构的欧亚空间形成了类似中

---

① 参见 Já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第七版），杨焯、卿文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485 页。

心——外围结构的扩张形态，苏联领土本身在 19-20 世纪欧亚空间核心范围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扩展，继续构成新时期欧亚空间的中心架构。而东欧地区、中国及朝鲜半岛、中南半岛部分国家同样接受了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欧亚秩序的主要内容，并且以此为标准对于本国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管理方式进行积极调整，以社会主义阵营架构为基础构成了广义上的欧亚空间的外围区域。而且在冷战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欧亚空间的外围区域都保持着扩大的趋势。在 20 世纪后半叶，欧亚空间的地理范围达到了历史上的顶点，西起东欧平原，东到太平洋沿岸，南到东南亚地区，都成为广义上欧亚空间的组成部分。而欧亚空间所代表的特殊的大陆秩序也在很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推动了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为现代世界体系完成全球扩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长期处于次要地位的大陆秩序在与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秩序竞争过程中所取得的最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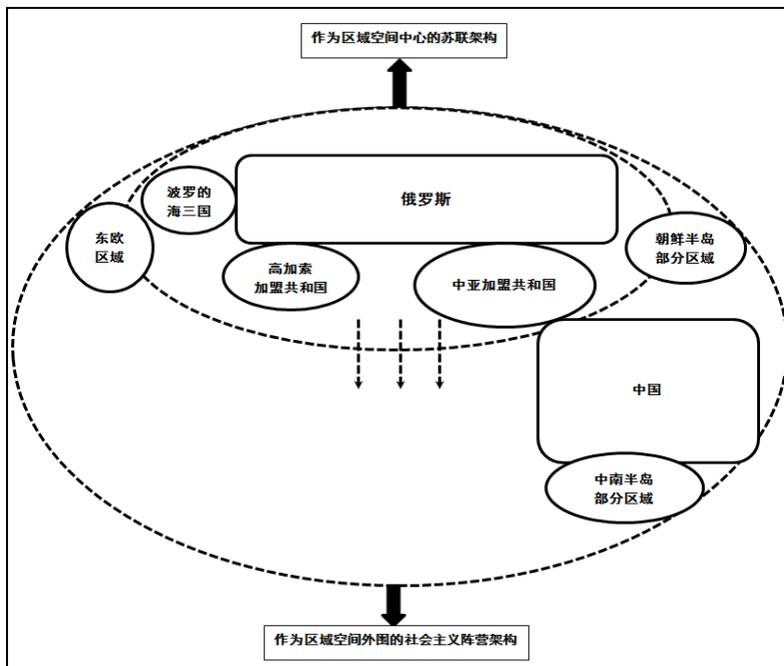


图 5 冷战时期中心——外围架构内的欧亚空间形态

事实上，在参与欧亚空间的问题上，部分东欧国家是由于地缘战略位置而被迫加入，但对于很多亚洲国家来说，接受欧亚秩序无疑是主动的选择。大部分历史悠久的亚洲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推进的过程中，都被迫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战后获得独立国家地位后，对于国家复兴的渴望异常急迫。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发展经验对于亚洲国家的吸引力是无法替代的。客观地说，战后苏联对于亚洲国家的支持，也为很多亚洲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sup>①</sup>在各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欧亚空间达到了其辉煌的顶点，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内，欧亚空间便盛极而衰，并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再次瓦解。

一切问题的根源还是经济。空间秩序建构的底层逻辑对于整个空间的存续至关重要。随着冷战竞争的延续，计划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开始暴露出来。苏联所奉行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跛脚”的增长，集中于重工业生产的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特定目标的进步，但生产资料投入的异常集中和分配方面的刻意扭曲，都注定了这种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从长时段来看，苏联经济的本质是一种短缺经济。<sup>②</sup>社会需要的产品、资源和服务长期处于短缺状态，无法满足人民生活的长期需要。同时，苛刻的计划虽然能够在一些传统工业产业方面取得成果，但无法为社会带来技术创新的土壤。缺少市场和价格机制调节的经济是没有创造力的，军工产业的技术进步无法转化为社会经济的推动力，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新科技革命的出现，苏联经济很快便在竞争中落后了。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联经济的发展几乎全部维系在能源产业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sup>③</sup>

在经济层面出现问题后，政治层面的麻烦也接踵而至。在苏联的政治理论叙事中，以国际主义、阶级斗争等叙事取代民族主义叙事，作为重新界定

---

① 例如，苏联的援助对于新中国建国之初形成工业领域的基础能力就非常重要，苏联早期对华援助的相关问题，可参考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年。

② 参见 János Kornai, *Economics of Shortage (Volume A)*, Amsterdam: Elsevier Science, 1980.

③ 关于苏联后期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困难，可参见 Philip Hanson, *From Stagnation to Catastroika: Commentaries on the Soviet Economy, 1983-1991*, New York and London: Praeger, 1992.

各政治行为体的核心逻辑。在这种逻辑下形成的世界共产党联合体系，在各国开展民族独立运动时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在欧亚空间各民族国家纷纷独立以后，民族主义的坚强内核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发挥其重要作用。民族国家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产物，也是现代国家体系推进过程中所建构的基本单元。在政治实践中，苏联本身会以自身的利益为标准做出战略选择，而各国也会根据本国的利益需要制定政策。宏大理论与微观实践之间的张力，会严重拉扯原本稳定的欧亚空间。空间内具有较强自主性的国家会重新反思自己的秩序选择，而相对弱小的国家只能选择克制与隐忍。欧亚空间在政治叙事无法落地的情况下，就被迫以权力的手段强迫相关国家留在欧亚空间中，整个空间的意义也就重新变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然而，随着苏联自身经济发展困难的加重，以权力手段维系空间形式上的统一，会变得越发困难。当分离力量最终超越苏联权力的极限，欧亚空间就会最终解体。

事实上，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欧亚空间的解体进程就已经开始。中苏之间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秩序问题而产生的裂隙在 60 年代之后逐渐变得不可调和，欧亚空间的东方外围区域变得不再稳定。1972 年，中断了数十年的中美关系再次实现了正常化，中国也进入了重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区域空间归属的新周期。80 年代末，东欧各国又以极端的方式摆脱了欧亚空间，试图返回重新整合后的欧洲空间。1991 年，造成欧亚空间瓦解的这股力量终于反噬苏联本身，民族主义的力量推翻了苏联设定的超越民族的政治架构，苏联架构土崩瓦解。解体之后宣布独立的 15 个共和国，全部恢复了代表民族历史的国名和政治制度，欧亚空间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了。

总的来说，20 世纪对于欧亚空间来说是一个大起大落的时代。在这个世纪，欧亚空间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将欧亚秩序提升为一种世界秩序。作为 20 世纪欧亚空间的基础架构，苏联在理论上设计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政治形态，并且提供了系统的秩序建设方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新的方案被那些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现代化路径。在这种情况下，欧亚空间投入到了一场新时代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的竞争之中。然而，经过战后 50 多年的实践，竞争的结果证明，以苏联模式为核心的欧亚秩序存在严重的内在问题，不仅无法成为世界秩序，而且无法长期为欧亚

空间提供稳定的秩序安排。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来时，欧亚空间庞杂冗繁的政治架构最终压垮了它脆弱的根基，苏联以解体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历史，而欧亚空间也迎来了第二次危机。

#### （四）欧亚空间的现状：第二次危机

在与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的竞争中，曾一度取得优势的大陆秩序最终仍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苏联的解体标志着在 20 世纪维持欧亚空间的中心架构崩塌，欧亚空间的核心行为体——俄罗斯，陷入了复杂而曲折的转型进程，欧亚空间也开始出现衰朽的迹象。

与 20 世纪初的第一次危机相比，本次危机对于欧亚空间的消极影响更加深远。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区域一体化组织在 20 世纪下半叶广泛出现，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sup>①</sup>作为区域一体化进程的自然结果，全球各区域秩序之间的竞争逐渐激烈，通过秩序竞争的优势获取空间，成为各区域的重要拓展方式。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历史性的秩序竞争的失败，不仅严重损害了欧亚空间的深层次结构，而且几乎彻底改变了欧亚空间各国社会精英对于欧亚秩序的认知，寻求新的更有效的秩序安排成为各国本能的选择。这种思想理念层面的变动，进一步加剧了欧亚空间重新整合的难度。<sup>②</sup>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部分维系欧亚空间的机制性安排逐渐失灵的情况下，欧亚空间重构的时间窗口已经越来越窄。

当前，欧亚空间所面临的多种问题可以用一个词加以概括，那就是“内忧外患”。

---

① 全球范围内建设最为成功的两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恰恰是位于西欧空间的欧洲联盟（EU）和位于亚太空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这与上述两个区域在冷战后的拓展具有正相关关系。相关研究可参见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Alan Collins, *Building a People-Oriented Security Community the ASEAN Way*,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Ben Rosamond, *Theori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Colette Mazzucelli, *France and Germany at Maastricht: Politics and Negotiations to Create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等等

② 在冷战结束之初，全球知识界对于海洋秩序的自信达到顶点，将其视为人类社会的终极秩序，“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状态的集中体现。参见[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所谓“外患”，指的欧亚空间所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出现了重大转变。从工业革命以来，始终弱于欧亚空间的东亚、东南亚地区迅速崛起，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空间结构。身处以欧盟体系为基础的西欧空间和以东亚-东南亚制造业产业链为基础的亚太空间之间的欧亚空间，逐渐成为欧亚大陆的“发展洼地”，在秩序竞争中显露出全方位落后的迹象。欧亚空间的边缘区域已经出现了身份认同转换的现象，从 20 世纪 70 年代即已开始的衰朽趋势仍在延续。

经过冷战结束后几十年的发展，西欧与亚太两大区域空间已经同北美地区一起并列为全球三大经济中心，二者同时兼具资本聚集地、贸易网络枢纽以及更加完整的产业价值链等重大优势，在经济总量和发展潜力方面都远超欧亚空间，而且差距变得越来越大。<sup>①</sup>区域的综合实力提升与秩序影响力的扩大，必然会在空间形态上有所反映。于是，我们看到，在欧亚空间的西部边界，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各国在冷战后彻底调整了区域身份认同，以加入欧盟的方式融入西欧空间。而在欧亚空间的东部边界，除中国的身份转换之外，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加入东南亚联盟的方式，调整了自己的身份认同，成为这一时期迅速整合的亚太空间的重要成员。<sup>②</sup>由于区域空间变动过程的速度过快，在两个空间交界的边缘地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例如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东部先后爆发的武装冲突，实际上就是区域空间变动所诱发的权力对抗。<sup>③</sup>

所谓“内忧”，指的是中亚国家内部的“去俄化”进程，具有逐渐消解欧亚空间实际意义的可能。在苏联体系崩解之后，从 19 世纪俄罗斯帝国时期开始就一直处于统一政治行为体之内的欧亚空间的核心区域首次分裂成

---

① 根据 IMF 统计数据，2018 年欧盟 GDP 达到 18.29 万亿美元，亚太地区的 GDP 更是达到了 30.12 万亿美元。而整个欧亚空间的经济总量仍在 4 万亿上下徘徊。这种巨大的差异在未来仍将继续扩大。参见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19: Growth Slowdown, Precarious Recovery, April, 2019,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9/03/28/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19>

② 关于东南亚国家身份变化问题，可参见封帅：“变动中的平衡：东盟在亚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东南亚研究》，2017 年第 4 期，第 1-18 页。

③ 实际上，亨廷顿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对于这种发生在区域空间边缘的冲突给予了充分关注，但他将其解释为发生在文明断层线的战争。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282-285 页。

为多个国家。而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之后，高加索地区部分区域和乌克兰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欧亚空间。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及中亚地区已经成为欧亚空间仅有的覆盖范围。因此，对于俄罗斯来说，维持中亚地区国家身份认同的稳定已经成为保持现有欧亚空间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然而，这个任务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历史上从未建立过现代国家形态的中亚五国，在脱离苏联框架之后，最迫切的任务是尽快完成自身的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进程。这一进程的核心则是完成对本民族、本国历史过程的叙述，并以此为基础，自上而下地灌输新的历史和文化体系，建构自身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独特身份。对于中亚五国来说，这种叙事的基础就是“去俄化”。

实际上，在 20 世纪以苏联架构完成欧亚空间的整合之前，整个中亚区域从未有过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1924 年，俄共（布）基于战略层面的考量，人为地在中亚地区推动了民族区分和国家划界的进程，“制造”了中亚地区五个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sup>①</sup>在苏联时期的历史叙事中，主要强调俄罗斯人是中亚各民族的老大哥，是领导中亚各国走向更加美好未来的领导者，中亚民族是通过联盟的方式自愿加入苏联大家庭的。但在中亚五国独立后，这样的历史叙事逻辑显然不利于国家和民族建构。为此，中亚国家普遍选择了一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即强化苏联时期之前本民族的辉煌历史，将苏联时期阐释为俄国人对本民族的统治与压迫。这样既可以在民族历史中找到能够代表民族精神的符号，建立起主体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又可以为本国的独立找到合理的解释。<sup>②</sup>从这个意义上看，中亚国家的国家和民族建构过程必然就是一个“去俄化”的过程。除了历史叙事的调整之外，中亚国家也通过语言文字、建筑符号、城市名称的调整推进民族建构，但所有行为

---

① 关于苏联时期中亚地区的划界过程可参见 Хахалин В.К.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ая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нации: постановка проблемы на основ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разграничению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0г.; 张娜：“中亚‘民族划界’及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世界民族》，2008 年第 2 期，第 72-81 页。

② 关于中亚国家建构民族和国家认同的相关问题，可参见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93-154 页。

的逻辑也都以“去俄化”的方式强化自我的身份认同。除此之外，中亚国家也在积极尝试寻找来自其他区域空间的要素补充本国的身份建构，并且坚持国际化发展思路，对于各种涉中亚地区的多边机制安排保持开放态度。<sup>①</sup>

中亚地区不断推进的“去俄化”进程是苏联架构崩塌之后，新独立国家推进国家建构的必然逻辑，但作为当前欧亚空间内除俄罗斯本土之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亚地区新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使欧亚空间的存续充满了风险。无论是中亚地区自身一体化进程加速，逐渐形成内生性的区域秩序，还是通过其他国际化发展路径，接受其他区域空间的秩序安排，改变自己的区域认同，都将意味着中亚国家脱离欧亚空间。当前的欧亚空间一旦失去了中亚地区，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独立的区域空间的意义，其结果只能是走向衰朽甚至瓦解。

事实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俄罗斯一直没有停止过巩固欧亚空间的努力，其基本目标是能够维持一个除波罗的海三国之外的 12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范围的欧亚空间。为此，俄罗斯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试图以独联体机制作为空间的基础架构，并且通过独联体框架内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为该区域提供安全秩序，通过欧亚经济联盟为该区域提供经济秩序。<sup>②</sup>然而，这些在制度层面上的安排并未取得很好的效果，其根本原因还是源于经济的底层逻辑。欧亚空间作为欧亚大陆上的资本流动洼地，渐渐与全球关键的产业链出现了区隔，除了能源产业外，已经很难从全球贸易中获得较大收益。所以，区域空间内各国自然需要采取措施，与其他空间的更有效的产业链建立有机联系，身份认同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新独立各国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的逻辑又同时指向“去俄化”，与俄罗斯主导的区域多边机制形成了对冲。因此，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的逆向驱动力的作用下，俄罗斯所希望的空间内部秩序整合过程，始终无法完成。

迄今为止，欧亚空间的第二次危机仍在继续，俄罗斯尚未找到应对危机

---

① 例如，伊斯兰因素、突厥语国家因素，都被引入中亚国家的身份认同建构过程中，使得中亚国家的国家建构变得更为复杂。

② 参见 Denis Degterev, Konstantin Kurylev(eds),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CIS States: A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9; Bertil Nygren, *The Rebuilding of Greater Russia: Puti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CIS Count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的有效方案。如果迟迟没有合理有效的秩序体系对欧亚空间内核加以支撑，仅凭维系在文化、语言和历史记忆基础上的有限空间内聚力，会随着代际更替的实现而不断削弱。一旦经济的底层逻辑与现有机制、文化之间的张力达到无法维持的程度，我们就有可能在几十年后见证欧亚大陆内区域空间的新一轮系统性重组，其结果也将对世界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表 1 欧亚空间演变的历史轨迹

	蒙古帝国时期	俄罗斯帝国时期	苏联时期	后冷战时期
时间跨度	13 世纪 40 年代至 15 世纪 80 年代	16 世纪至 1917 年	1922-1991 年	1991 年至今
标志性事件	1240 年基辅陷落； 1368 年元顺帝退出大都； 1480 年伊凡三世宣布不再效忠钦察汗国	16-18 世纪俄罗斯吞并西伯利亚； 19 世纪俄罗斯控制高加索地区； 19 世纪 70 年代俄罗斯吞并中亚地区	1922 年苏联成立；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2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1991 年苏联解体	1991 年苏联解体； 2002 年欧盟东扩； 2008 年俄格冲突； 2013 年乌克兰危机；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
地理范围	当代除南亚、东南亚地区之外的几乎所有亚洲地区，以及今俄罗斯全境及部分东欧地区	目前的俄罗斯全境、东欧部分地区（除巴尔干地区）、北欧芬兰地区、土耳其的部分区域、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全境	中心区域包括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外围区域包括除苏联外欧亚大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全部领土	俄罗斯、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中亚五国区域（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先后脱离欧亚空间）
核心架构	蒙古帝国架构	俄罗斯帝国架构	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构成的中心—外围双层架构	正在调整与构建中的多边机制协作架构
表现形态	由相对独立的四大汗国分别管理所辖区域，元帝国皇帝名义上为蒙古大汗，但无法干涉各汗国内部事务	这一阶段的欧亚空间表现为统一的沙俄帝国，从彼得一世开始，沙皇拥有对全部领土专制且无限的权力，1905 年后转变为不完善的君主立宪制政体	在前期表现为作为冷战一方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后期外围的部分国家出现脱离空间的现象	俄罗斯尝试以独联体为基础，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为安全与经济支柱，以此重构欧亚空间基础架构，但效果不佳
区域秩序	缺乏统一的区域秩序，各汗国通过蒙古传统和当地治理习惯进行较为松散的治理；汗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对很多被征服地区保持宗主权	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秩序在整个区域空间内推广	苏联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空间内具有排他性的话语权；空间内国家普遍以苏联为模板，建立起系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治理体系	俄罗斯在现有的区域空间内仍具有较大的议程设定话语权，但整体区域秩序尚未稳定，秩序重构进程仍很漫长

	蒙古帝国时期	俄罗斯帝国时期	苏联时期	后冷战时期
俄罗斯的地位	罗斯国家成为钦察汗国属地，构成了欧亚空间的西部边界	俄罗斯帝国自身构成了欧亚空间	苏联是整个欧亚空间的主导者，其自身力量成为欧亚空间构建的核心，其影响力辐射范围构成了空间的边界	俄罗斯仍然是欧亚空间的核心国家，但对于整个空间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
欧亚空间与中国的关系	蒙古最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成为欧亚帝国的东方部分	中国作为阻止欧亚空间向东扩展的主要力量，决定了欧亚空间的东部边界	前期是欧亚空间外围层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后实际上主动退出了欧亚空间	中国成为新兴的亚太空间的核心成员，并且与欧亚空间各国建立了稳定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表 1 所示，从 13 世纪至今，欧亚空间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发展过程在大体上符合空间演变的一般规律（参见图 2），但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也展现出自己独特的底色，正是这些内容直接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轨迹，我们也可以从欧亚空间发展进程中总结出其演变的核心线索：

第一，欧亚空间本质上是历史上俄罗斯的权力扩张在空间维度上的反映。毫无疑问，欧亚空间的核心行为体是俄罗斯。从 16 世纪开始，欧亚空间的整合过程就始终由俄罗斯的力量所推动，在此后绝大部分历史时段，都是由俄罗斯决定着欧亚空间的发展方向。俄罗斯自身向东和向南的扩张结果造就了当前欧亚空间的基本形态。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欧亚空间与帝国形态的俄罗斯领土完全重合。因此，经过数百年的不懈经营，俄罗斯将自己的影响镌刻在整个欧亚空间中，使自身与空间形成了牢固的纽带，这也是俄罗斯在当前欧亚空间中所获得的特殊政治地位和影响力的根源。

第二，欧亚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核心区域，从而构成了欧亚空间的基石。欧亚空间的核心范围实际上就是“1+3”区域，其中的“1”指的是统一的俄罗斯本土，这是整个欧亚空间的力量根源。而“3”指的是与俄罗斯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三大地理区域，即位于欧洲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位于欧亚交界地带高加索三国，以及位于亚洲的中亚五国。白、俄两国与俄罗斯拥有共同的历史起源，而高加索和中亚国家是 19 世纪俄罗斯帝国扩张的产物。他们共同构成了俄罗斯在帝国时代的基础政治架构，在统一的政治框架内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记忆，始终扮演着欧亚空间基石的角

色。尽管在扩张周期内，欧亚空间秩序能够延展到其他地理空间中，甚至能够把部分非核心区域在形式上纳入俄罗斯国家框架之内（例如波罗的海三国），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时间与文化积淀，这些外来区域始终无法成为欧亚空间的核心。俄罗斯对于核心区域的关切与其他地区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可以部分解释俄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立场。同时，核心区域政治状态的变化也给了我们一个观察欧亚空间当代发展变化的视角，让我们能够通过核心区域的变化来解释整个欧亚空间的发展状况。

第三，欧亚空间所孕育的区域秩序是一种在漫长历史积累中逐渐成形的具有俄罗斯文明底色的大陆秩序。欧亚空间是全球地理空间中距离海洋贸易主航道最远的区域，也是欧亚内陆草原文明成长的家园。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在这一区域生活的人民以特殊的文化传统，任何外来秩序的输入也必须与本地文化基因融合才能够实际发挥作用。作为这一区域的整合力量，位于欧洲边缘的俄罗斯本身也是欧洲文明的“另类”，它虽然积极学习欧洲文明的技术与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大陆帝国的行为方式和秩序建构逻辑。在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欧亚空间在漫长的历史建构过程中孕育出了具有明确自我特征的大陆秩序体系，在这一秩序体系中，对于集体主义、等级秩序等关键要素的认知都具有明显的俄罗斯文化色彩。这与英美等海洋国家所主导的、依托于全球自由贸易和国际法权体系的现代世界体系存在着很难弥合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差异的存在决定了 20 世纪人类历史的基本走向，在 21 世纪也仍然在规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模式。

第四，欧亚空间正徘徊于发展与衰朽的十字路口。自冷战结束起，欧亚空间就一直在寻找更为有效的基础架构与秩序体系。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独联体架构在欧亚区域内各种事件的冲击下已被严重削弱，集安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也有待进一步观察。在新架构长期缺位的状态下，其他区域空间对于欧亚空间的挤压已渐成大势，欧亚空间的边缘地区一再萎缩。进入 21 世纪以后，欧亚空间的危机逐渐蔓延到欧亚空间的核心区域，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发生“颜色革命”，欧亚空间的核心区域变得不再稳定。2008 年的俄格冲突与 2013 年的乌克兰危机，实际上形成了乌克兰与格鲁吉亚强行脱离欧亚空间的负面结果，此外，中亚地区越发深入的社会

“去俄化”趋势也在拆解欧亚空间在中亚区域的根基。毋庸讳言，危机已经在欧亚空间的核心区域逐渐蔓延，整个欧亚空间已经走到了是发展还是衰朽的十字路口。空间层面的衰朽是俄罗斯自身力量萎缩的现实反映，在现有各项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很难摆脱衰退周期给本国和欧亚空间带来的消极影响。

事实上，目前摆在俄罗斯面前的欧亚空间只有两种可能的前景：其一是尽可能拖慢各种负面因素发挥作用的速度，努力维持现有欧亚空间部分核心区域的稳定，以便争取时间寻找更加合理的空间秩序与基础架构。其二是彻底调整对于欧亚空间的认知，尝试引入更多的外部秩序与要素，推动欧亚空间参与到更广泛的亚太空间的整合进程中去，在复杂的重构过程中重新定义自我的身份和利益。前者更加稳健，但很可能意味着欧亚空间在衰朽的道路上持续滑落。后者需要勇气，即能否以向死而生的决心突破传统的发展路径，推动更加深刻而系统的改革进程，在更广泛的空间内寻求新的发展机遇。这恐怕也是历史对当代俄罗斯精英所提出的重大命题。

#### 四、拒斥与拥抱：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复杂联系

在我们详细分解了欧亚空间发展与成长的百年历史之后，就自然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对欧亚空间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者换言之，我们应如何定位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关系？

这显然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漫长的 800 年里，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关系经历了多次反复，双方复杂的纽带对于欧亚空间的发展轨迹和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在欧亚空间迄今为止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中，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关系各不相同，从未出现重复。但从深层次的结构关系来看，四种看上去各不相同的关系其实存在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如表 1 所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看上去若即若离、时远时近的联系给予适当的分析和总结，这样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加深刻地理解欧亚空间成长过程受到的外部影响。

在蒙古帝国时期，作为欧亚空间向东扩展的最后一步，中国最终成为欧

亚空间的一部分，与罗斯国家一起构成了 13 世纪欧亚空间的東西边界。<sup>①</sup>在这一阶段，中国加入欧亚空间并非自己主动的选择，而是无力抵抗蒙古帝国军事力量的结果。但中国成为欧亚空间的一部分，对于欧亚空间内贸易网络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为整个欧亚空间提供了充足的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欧亚空间商贸繁荣的核心驱动力。当然，由于蒙古帝国在治理体系和文化方面相对落后，这段加入欧亚空间的短暂历史并没有改变中国本身的秩序特征和发展轨迹。几十年后，随着明朝的建立，中国便退出了欧亚空间，并且重新构建了稳定的东亚区域秩序。

在俄罗斯帝国时期，已经进入清朝的中国成为欧亚空间向东扩张的主要阻碍力量。在俄罗斯向西伯利亚扩张的过程中，就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了冲突，并且通过《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双方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势力界限。在 19 世纪俄罗斯吞并中亚汗国的过程中，清军再次进入新疆，平定阿古柏乱军，对于伊犁及其以东地区实现了有效控制，牢牢地将欧亚空间向东扩张的势头挡在了伊犁以西。事实上，驱动中国逐步加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主要力量来自海洋秩序，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从海洋方向逐步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海洋秩序的力量在给中国造成痛苦的同时，也迫使中国一步步接受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规则。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的各种内部改革进程也是以海洋秩序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仅有力地维护了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欧亚空间与东亚区域空间边界的大体走向，对于未来亚洲史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苏联时期，中国再次成为欧亚空间的一部分，这也是整个欧亚空间发展史上中国唯一主动选择欧亚空间的尝试。促成这一状态的原因有很多，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选择源于 20 世纪曲折而痛苦的国家建构过程，以及当时欧亚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威望与影响力。中国同很多新兴的民族国家一样，迫切地希望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大陆秩序，

---

<sup>①</sup> 部分中国学者曾经尝试探索过一个有趣的议题，即中俄曾共同经历的蒙古帝国统治时期的历史对于中俄两国文化交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该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理解 13 世纪欧亚空间的内部运行状态提供参考，参见郭小丽：“13-14 世纪中俄文化认同的趋同性”，《俄罗斯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168-192 页。

恰在这一时期被视为快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捷径。客观地说，这一选择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随着实践经验的累积，逐渐显现出该模式的局限。此外，随着中苏两国在主权国家层面的交往逐渐深入后，区域秩序与政策利益之间的认知差异越发明显，最终变得不可调和。于是，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逐步退出了欧亚秩序的范围，重新开始寻找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这也是欧亚空间发展史上短暂却重要的一段插曲。从事后来看，由于中国的选择使得冷战时期的秩序竞争朝着越发不利于大陆秩序的方向倾斜，实际上加快了这一时期欧亚空间的瓦解进程。但也正是由于中国较早地退出了欧亚秩序，空间解体时对于中国的冲击相对可控，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埋下了伏笔。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复杂的重构过程。中国显然已经不再是欧亚空间的一部分，但由于亚太空间在后冷战时期的强势扩展，中国与欧亚空间成员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变得更加活跃，这也将成为影响欧亚空间未来变动的外部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在欧亚空间的发展史上，中国先后两次成为欧亚空间的组成部分，但持续的时间都较为短暂。而在大部分历史时段，中国都是欧亚空间发展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其影响有时表现为对欧亚空间扩张的限制，有时则表现为对于欧亚空间内秩序重构的引导和塑造。

当然，无论中国是拥抱欧亚秩序还是拒斥欧亚秩序，都是特定时期欧亚空间影响力与中国自身的发展状态充分互动的结果。在各种差异化的关系形态背后，有着一致的生成逻辑：

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中国并不是欧亚空间的天然成员，拒斥以权力为手段的欧亚空间扩张，是中国与欧亚空间关系的主线。作为雅思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文明国家，中国早在欧亚空间诞生之前，就已经活跃在世界历史中，并以亚洲东部最重要的政治实体身份，承担着区域秩序的核心提供者的角色。<sup>①</sup>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作为东亚地区农耕文明的主要代表，中国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步将自己的影响力从受季风气候影响的农业区逐渐扩展到欧亚草原地区。从空间角度看，中国力量的自我延

---

① [德]卡尔·雅思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 73 页。

展使中国获得了陆海兼备的特征,也使得中国在力量扩张周期内能够达到欧亚内陆地区,从而与欧亚空间形成有效互动。很久以来,中国都将东亚“小世界”的秩序安排视为普遍的世界秩序,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也是人类早期区域帝国的普遍状态。<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来自西北方向草原地区的欧亚区域内的所有政治力量,都保持着文化上的轻视态度,将欧亚空间视为东亚空间的边疆区域需要处理的“问题”,或者说是对于东亚秩序的挑战。这种认知状态即使在进入现代国际体系之后,也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一旦欧亚空间的权力扩张进程触及东亚或亚太区域空间的范围,中国自然就会承担起拒斥欧亚空间扩张的责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欧亚空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遏制欧亚空间向东扩张的重要力量。而且凭借在欧亚大陆较强的国家力量,中国大部分的时间里都能够将欧亚空间的权力扩张至少遏止在帕米尔高原一线。唯一的例外是蒙古帝国时期,由于其军事权力优势过大,中国和整个欧亚大陆一样,被迫纳入欧亚空间。

另一方面,在被卷入现代国际体系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在寻找最适合自身获得现代性并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秩序安排,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所有可能成为主流国际秩序的区域秩序安排,这也使得中国在 20 世纪一度拥抱了欧亚空间。英国通过海洋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是从海洋向陆地方向次第推进的,这也是中国当代国内发展阶梯式状态的渊源之一。长期以来,中国显然都属于海洋秩序体系的一部分,然而,作为一个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后发展国家,艰难的转型过程使得中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自身在海洋秩序中所处的角色并不满意。国内政治和文化精英,也都在积极寻找可能的更有效发展路径,而此时欧亚秩序的快速崛起吸引了中国的目光。<sup>②</sup>作为被动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国,对于各种区域秩序安排并无感情上的倾向,而更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同区

---

① 当代研究者常常把中国所主导的东亚的区域体系抽象为“天下体系”,虽然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其实并不准确,但这种概括确实把当时中国将自己所在的区域秩序视为普世秩序的重要特点展示了出来。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 关于欧亚空间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影响,可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域秩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威望与影响力，对于中国态度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在以苏联模式为核心的欧亚秩序展现出全球影响力的历史时刻，中国也接受了其核心规则，并主动成为欧亚空间的一部分。可以说，凭借秩序影响力而推进的欧亚空间反而吸引了中国的加入。客观地说，欧亚秩序对于中国国内的统一和早期工业化基础的形成，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在其积极意义逐渐消耗殆尽时，中国再次选择了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重新探索符合本国需要的发展道路。二十年间“一进一出”的选择，更加直接地反映了中方的实用主义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的态度，使中方相对容易地摆脱了可能的教条桎梏，在时代变更的背景下始终保持了快速发展的状态。

综上所述，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欧亚空间不同的扩展方式与中国特定的发展状况相结合，会形成具有明显差异的关系形态。在冷战结束后近 30 年的时间里，中国再次见证了欧亚大陆上区域空间的分裂与重组过程，西欧空间的扩展、亚太空间的崛起与欧亚空间的衰朽几乎同步发生。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关系建构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以客观和冷静的心态看待中国与欧亚空间的关系，任何区域空间的发展都必然会有起落周期，我们既不应妄自菲薄，也不应盲目自大。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开放与学习的心态，根据现实情况冷静处理，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中国与欧亚空间协调发展的合理方案。

## 五、结语：在空间维度上记录历史

有的历史被刻在甲骨上，有的历史被写在书册上，但那些最长久的记忆会被直接记录在空间中。空间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但只要人和国家参与了空间的建构，空间就会被赋予独特的生命。每个历史悠久的世界大国都会在空间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并且用空间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展示出自己的力量 and 影响，当它用足够长的时间来雕琢空间之后，空间就会被打上它的烙印，从而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维度。

欧亚空间的历史就与俄罗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它曾经塑造了俄罗斯，但在更多的时候则是它被俄罗斯所塑造。这片深深嵌入欧亚腹地的广袤空间

是全球所有地理空间中离海洋贸易通道最远的地方，而俄罗斯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与区域特点结合在一起，在欧亚大陆深处创造了大陆秩序的试验场。

经过蒙古征服的洗礼，逐步成长为欧洲边缘帝国的俄罗斯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将原本游离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西伯利亚地区纳入欧亚空间的版图，并且借助现代工业文明的力量，将欧亚空间的边界向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持续推进，最终建构出欧亚空间的核心区域，使整个欧亚大陆都被纳入了现代国际体系之中。在苏联模式出现之后，借助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成就，欧亚空间所代表的大陆秩序在全球获得了空前的威望，欧亚空间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机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在与海洋秩序的全面竞争中仍然以失败告终，欧亚空间再次进入危机与重构的进程之中。欧亚空间的演变进程与中国的成长过程相互交织，双方的反复互动对中俄两国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空间的演变轨迹清楚地记录了俄罗斯的兴衰治乱，在相同的地理空间中所建构的各种性质不同，效果迥异的秩序安排也成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欧亚大陆总体的国际社会演进的重要线索。欧亚空间案例并非这种研究方式的唯一有效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具有较长建构历史的区域空间，都能够通过空间史研究的方式加以考察。借助历史地理学和空间政治学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基础，从长时段视角出发，累积不同语言文字所形成的历史档案，我们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探寻不同区域空间，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演变历程，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段对世界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空间路径可以给区域研究带去更加新颖的视角和观点，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Abstract】** Space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recording history. The change of power and influences of any important political actor will eventually be reflected in spac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regional macro-issues from the dimension of space could provide a novel and effectiv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er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gional spaces in the world, the Eurasian space has been closely linked to Russia since its inception. As a regional projection of

Russian power, the Eurasian space has shaped Russia, and vice versa. The Eurasian space, located in the continental hinterland, is the furthest place from the maritime trade route in the world. Here Russia combines its own language, cultur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o create a testing ground for continental order. After the baptism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expedition from the East, Russia, with its industrial power from Europe, gradually grew into an important empire on the edge of Europe. In the course of several hundred-year expansions, it incorporated the Siberian region, the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which has been outside the world history, into a common regional space. Thus the core layout of the Eurasian space has been forme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as the apex of the then continental order, the Soviet model gained great prestige and expanded the non-core region of the Eurasian space as never before. However, in the all-round competition with the ocean order, its inherent defects are fully exposed, 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a new stage of cris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Eurasian space.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Eurasian space not only reflects the general law of regional space evolution, but also shows obvious particularities in many important nodes. The evolution of Eurasia space and China's growth are intertwined,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China and Russia.

**【Key Words】** Eurasian Space, Russian Empire, the Soviet Model,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Аннотац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ым инструментом истории, а мощь и влияние любых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акторов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отражается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м измерени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макропроблем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го измерения может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м новую и эффективную аналит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С момента создан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как одно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странств в мире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о с Россией. Как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кар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ласти,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 Россию и само было сформировано Росс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районах материка — самое дальнее расстояние от морских торговых каналов во всех геопространствах мира. Россия, объединив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культуру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здала испытательный полигон континент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После креще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я, полагаясь на 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мощью Европы,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важную империю на краю Европы, которая в процессе расширения в течение сотен лет включила сибирский регион, а также Кавказ и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изначальное находившиеся вне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в обще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формируя тем самым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карту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 победой в войне против фашизма советская модель, которая в то время переживала кульминацию материко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приобрела большой авторитет, и неосвоенные регионы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достигли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Однако в общей конкуренции с морским порядком его внутрен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были полностью раскрыты, что в итоге привело к новому этапу кризиса и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не только отражает общий закон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й эволюции, но и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очевидную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во многих важных моментах. Эволюция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процесс роста Китая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ы и оказали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советская модель,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评析\*

朱永彪 魏丽珺\*\*

**【内容提要】**中亚地区战略地位特殊,吸引着大国的持续关注。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是中亚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大国,但它们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分布程度不一、侧重不同。中美俄在中亚影响力的具体分布态势,可以通过对可操作指标的赋值评估得出。对指标的赋值虽然简化了评估的程序,但其解释问题的独特意义不容忽视。根据评估,2014-2018年间,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呈现出俄罗斯首屈一指、美国和中国基本并驾齐驱的竞争态势。影响力的具体分布情况也一目了然,即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除了在政治方面较弱外,在其余三个方面的分布都较为平衡,基本介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广泛分布于政治、军事、安全、文化和经济领域;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关键词】**中美俄大国关系 俄罗斯与中亚 美国与中亚 中国与中亚

**【中图分类号】**D851.2;D837.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5-0073(35)

\*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中亚地区的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XGJ001)、2019年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9jbkyjd018)的阶段性成果。

\*\* 朱永彪,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魏丽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的互动不断增多，主要体现在领导人和高级别的互访、企业合作以及民间往来等各方面。同时，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展开、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上升更为确信，认为中国已成为中亚地区大国博弈中的重要一员，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甚至有超越俄美的趋势。而早在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亚各国进行了穿梭访问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了《中国在中亚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一文，指出中国已经开始取代美国和俄罗斯，成为在中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sup>①</sup>

然而，在塔吉克斯坦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1），展现了中美俄在中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和安全方面，近1/3的调查对象认为俄罗斯的影响力最大，接下来是美国和中国；在经济方面，有超过1/3的调查对象认为，中国在促进中亚经济发展方面的形象是积极的，说明中国在经济方面对中亚的影响力较大。该调查还显示了在文化方面对中亚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是伊朗和土耳其，而且有将近1/10的人认为文化方面美国在中亚的形象是负面的。同样的调查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也进行过，关于大国在中亚的角色的调查结果与在塔吉克斯坦调查的结果类似，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给予了肯定。在哈、吉的调查显示，将近80%的人比较肯定俄罗斯在中亚的积极影响。同时，在吉尔吉斯斯坦，有超过60%的人对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持负面态度，中国在除了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力都是介于美俄之间。<sup>②</sup>民意调查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但究竟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排序如何，三国的影响力具体又是如何分布的，需要更加有说服力的研究。

---

① Martha Brill Olcott, “China’s Unmatched Influence In Central As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18, 2013,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9/18/china-s-unmatched-influence-in-central-asia-pub-53035>

② “Central Asia Barometer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转引自 William Kennedy,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power: What is motivating China to adopt soft power strategies and how effective have these strategies been?”, Master Thesis, Major of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eit van Amsterdam, June 2016, pp.47-48.

表1 调查问题（塔吉克斯坦）：你认为下列国家在中亚扮演什么角色？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伊朗	欧盟	土耳其
积极-维护安全与稳定	11.4%	30.5%	11.4%	10.2%	9.1%	10.3%
积极-促进经济发展	8.9%	25.3%	35.1%	14.5%	9.3%	21.2%
积极-促进文化进步与发展	1%	1.5%	1.3%	15.9%	4.3%	6.3%
中立-对地区事务无重要影响	10.7%	4.1%	4.6%	7.4%	11.3%	6.8%
消极-导致不稳定	7.5%	1.3%	2.7%	1.6%	1.3%	2.7%
消极-干预地区事务	4.8%	1.4%	2.1%	0.3%	1.8%	1.1%
消极-植入其文化与道德	8.7%	4.9%	5.8%	5.2%	4.3%	5.3%
不知道/无答案	47.1%	31%	37.2%	44.9%	58.6%	46.3%

资料来源：William Kennedy,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power: What is motivating China to adopt soft power strategies and how effective have these strategies been?”, p.45.

## 一、现有研究状况

中美俄三国在与中亚的互动过程中，对中亚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三国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大国，无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区域层面，都有着各自不同程度的影响力。尽管有一些调查反映了中美俄三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但对三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是怎样体现的、大小强弱如何分布、如何用数值进行直观评估、评估基于何种依据等问题，还缺乏详细分析。

笔者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筛选与考察，并将其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提及大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时不得不考虑大国和中亚的双边关系，国内外的中亚研究有大量成果探讨了中亚国家与单独的某一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其二，直接和本文相关的、综合考虑外部大国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的研究，即与大国在中亚地区博弈的相关研究。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主要关注某一大国（主要是中美俄三国）中亚政策的演变过程，该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具体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中亚国家发展及大国关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近年来，国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较为充分。高祖贵、肖斌、曾向红等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美国的中亚政策及其对中亚的

影响<sup>①</sup>；杨恕、赵常庆、王晓军等分别讨论了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军事联系以及双边关系的新发展<sup>②</sup>；邢广程、吴宏伟、柳丰华等分别讨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与经济贸易等关系<sup>③</sup>；另外，还有诸多关于欧盟、印度、日本等国对中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sup>④</sup>。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中美俄三国，故不在此一一讨论。另外，吴宏伟、孙力等主编的《中亚国家发展报告》也对中亚问题及外部国家与中亚国家的互动关系有所涉猎。

然而，目前国内对中亚与大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仍不够系统和深入，而国外研究对系统性的把握相对较早。在美国对中亚的影响力方面，国外学者如尼尔·麦克法兰(S.Neil MacFarlane)，较早地注意到系统地研究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的特征与影响的重要性。<sup>⑤</sup>兰德公司的报告中也有通过整体论述美国在中亚的利益，以尝试把握美国在中亚的政策重心和军事角色<sup>⑥</sup>的研究。

---

① 曾向红：“美国参与中亚事务的主要途径及其效果研究”，《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第54-84页；曾向红：“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第34-61页；高祖贵：“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分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5年第2期，第73-79页；肖斌：“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载孙力、吴宏伟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4-135页。

② 杨恕、杨倩：“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第33-36页；赵常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6年第11期，第1-6页；王晓军：“俄罗斯中亚地区军事安全战略与军事政策解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1年第1期，第26-31页。

③ 邢广程：“中国和中亚各国：新的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1期，第58-65页；吴宏伟：“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关系”，《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1年第6期，第1-7页；柳丰华：“中国在中亚：政策的演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7年第6期，第63-72页。

④ 关于日本、欧盟与印度等行为体对中亚影响力的论述可参见朱永彪、杨恕：“日本与中亚接近的原因探析”，《日本学刊》，2007年第2期，第47-57页；曾向红：“欧盟在中亚地区所面临的挑战解析——欧盟新中亚战略出台背景透视”，《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6期，第65-72页；周明：“试析冷战后印度中亚政策的转变”，《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15-29页；张诚：“印度的中亚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新疆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64-68页。

⑤ S. Neil MacFarla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4, Vol.80, No.3, pp.447-461.

⑥ Olga Oliker and David A. Shlapak,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olicy Priorities and Military Roles”, *Rand, Project Air Force, MG-338-AF*, 2005, p.5. <https://www.rand.org/paf.html>

在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方面，安娜·马特维耶娃（Anna Matveeva）持续关注着俄罗斯在中亚安全问题上的角色的变化，认为这种角色是不断变化着的，有时也是相互矛盾的。同时，她讨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在考虑成本-收益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安全政策会如何变化？<sup>①</sup>另外，也有学者对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减弱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俄罗斯也在用多种策略来应对这一趋势，包括经济、能源、多边组织、侨民以及俄罗斯的文化和教育等。<sup>②</sup>

在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国外学者对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拉塞尔·昂（Russell Ong）在审视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在中亚的利益进行了探讨，认为经济是中国在中亚影响力的基础。他认为，中国通常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因此中国与其他大国在中亚的战略竞争难以避免。另外，他还深入讨论了中国在中亚安全利益范畴下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问题。<sup>③</sup>在“软实力”方面，国外研究探讨了人口、语言等因素对中国中亚政策的重要性，还分析了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传播中发挥的作用，并表明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工作虽在学界和政界很受欢迎，但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很多局限。<sup>④</sup>

审视大国与中亚的关系及其对中亚的影响是本文研究的基础，而综合考察多个大国与中亚的关系、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及其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国内研究成果来看，赵华胜和赵常庆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突出。赵华胜选取了军事安全、经济能源、人文联系和国家形象四个角度，分析了中美俄三国在诸领域各自的状态和变化，并对它们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比较，认为美国在中亚的战略权重从高峰滑向低谷，中国和俄罗斯则从低处走向高峰，优势开始向中俄转移。他还把在中亚的大国关系视为一个整体现

---

① Anna Matveeva, "Russia's changing security role in Central Asia", *European Security*, 2013, Vol.22, No.4, p.478.

② James Nixey, "The Long Goodbye: Waning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South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 *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 2012. pp.1-5.

③ Russell Ong, "China's security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5, Vol.24, No.4, pp.425-439.

④ Ainur Nogayeva, "Limitations of Chinese 'Soft Power' in Its Population and Language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 *Geopolitics*, 2015, Vol.20, No.3, pp.583-605.

象，试图从宏观上对大国与中亚的关系、性质和特点进行探讨，认为在中亚地区，大国关系最终将形成什么状态尚无定论，其演变仍存在多种趋势和可能。<sup>①</sup>赵常庆在探讨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同时，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在论述中亚地区大国博弈时的一大缺陷是：忽视了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中亚国家的立场，只以大国的意图为出发点，没有充分考虑到目前大国能较为顺利地进入中亚的原因。他指出，“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并非毫无阻力、毫无区别、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sup>②</sup>。

关于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国外研究主要有两种看法：

第一，既有成果倾向于将中亚地区看作一个“国际紧张”地区，围绕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新”大国博弈正在该地区进行，这种竞争与地区内的事务相互影响。<sup>③</sup>相关成果涉及美国、俄罗斯、中国、南亚、乃至伊朗和土耳其等在中亚博弈的不同状态<sup>④</sup>，并提出中亚地区内外事务的复杂特性，是阻碍地区安全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因素。<sup>⑤</sup>

第二，对“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这种言辞进行批评。例如，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认为，对于大国博弈的担心颇有夸大其词之嫌。<sup>⑥</sup>中亚最重要的外部国家中美俄三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竞争，并不直接挑战这些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且竞争的结构压力也不利于三国在中亚地区开展有益的合作。三个大国虽然都有在中亚争夺能源资源和军事优势的动机，但它们也有较为可观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方面。在地区安全机制框架内开展相关合作，无疑有助于满足各国在上述方面的利益需求。同时，中美俄三国在中亚也有很多理由进行合作，尽管每个国家在中亚

---

① 赵华胜：“中亚与大国关系”，《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第1-8页。

② 赵常庆：“大国博弈与中亚国家的立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1-74页。

③ Zvi Magen, Olena Bagno-Moldavsky, “The Big Game: The Great Powers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Strategic Assessment*, 2010, Vol.12, No.4, p.115.

④ Rajan Menon,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Survival*, 2003, Vol.45, No.2, p.187.

⑤ Kirill Nourzhanov, “Changing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s in Central As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09, Vol.63, No.1, p.87.

⑥ Richard Weitz, “Averting a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06, Vol.29, No.3, pp.155-167.

都有各自的目标，但可利用的资源毕竟有限。鉴于此，三国在实现各自目标的过程中，如能有效地开展合作，便可减少冗余，利用协同效应筹集资金和其他稀缺资源。以竞争为主导的政策则不利于各国把握合作机会。

与前两种鼓吹和批评的论调不同的是，还有将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竞争视为一种“囚徒困境”<sup>①</sup>的观点。俄罗斯学者巴塔洛夫（Eduard Batalov）指出，美俄发现各自在中亚处于两难境地：“当一方（A）试图加强自身的安全时，无意中引发了另一方（B）的担忧，B从而采取一定的对策化解其担忧，然后整个过程不断循环”，结果双方的对峙立场随之更为鲜明了。<sup>②</sup>

另外，亚历山大·库利（Alexander Cooley）较早地关注了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问题，其著作《大博弈与地区规则：中亚的“新”大国竞赛》<sup>③</sup>，将国际关系理论和经验数据结合起来，讨论了大国（以中美俄为主）和中亚地区之间的角色互动，认为中美俄都设法在“9·11”事件后的中亚实现战略利益的均衡。同时，库利也论证了这场博弈中仍然存在着赢家与败者<sup>④</sup>，并对中亚地区的大国战略发展进行了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

结合上述文献回顾不难发现，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成果颇为丰硕。其中，对中亚地区大国博弈的讨论较多，但对中美俄对中亚影响力进行具体比较的成果较少，且相关成果未能涵盖近年来的情况。当然，与“大国影响力评估”相关的参考资料并不稀缺。<sup>⑤</sup>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审

---

① Sergei Dorofeev, “Russian and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2013, Vol.51, No.1, pp.7-24.

② Баталов Э.Я. Миров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Анализ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й//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измерении. Москва, 2005, p.257, quoted from Sergei Dorofeev, “Russian and U.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p.7.

③ Alexander Cooley, *Great Games, Local Rules: 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④ Mamuka Tsereteli, “Winners and Losers of Strategic Games in Central Asia”, *Asia Policy, Book Review Roundtable*, July 2013, No.16, pp.167-170.

⑤ 关于大国影响力及相关评估的研究可参见 Melvin M. Mark, Gary T. Henry, “The Mechanisms and Outcomes of Evaluation Influence”, *Evaluation*, 2004, Vol.10, No.1, pp.35-57; 滑腾飞、公茂玉等：“大国在南海地区地缘影响力的测算”，《世界地理研究》，2017年第4期，第44-50页；鞠维伟：“浅析美国对西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欧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38-154页。

视可以量化的方面，形成较为直观的中美俄三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比对。本文将要评估的中美俄三国对中亚的影响力，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四个方面，评估的标准和依据是笔者目前把握的各项具体事实，尝试通过构建评估体系对指标数据进行赋值，从而相对客观地得出中美俄三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分布和对比。

## 二、分析框架的构建

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围绕中美俄在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四个方面的影响力评估进行构建，该框架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 （一）分析指标的选取

对中美俄在中亚影响力进行评估，首先需要选取一些具体指标，从这些指标出发，分析对比其中折射出来的影响力指数。为了方便后期赋值，本文在四个评估项目上各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且较容易操作的指标。另外，考虑到时间效应以及互动和影响力的动态性、阶段性变化，本文对各项指标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时，所选取的时间范围是2014-2018年，个别具体情况会进行小范围调整。

在政治方面，第一个指标是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对中亚国家的访问次数；第二个指标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与中美俄三国的元首接触次数，该次数主要以哈萨克斯坦总统网站上的“总统活动记录”为统计标准。一般而言，领导人作为国家的政治代表，其访问与会晤代表着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往来，也反映出对交往对象的重视程度与影响力关系。中亚国家对中美俄三国的元首接触次数主要包括访问、对话和接见等。

在经济方面，第一个指标是中美俄三国各自与中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第二个指标是中美俄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额可以直观地反映一定时期内中美俄与中亚国家的实际贸易规模以及经济交往规模；而三国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则可以反映较长时期内双方的经济合作意愿及合作水平，也可以有效地反映中美俄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关切程度、以及

对转型时期中亚各国国内经济活力的有效刺激程度，能更为直观地体现出三国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

在军事安全方面，第一个指标是三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情况；第二个指标是三国对中亚的安全援助情况。两个指标能够最直接地反映大国对中亚各国的军事安全影响。同时，这两个指标也适当考虑双方的军事安全合作程度以及中美俄各自的军费开支情况。

在文化方面，第一个指标是近年来中亚国家在中美俄的留学生人数；第二个指标是双边文化交流水平。人文关系是文化影响力的突出体现。但由于人文关系难以衡量，故本文选取较易操作的方面作为分析指标。以这两个指标衡量中美俄与中亚国家的人文关系，从而评估三国对中亚的文化影响力。

## （二）评估框架

基于上述对分析指标的界定，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中美俄三国在中亚影响力分布的简要评估框架。评估的项目是中美俄三国在中亚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四个方面的影响力，以及这四方面影响力的总和。这些评估项目的参考指标参考上文。结合这些具体指标与相应的赋值方式，本文分别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值，以直接呈现其分布情况。经过赋值，再根据本文所运用的算法，计算出各评估项目的所得值及其比重，以便评估中美俄三国在中亚的整体影响力。

## （三）赋值方式与算法

1. 赋值方式。赋值是针对各项指标所进行的计算过程。为了方便赋值和下文参照，根据上文所述，各项指标的情况可参见表 2。

表 2 本文评估项目及指标体系

评估项目	评估指标
A. 政治	A <sub>a</sub> . 中美俄领导人访问中亚的次数； A <sub>b</sub> . 中亚国家总统与中美俄的接触
B. 经济	B <sub>a</sub> . 中美俄与中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 B <sub>b</sub> . 中美俄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流量
C. 军事	C <sub>a</sub> . 中美俄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情况； C <sub>b</sub> . 中美俄对中亚的安全援助
D. 文化	D <sub>a</sub> . 中亚国家在中美俄的留学生人数； D <sub>b</sub> . 中美俄与中亚的文化交流水平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体而言，各指标最高赋值为 10，赋值范围是 0-10，赋值以 0.5 为单位递减，如 10, 9.5, 9, 8.5, 8, …, 0。具体赋值方式（表 3）如下：

在政治方面，在对指标  $A_a$  进行赋值时，以“年均领导人访问每增加 1 次，赋值+2”为方法进行赋值，访问次数越接近 5，赋值则越接近 10；对指标  $A_b$  的赋值以“年均接触次数每增加 5 次，赋值+1”为方法进行赋值，接触次数越接近 50 次，赋值则越接近 10。本文统计的次数主要以当事国政府和总统网站上的领导人活动记录为依据。

在经济方面，对指标  $B_a$  的赋值较为直观，以大国与中亚的年均贸易额每增加 25 亿美元，赋值+0.5，进行顺次赋值。具体而言，若贸易额为 25 亿美元，赋值为 0.5；若贸易额为 50 亿美元，赋值为 1…，以此类推。对指标  $B_b$  赋值时，以“近年来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流量每增加 3 亿美元，赋值+1”为方法进行赋值，大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流量规模越接近于 30 亿美元，赋值就越接近 10。

在军事安全方面，对  $C_a$  的赋值是军事基地数量  $\alpha$  与规模  $\beta$  的和。其中， $0 \leq (\alpha + \beta) \leq 10$ 。先对基地数量  $\alpha$  进行赋值，基地数量每增加 5 个，赋值+1。再对军事基地的规模  $\beta$  进行赋值，基地分为小、中、大三种规模。若军事基地平均兵力在 500 人以下，该基地则为小规模基地，赋值为 0-1.5。若军事基地平均兵力在 500-1500 人之间，该基地则为中等规模基地，赋值为 1.5-3。若军事基地平均兵力在 1500-4500 人之间，该基地则为大规模基地，赋值为 3-6。基于此，对  $C_a$  的最终赋值是  $\alpha + \beta$ 。接下来对指标  $C_b$  进行赋值。援助资金每增加 0.5 亿美元，赋值+1。当然，还需要考虑军事合作程度和各自军费支出情况。基于这种考虑，可在援助资金的赋值基础上再追加 1-5 的赋值。

在文化方面，对指标  $D_a$  赋值时，若中亚国家在大国的留学生人数低于 5000 人，赋值为 0.5；若留学生人数超过 5000 人，则在 0.5-10 之间赋值，每增加 5000 人赋值+0.5；对  $D_b$  赋值时，如果大国和中亚地区没有或有着较为浅显的文化交流，则可在 0-3 之间进行赋值，若双方的文化交流项目和活动较多，且有不同规模的资金支持和关注，则在 3-10 之间赋值，赋值越接近 10，说明文化交流水平越高。

表 3 各指标赋值规则汇总

通用总则	赋值范围 0-10； 具体赋值以 0.5 为单位递增，如 0, 0.5, ..., 9.5, 10； “年均”一般指 2014-2018 年 5 年平均值；	
评估项目	指标	赋值规则
A	A <sub>a</sub>	年均领导人访问每增加 1 次，赋值+2。
	A <sub>b</sub>	年均接触次数每增加 5 次，赋值+1。
B	B <sub>a</sub>	年均贸易额每增加 25 亿美元，赋值+0.5。
	B <sub>b</sub>	直接投资流量每增加 3 亿美元，赋值+1。
C	C <sub>a</sub> ( $\alpha+\beta$ )	C <sub>a</sub> =基地数量 $\alpha$ +基地规模 $\beta$ , $0 \leq (\alpha+\beta) \leq 10$ ; $\alpha$ : 每增加 5 个基地, 赋值+1; $\beta$ : 小规模: 兵力<500 人, 赋值为 0-1.5; 中等规模: 500 人<兵力<1500 人, 赋值为 1.5-3; 大规模: 1500 人<兵力<4500 人, 赋值为 3-6。
	C <sub>b</sub>	年均援助资金每增加 0.5 亿美元, 赋值+1; 根据年均军事合作程度和各自军费支出情况, 可在援助资金的赋值基础上赋值再加 1-5。
D	D <sub>a</sub>	2018 年在籍留学生人数<5000 人, 则赋值为 0.5; 2018 年在籍留学生人数>5000 人, 则在 0.5-10 之间赋值, 每增加 5000 人, 赋值+0.5。
	D <sub>b</sub>	年均文化交流浅显, 则根据情况在 0-3 之间进行赋值; 年均文化交流项目和活动较多, 则根据情况在 3-10 之间赋值。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2. 算法。算法针对的是评估项目和指标。本文评估的项目包括政治影响力 (A)、经济影响力 (B)、军事安全影响力 (C) 和文化影响力 (D) 四项, 每一个项目都有 a 和 b 两个指标。<sup>①</sup>本文采用的算法是最简单的相加法。各项指标满值为 10。由于每个项目包含两个指标, 所以每个项目满值为 20, 四项的满值, 亦即总影响力 (T) 的满值为 80。每个项目的值 (A, B, C, D) 是它所对应的两个指标的赋值之和 (a+b), 总影响力的值 (T) 为四个项目值的总和 (A+B+C+D)。总影响力的比值 (M) 为总影响力的实际值和总影响力满分的比值。本文采用的赋值算法可参见表 4。

① 参见表 2。

表 4 本文赋值的算法

各评估项目 (A/B/C/D)	$A=A_a+A_b$ ; $B=B_a+B_b$ ; $C=C_a+C_b$ ; $D=D_a+D_b$
总影响力 (T)	$T=A+B+C+D$
总影响力的比值 (M)	$M=T/80$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三、中美俄三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 (一) 政治影响力

美国的中亚政策在政治方面的突出表现是，美国一直注重密切与中亚国家的政治联系，引导中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近年来，尽管美国总统未访问过中亚，但美国国防部长、国务卿、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美参联会主席等高层官员及各种高级代表团多次访问中亚，通过密度不同的高层访问与中亚各国相互加深了解，巩固双边关系。<sup>①</sup>2015年12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出访中亚五国，开启了“C5+1”对话机制。<sup>②</sup>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继续通过此机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2019年8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戴维·黑尔在哈萨克斯坦与中亚五国外长举行“C5+1”机制会谈，此次闭门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是“维护区域经济稳定与伙伴关系”。<sup>③</sup>

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对美国也有不同程度的访问和会见。以哈萨克斯坦为例，2018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美国，与特朗普进行深度会晤。两国领导人共同表示要提升双边合作水平，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发布了《哈萨克斯坦和美国：加强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的声明。纳扎尔巴耶夫还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阶段。<sup>④</sup>在此之前，美哈两

① 杨鸿玺：“20年来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国际展望》，2011年第3期，第22-23页。

② 郭曼若：《美国中亚政策面临的威胁与挑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5月，第10页。

③ 张继业：“美副国务卿与中亚五国外长举行‘C5+1’会谈”，澎湃新闻，2019年8月2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24778](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224778)

④ Almasbek Zhumadil, Aigerim Seisembayeva, “Nazarbayev, Trump elevat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uring Washington meeting”, *The Astana Times*, January 17, 2018, <https://astanatimes.com/2018/01/nazarbayev-trump-elevate-strategic-partnership-during-washington-meeting/>

国已就双边关系进行过多次外长级讨论。2013年，哈萨克斯坦外长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在与美国高级官员的会谈中强调了哈美两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双边关系，重申了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发布了《第二届哈萨克斯坦与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14年12月，哈萨克斯坦外长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共同主持了战略伙伴关系对话第三次会议，双方再次强调了进一步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2015年11月，克里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发布了《第四届美哈战略伙伴关系对话联合声明》。<sup>①</sup>

俄罗斯谋求与中亚国家的深度融合，并把中亚国家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持续巩固与中亚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密切双方的政治联系。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总统级互访非常频繁，据相关统计，2017年以来（截至2019年6月），普京总统访问中亚的次数高达13次。<sup>②</sup>中亚五国的领导人与俄罗斯的高层接触更为密切。哈萨克斯坦总统官网中的总统活动记录显示，在2017至2019年6月的两年半时间里，哈国总统访俄高达43次。

同时，俄罗斯就双边关系与中亚国家进行的官方讨论数量丰富，内容全面，近年来平均每年的讨论次数都在35次左右。此外，俄罗斯与中亚国家拥有多个对话合作平台，除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外，还包括各国元首级、政府总理级、外长级、以及国家安全领导人、国防部长等各级别、各层次的会晤机制。<sup>③</sup>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频率，远超其他国家与中亚国家间的联系与接触频率。

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也在深化。中亚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往来日益频繁，政治互信日益增强。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

---

① Nisha Biswal, “Delighted to host Deputy FM Yerzhan Ashikbayev today for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Dialogue”,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Mar 9, 2016, <http://www.kazakhstanembus.com/content/kazakh-us-relations-overview>

② 关于相关高层互访内容也可参见俄罗斯联邦外交部网站，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rchive/country/undefined](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rchive/country/undefined)

③ 杨倩：《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研究》，兰州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4月，第14页。

坦访问期间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此后至今（2019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几乎每年都有出访中亚国家的计划，中亚国家领导人来访的频率也在增加。此外，在各种地区多边峰会，如亚信峰会、G20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等多边对话机制中，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就双边关系进行过多次会晤，双边政治关系不断得到深化。

根据中美俄三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相关资料，笔者对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俄三国对中亚的国家元首级访问次数进行整理统计，具体情况参见表5。

表5 中美俄三国国家元首对中亚的访问次数统计

	2017.01-2019.06
中国，习近平访问中亚	2次
美国，特朗普访问中亚	0次
俄罗斯，普京访问中亚	13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事务局的相关资料<sup>①</sup>、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官方网站的相关资料<sup>②</sup>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方网站的相关资料<sup>③</sup>整理。

根据赋值规则，“年均领导人访问每增加1次，赋值+2”，特朗普上台以来，访问中亚的次数为0，对其赋值为0。同理，2.5年内，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亚国家的访问总次数为13次，年均约5次，对其赋值为10；2.5年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亚国家的领导人访问总次数为2次，年均约为0.8次，对其赋值为2。

此外，中亚国家的元首对中美俄三国的访问、会晤与会见次数的差异较为明显。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官方网站中对总统活动的记录，笔者对2017年以来哈萨克斯坦总统对中美俄三国的接触次数进行整理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结合赋值规则“年均接触次数每增加5次，赋值+1”，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哈萨克斯坦总统对中国的接触总次数为12次，年均4.8次，对其赋值为1；2.5年内，哈萨克斯坦总统对美国

① “Archive 2009-2017”,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rchive/country/undefined](http://www.mid.ru/foreign_policy/news/-/archive/country/undefined)

③ “外交动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

的接触总次数为 11 次，年均 4.4 次，对其赋值也为 1；哈萨克斯坦总统对俄罗斯的接触总次数为 52 次，年均 20.8 次，对其赋值为 4。

结合以上分析和赋值，政治影响力（A）的指标（ $A_a$  和  $A_b$ ）赋值情况可参见表 7。

表 6 哈萨克斯坦总统对中美俄的接触次数（2017.01-2019.06）

	总统访问	总统的会晤与接见
哈萨克斯坦对中国	3 次	9 次
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	9 次	43 次
哈萨克斯坦对美国	1 次	10 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活动记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官网）<sup>①</sup>统计。

表 7 政治影响力的指标赋值结果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A_a$	0	10	2
$A_b$	1	4	1
A	1	14	3

## （二）经济影响力

### 1. 中美俄与中亚国家的双边贸易。

美国在经济上对中亚国家持续提供援助，并加强同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美国与中亚国家在 2002-2004 年（财年）期间的贸易额为 40.2 亿美元，2012-2014 财年期间的贸易额升至 96.7 亿美元，十年内美国和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增加了 56.5 亿美元。<sup>②</sup>美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投资<sup>③</sup>，同时给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普惠制待遇，与所有中亚国家签署了《贸易和投资协定》。从 1992 年起到 2012 年，美国

① 哈萨克斯坦总统活动记录（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官网），<http://www.akorda.kz/en/events>

② “U.S. Economic Account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s://www.bea.gov>; 赵华胜：“中俄美在中亚的存在：上升和下降”，《国际观察》，2015 年第 6 期，第 91 页。

③ 李炫熹：““后撤军时代”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以及相关国家的应对”，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 5 月，第 22 页。

总共向中亚国家提供了 377 亿美元援助。<sup>①</sup>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笔者对 2014–2018 年美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进行统计，具体情况见表 8。

基于历史的积累和地缘因素，俄罗斯在经济上对中亚的影响力依然较大，无论是在经济政策协议与条约层面，还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都有着平稳向上的发展态势。表 9 反映了 2014–2018 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情况。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双方 2002–2004 年的贸易额是 123 亿美元，2011–2013 年的贸易额增至 1351 亿美元，10 年内贸易额增加了 1228 亿美元，增长了 10 倍多。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乌、吉、塔三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sup>②</sup>。2014–2018 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具体情况见表 10。

根据表 8、表 9 和表 10，结合赋值规则年均贸易额每增加 25 亿美元，赋值+0.5，2014–2018 年，5 年内，美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额共计 116.468 亿美元，年均贸易额为 23.29 亿美元，赋值为 0.5；俄罗斯与中亚 5 年内的贸易额共计 1195.86 亿美元，年均贸易额为 239.17 亿美元，赋值为 5；中国与中亚 5 年内的贸易额共计 1846.4 亿美元，年均贸易额为 369.28 亿美元，赋值为 7.5。

表 8 2014–2018 年美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统计（单位：亿美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哈萨克斯坦	24.18	13.27	18.423	13.432	21.163
吉尔吉斯斯坦	0.74	0.48	0.244	0.326	0.232
塔吉克斯坦	0.28	0.50	0.221	0.19	0.151
土库曼斯坦	4.76	1.37	1.24	2.96	0.424
乌兹别克斯坦	2.27	1.48	3.485	1.504	3.148
中亚五国	32.23	17.1	23.61	18.41	25.118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官方网站的相关资料。<sup>③</sup>

① 肖斌：“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发展”，第 125 页。

② 孙力、吴宏伟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2013）》，第 256 页。

③ “U.S. Trade in Goods by Country”，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index.html>;<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balance/c4643.html>

表9 2014-2018年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统计(单位:亿美元)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哈萨克斯坦	215.09	157.15	132.67	174.42	182.19
吉尔吉斯斯坦	18.16	12.70	12.14	16.07	18.84
塔吉克斯坦	9.28	8.15	6.87	7.17	8.94
土库曼斯坦	12.47	9.88	9.01	4.29	4.44
乌兹别克斯坦	39.96	28.37	27.24	36.52	43.84
中亚五国	294.96	216.25	187.93	238.47	258.25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sup>①</sup>和俄罗斯海关<sup>②</sup>的相关资料整理<sup>③</sup>。

表10 2014-2018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统计(单位:亿美元)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哈萨克斯坦	224.52	142.9	130.98	179.43	198.85
吉尔吉斯斯坦	52.98	43.41	56.77	54.24	56.1
塔吉克斯坦	25.16	18.47	17.56	13.48	15.1
土库曼斯坦	104.71	86.43	59.02	69.43	76.51
乌兹别克斯坦	42.76	34.96	36.15	42.21	64.28
中亚五国	450.12	326.17	300.48	358.79	410.8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相关数据<sup>④</sup>及中国驻各国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中国外交部等官方公布的数据整理。

## 2. 中美俄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投资

美国相继出台的“新丝绸之路”计划、“C5+1 对话机制”等中亚政策和多边机制,都旨在提升美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水平,加强其在中亚地区

① “External economic activities”,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2014-2015,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main/](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main/)

② Внешнеторговый оборот (по данным тамож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ЕМИСС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2014-2015. <https://fedstat.ru/indicator/37150>

③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анным тамож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 2016-2017.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ftrade/#](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ru/statistics/ftrade/#); 2018.01-2018.11, Федеральная таможенная служба, Таможенная статистик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Экспресс-информация, Экспорт-импорт важнейших товаров за январь-ноябрь 2018 года, [http://www.customs.ru/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108&Itemid=1981](http://www.customs.ru/index2.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108&Itemid=1981);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TADVISER. 2019.03.29. [http://www.tadviser.ru/index.php/Статья:Внешняя\\_торговля\\_России](http://www.tadviser.ru/index.php/Статья:Внешняя_торговля_России)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登录时间: 2019年6月14日。

的经济影响力。近年来，上述两项政策机制所倡导的内容已在中亚国家得到很大程度的认同，并在推动地区间合作中发挥作用。例如，美国支持的 CASA-1000 项目<sup>①</sup>，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提供电力以满足阿富汗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的合资公司运转顺利，年均生产汽车 20 万辆。<sup>②</sup>此外，美国通过各类合作框架机制，开拓中亚市场。并通过积极支持中亚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中亚与南亚国家签署国境贸易协定，便利地区内的贸易，简化过境手续。

俄罗斯先后启动了独联体和独联体自贸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框架，旨在促进区域内的合作，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2015 年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便是俄罗斯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机制，其目标是发展成为欧亚联盟。

中国与中亚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观点认为，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不仅超过美国，也超过了俄罗斯，以致有中国是中亚的“钱袋子”、俄罗斯是中亚的“枪杆子”之说。<sup>③</sup>这说明中国在中亚的经济优势颇为明显。根据当前的数据反映，关于三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流量的具体情况可见表 11、12。

根据表 11 可知，2010-2015 年六年内，美俄中对中亚国家直接投资流量的总额分别为 50.44 亿美元、39.42 亿美元和 37.36 亿美元。中国在 2015 年对中亚的直接投资骤减为负值，主要是由于中国减少了对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直接投资。同时，本文以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为例，选取与本文赋值年限相关的年份，对直接投资流量进行统计。相关情况见表 12。

---

①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U.S. Announces \$15 Million in Funding for CASA-1000 Electricity Projec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1,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p/sca/rls/press/2015/index.htm>

② “In Uzbekistan, a Chevy on very corner”, *Reuters*, September 6,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9/05/gm-uzbekistan-idUSL6E8K55ZL20120905>

③ Elena Holodny, “China would be the bank and Russia would be the big gun in Central Asia”, *Business Insider*, July 15, 2015,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the-growing-china-russia-economic-relationship-2015-7>

表 11 2010-2015 年美俄中三国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流量统计（亿美元）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美国	18.41	-0.71	8.37	0.3	16.12	7.95
俄罗斯	-1.15	8.34	8.92	6.51	7.39	9.41
中国	5.82	4.53	33.77	10.99	5.51	-23.26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资料文献整理<sup>①</sup>。

表 12 2014-2018 年美俄中三国对哈直接投资流量统计（亿美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美国	-	7.95	-	19.3	27.9 <sup>②</sup>
俄罗斯 <sup>③</sup>	6.57	6.43	4.76	7.27	15 <sup>④</sup>
中国	-0.4	-25.1	4.88	20.704 <sup>⑤</sup>	-

表 13 经济影响力的指标赋值结果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B <sub>a</sub>	0.5	5	7.5
B <sub>b</sub>	6	2	7
B	6.5	7	14.5

① “International Data”,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https://www.bea.gov/iTable/iTable>; 哈萨克斯坦驻美国大使馆, <https://kazakhembus.com/us-relations/economic-cooper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 “Kyrgyzst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EIC, <https://www.ceicdata.com/en/kyrgyzstan/foreign-direct-investment-by-country/foreign-direct-investment-non-cis-states-united-states>; Irina Sinits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rends and Outlook”, *Working Paper*, Bishkek: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 2012, p.28, <http://www.ucentralasia.org/Content/Downloads/UCA-IPPA-WP5-RussianInfluence-Eng.pdf>; 阿曼古丽·吐尔洪:《俄罗斯转型以来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研究》, 新疆师范大学,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2014 年 3 月, 第 24 页;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Prtid=svs&ch=ITM\\_3641#CheckedItem](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Prtid=svs&ch=ITM_3641#CheckedItem);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2015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6 年, 第 42-43 页。

②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Washington, D.C, <https://kazakhembus.com/us-relations/economic-cooper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

③ “Direct Investm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broad: flows by Instrument and Partner Country”, External Sector Statistics,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macro\\_itm/svs/#CheckedItem](http://www.cbr.ru/eng/statistics/macro_itm/svs/#CheckedItem)

④ “俄罗斯仍是哈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 2019 年 7 月 17 日, <http://kz.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7/20190702882417.shtml>

⑤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017 (PDF)》,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8 年 9 月,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201809/20180902791492.shtml>

通过数据搜集发现，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在 2015 年之前较全，但本文赋值所考虑的年份取值范围是 2014–2018 年，为了赋值更有效，则尽可能多地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查找数据。相比之下，哈萨克斯坦的数据较为全面，尤其是 2017 年（表 12）的数据具有代表性，具有较强的赋值参考价值。因此，对此指标赋值时，以 2017 年三国对哈萨克斯坦的直接投资数额为基础。

根据以上说明，结合  $B_b$  的赋值规则“对中亚的直接投资流量每增加 3 亿美元，赋值+1”，美俄中的数据分别为 19.3 亿、7.27 亿和 20.704 亿，则对美俄中在这一指标的赋值分别为 6、2 和 7。根据上述分析，经济影响力（B）的指标（ $B_a$  和  $B_b$ ）赋值汇总情况可见表 13。

### （三）军事安全影响力

#### 1. 美俄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情况

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分别建立了汉纳巴德和玛纳斯军事基地，并在中亚其他国家获得了空中或地面进入权。2005 年，美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因安集延事件恶化，加上美国在中亚大力推行“民主价值观”，引起了中亚各国政府的不安，当年 11 月汉纳巴德军事基地关闭，玛纳斯军事基地继续保留至 2014 年关闭。这两个基地的关闭，美国都是被迫的，是基于乌和吉的决定，而不是美国的主动行为。

俄罗斯将中亚视为传统势力范围，是所谓的特殊利益区，在中亚地区谋求军事安全影响力是俄罗斯的优先战略考虑。为此，俄罗斯在中亚保持了数量可观的各类军事基地，并在近年内不断签订新的双边条约或文件，大幅延长这些基地的使用期。

与美俄不同，中国在中亚地区没有军事存在，军事安全合作是双方关注的重点。<sup>①</sup>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亚国家和中国进行安全合作最主要的平台，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展开了一系列防务安全合作。另外，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及俄罗斯在禁毒领域的合作成效也在提升。

---

① 关于中国和中亚军事合作的有关概述可参见 Sebastien Peyrouse,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reakthrough, Limits, and Prospects”,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Global Research & Analysis*, March 5, 2010,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military-cooperation-between-china-and-central-asia-breakthrough-limits-and-prospects/>

表 14 美俄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情况统计

	美国			俄罗斯			
	数量	5 个 <sup>①</sup> 或 6 个 <sup>②</sup>		数量	17 个		
	名称	简单介绍	使用年限	名称	简单介绍	使用年限	
美俄在中亚的军事基地情况	两个重要军事基地情况介绍	汉纳巴德空军基地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 2002 年建立, 是美军在中亚的大型空军基地, 总兵力曾达到 1000 多人	2005 年关闭	巴尔喀什雷达站 <sup>③</sup>	苏联建造于哈萨克斯坦, 21 世纪前总共有七个雷达设备	陆续退役毁损, 截止 2012 年只剩一个雷达在运行
		玛纳斯空军基地	位于吉尔吉斯斯坦, 2001 年建立, 曾是美军在中亚最大的空军基地, 可以容纳约 3000 名军人, 可停放各种战斗机、运输机和加油机等, 设施齐全	2014 年 6 月关闭	萨里·沙根试验点	该场长度 480 公里, 是哈萨克境内可以进行俄罗斯反弹道导弹系统长距离试验的站点 <sup>④</sup>	1958 年至今
	部分基地情况介绍				拜科努尔发射基地 <sup>⑤</sup>	苏联建, 位于哈萨克斯坦, 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运营空间发射设施	俄罗斯租赁至 2050 年
					坎特空军基地 <sup>⑥</sup>	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俄常驻军人 400 名, 跑道长 2700 米	2003 年启用, 俄租用 49 年
					卡尔什-哈纳巴特军事基地	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向乌提供相关武器装备, 培训军事人员	2006 年开始使用至今
				201 军事基地 (先后更名七次)	位于塔吉克斯坦境内, 常驻军人为 6000-7000 名	1941 年至今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 ① 高祖贵: “美国与中亚的关系分析”,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2005 年第 2 期, 第 76 页。
- ② 朱永彪: 《9·11 之后的阿富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 年, 第 8 页。
- ③ “Balkhash Radar Station”, *Wikipedia*, January 22,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lkhash\\_Radar\\_Stat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lkhash_Radar_Station)
- ④ “SARY-SHAGAN”,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May 15, 2014, <http://www.nti.org/learn/facilities/682/>
- ⑤ “Baikonur Cosmodrome”, *Wikipedia*, February 16,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ikonur\\_Cosmodrome](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ikonur_Cosmodrome)。关于拜科努尔发射基地是否算作军事基地是有争议的, 本文认为其是军事基地。
- ⑥ “Kant (air base)”, *Wikipedia*, February 6,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nt\\_\(air\\_base\)](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nt_(air_base))

结合对  $C_a$  的赋值规则，首先对基地数量  $\alpha$  以“每增加 5 个基地，赋值 +1”的方法进行赋值，2014–2018 年美国 and 俄罗斯在中亚的基地数量分别为 1 和 17，基地赋值分别为 0.2 和 3.4。由于本文赋值的基础单位是 0.5，四舍五入后， $0.2 \approx 0$ ， $3.4 \approx 3.5$ ，故对美俄  $\alpha$  的赋值分别为 0 和 3.5。

再根据  $\beta$  的赋值方式，结合表 10，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平均兵力分别约为 3000 人和 3500 人，符合赋值规则中“大规模的标准，即  $1500 \text{ 人} < \text{兵力} < 4500 \text{ 人}$ ，赋值应处于 3–6”的区间，最终美俄  $\beta$  的赋值分别为 4.5 和 5。综上，对“军事基地”这一指标的赋值结果，即  $\alpha + \beta$  的值，美俄分别为 4.5 和 8.5。由于中国在中亚没有军事基地，不存在数量和规模之说，因此在这一项上中国的赋值结果是 0。

## 2. 中美俄对中亚的安全援助

中亚国家的军事力量较为有限，中亚各国领导层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发展各自的内部安全力量，因为安全力量对于各自的政权存亡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在中亚，外部（尤其是大国）对其进行的安全援助和其国内的安全支出是成比例的。<sup>①</sup>因此，来自外部大国的援助在安全方面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十分显著。

表 15 2014–2018（财年）美国在中亚的 FMF 和 IMET 情况（百万美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FMF	6.235	4.2	3.2	3.2	5.0
IMET	2.515	2.687	1.948	2.25	2.21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安全防卫援助数据库和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的相关资料整理。<sup>②</sup>

① Dmitry Gorenburg, “External Support for Central Asian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Working Paper of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January 2014, pp.83-84,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14/working-paper/external-support-central-asian-military-and-security-forces>

②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Account Summa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t/pm/ppa/sat/c14560.htm>; “Internat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ccount Summar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2009-2017.state.gov/t/pm/ppa/sat/c14562.htm>; “Pivot Table by Recipient”, *Security Assistance Monitor*, <https://www.securityassistance.org/data/program/military/country/2014/2018/all/Central%20Asia/>

近年来，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援助计划不断变化，对设备使用及人员培训加大援助力度。<sup>①</sup>提供援助的主要部门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提供援助的关键项目包括外国军事融资（FMF）这类传统军事援助项目，以及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IMET）。具体援助情况如表 15 所示。

由表 15 可知，美国平均每年将 685 万美元和 269 万美元分别用于中亚的军事融资和对中亚的军事教育和培训上，而且美国平均每年还向中亚地区提供超过 1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俄罗斯是中亚各国军事装备和培训的主要来源<sup>②</sup>，也与中亚国家在军事安全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同时，俄罗斯与中亚各国在军事教育、培训军事人才、以及军事技术领域内的合作等方面，也有着他国无法比拟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基础。2019 年 7 月，有关莫斯科与塔什干之间防务合作的新闻中，头条便是乌兹别克斯坦从俄罗斯购买了 12 架 Mi-35M 军用直升机，交付时间定于 2019 年底。另外，乌兹别克斯坦还从俄罗斯订购了数目不详的 BTR-82A 装甲运兵车（APC）以及战斗机和雷达系统。<sup>③</sup>

2017 年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演习是双方时隔 12 年举行的第一次双边军事演习，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2014 年 8 月，集安条约组织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代号为“协作-2014”的快速反应部队演习。同年，该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维和部队演习。2015 年以来，受“伊斯兰国”和“塔利班”的影响，中亚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俄借此继续推进在中亚的地区安全和防务一体化进程，巩固其军事影响力。

2015 年俄罗斯在叙利亚空袭“伊斯兰国”后，中亚国家领导人公开宣称俄罗斯是中亚地区的安全保障。可见，在面对严重的外部威胁时，俄罗斯对中亚的军事与安全影响力不可替代。此外，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的军事安全

---

① Dmitry Gorenburg, “External Support for Central Asian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p. 50.

② Dmitry Gorenburg, “Central Asian Military and Security Forces: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Foreign Assistance”, *PONARS Eurasia*, September, 2013, <http://www.ponarseurasia.org/memo/central-asian-military-and-security-forces-assessing-impact-foreign-assistance>

③ Umida Hashimova, “Uzbekistan Leans on Russia for New Military Equipment”,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6, Issue 104, July 22,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uzbekistan-leans-on-russia-for-new-military-equipment/>

合作还有诸多基础性的双边条约、协议的支撑。大量的双边文件在一定意义上为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开展不同程度的军事安全合作提供了合法性与保障。

近年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军队融合度越来越高。2019年5月，据俄罗斯军事专家弗拉基米尔·穆欣（Vladimir Mukhin）介绍，如今塔吉克斯坦的军队就好比俄罗斯军队的一个小前哨基地。塔吉克斯坦的军队完整地配备了俄式武器，且军队组织结构和所接受的训练与俄罗斯军队无异，塔方士兵和军官正在接受俄罗斯军队和军事学校的训练，其部队也完全参与俄罗斯组织的军事演习。此外，他指出，中亚国家最强大和最可靠的军事力量可能根本不是来自塔吉克斯坦，而是在中亚拥有租约的俄罗斯军事基地。<sup>①</sup>

中美俄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援助情况可见表 16。

表 16 中美俄对中亚的安全援助情况统计（单位：亿美元）

中国	暂无数据
美国	2000-2018 年，美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援助为 20 亿美元 <sup>②</sup> ，年均 1.0 亿美元
俄罗斯	2008-2016 年，九年间，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安全援助约为 15 亿美元 <sup>③</sup> ，年均 1.667 亿美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安全防卫援助数据库的相关数据<sup>④</sup>资料整理。

由表 16 可知，美国对中亚的安全援助为年均 1 亿美元；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援助为年均 1.667 亿美元。中国对中亚国家的援助一般都是在社会公共设施、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农业和工业领域，在安全领域的援助数据缺失。但近几年，中国与中亚国家也进行了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了有效的军事安全合作。为了方便赋值，本文拟参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统计中有关中美俄军费支出数据的情况，来

① Paul Goble, “Tajik Military Increasingly Part of Russian Army in All But Name”,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16, Issue: 84, June 6,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ajik-military-increasingly-part-of-russian-army-in-all-but-name/>

② Хурсанд Хуррамов. Эксперт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се сложнее маневрировать между интересами Запада и России// Радио Озоди. 21.12.2018. <https://rus.ozodi.org/a/29669182.html>

③ Alexander Yakovenko, “On Russia's assistance to Central Asia”, *RT News*, September 26, 2017, <https://www.rt.com/op-edge/404642-russia-central-asia-development-investments/>

④ “Pivot Table by Recipient”, *Security Assistance Monitor*, <http://www.securityassistance.org/data/country/military/country/2014/2018/all/Central%20Asia>

弥补中国在对中亚安全援助方面数据的缺失。因为北约（NATO）对“军费”内容的界定包括了军事援助（在捐助国的军费支出中）<sup>①</sup>，所以可以借该机机构给出的军费支出数据进行参照。相关情况可见表 17。

表 17 2014-2018 年美俄中军费支出情况统计（单位：亿美元）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美国	6315.13	6164.83	6128.89	6058.03	6335.65
俄罗斯	714.67	770.23	825.76	665.27	641.93
中国	1916.27	2042.02	2157.18	2278.29	2392.23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SIPRI 军费支出数据库的相关资料<sup>②</sup>整理。

结合对  $C_b$  的赋值规则：“年均援助资金每增加 0.5 亿美元，赋值+1；根据年均军事合作程度和各自军费支出情况，可在援助资金的赋值基础上赋值再加 1-5”，对安全援助这个指标进行赋值。首先，美俄对中亚国家的安全援助年均数据分别为 1 亿和 1.667 亿美元，可以看作美俄分别为 2 个 0.5 亿和 3.5 个 0.5 亿，故第一层次对美俄的赋值为 2 和 3.5；

第二层次的赋值范围可以在第一层次值的基础上加 1-5。俄罗斯与中亚在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最为突出，可对其+4.5，美国与中国相对落后但也在改善，分别+2。军费对比下，美国远超中俄，所以再给美国+1.5；中国比俄罗斯多 2-3 倍左右，且中亚又在中国周边，故潜在影响力在上升，可再为中国+0.5。因此，对美俄中这项指标的最终赋值情况是：5.5、8、2.5。

综上，军事影响力（C）的指标（ $C_a$  和  $C_b$ ）赋值情况可见表 18。

表 18 军事安全影响力的指标赋值结果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C_a$	4.5	8.5	0
$C_b$	5.5	8	2.5
C	10	16.5	2.5

① “全球宏观经济数据”，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mac/indicator\\_MS.MIL.XPND.GD.ZS.shtml](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mac/indicator_MS.MIL.XPND.GD.ZS.shtml)

② “Military expenditure by country, in constant (2017) US\$ m., 1988-2018 © SIPRI 2019”,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 （四）文化影响力

##### 1. 中亚国家在中美俄的留学生人数情况

中亚五国在中美俄的留学生人数差异显著，在俄罗斯留学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中美，而且五国中哈萨克斯坦的在外留学生人数要高于其他四国。这从侧面反映了两个问题：中亚国家的学生都更愿意选择去俄罗斯留学；哈萨克斯坦在文化方面对外交流水平相较其他中亚国家更高。经过数据整理，中亚五国 2018 年在美俄中三国的留学生人数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 19 在美俄中的留学生人数统计（2018 年；单位：人次）

	美国 (2018 年新入学人数)	俄罗斯 (2018 年在籍总数)	中国 (2018 年在籍总数)
哈萨克斯坦	1865	86447	11784 <sup>①</sup>
吉尔吉斯斯坦	227	15600	4600+ <sup>②</sup>
塔吉克斯坦	222	34763	3000+ <sup>③</sup>
土库曼斯坦	234	-	2000+ <sup>④</sup>
乌兹别克斯坦	570	34203	-
中亚五国	3118	171013+	2138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门户开放网站<sup>⑤</sup>及相关网页<sup>⑥</sup>的数据整理。

关于这一指标的评估，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对该指标的时间节点并

① “2018 年来华留学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② “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9 年 6 月 11 日，[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04141.htm](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04141.htm)

③ “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塔吉克斯坦”，人民网，2018 年 7 月 17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717/c1002-30153181.html>

④ “土库曼斯坦在华留学生已达 2000 多名”，中国侨网，2016 年 9 月 29 日，<http://www.chinaqw.com/hwjy/2016/09-29/106018.shtml>

⑤ “All Places of Origin: Previous Years”,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Places-of-Origin>

⑥ Elizaveta Potapova, “Education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World Education News+ Reviews*, June 6, 2017, <https://wenr.wes.org/2017/06/education-in-the-russian-federation/>; “Russia in figures - Education”, Federal State Statistics Service, [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figures/education/](http://www.gks.ru/wps/wcm/connect/rosstat_main/rosstat/en/figures/education/); Количе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ах выросло за год на 16%// Русский Мир. 2019.02.28. <https://russkiymir.ru/news/253149/>

没有像上文各指标一样计算 2014-2018 年之间的平均数，而是以 2018 年度为准，因为每年的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人数是流动的。但现有数据对每年的在读留学生人数的反映较为模糊，只能反映在某年度来自某国的留学生人数。鉴于此，本文将该指标的时间节点选取为 2018 年度。第二，中美俄三国的数据显示，只有哈萨克斯坦一国的留学生人数是较精确的，故对这一项指标的赋值，以哈萨克斯坦在中美俄三国的留学生人数为准。第三，由于美国对留学生的相关统计只呈现出学年新入学人数的数据，因此美国的数据与中俄不一致，也不能用同一种规则赋值，只能在预估中俄的年均入学人数基础上比对赋值。

综合看来，俄罗斯的外来留学生中有 3/4 的人来自于独联体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每年有超过 4 万名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超过 1 万名学生<sup>①</sup>选择去俄罗斯；美国在哈萨克斯坦学生喜欢去的留学国家中排名第三；<sup>②</sup>由于地理位置邻近，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留学生认为非常便利的留学国家。

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留学的人数占了其外出留学人数的多数，可见俄罗斯在教育层面对中亚五国的影响力极大，所以赋值结果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根据本文赋值规则中对指标  $D_a$  的规定，结合哈萨克斯坦在三国的留学生人数，以及在中俄的年均入学人数基础上进行比对，对美国进行预估赋值。中美俄在这项指标的赋值分别为：1.5、1.0、8.5。

## 2. 中美俄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水平

单从历史、地理和文化联系的角度看，美国在文化方面对中亚的影响力无法与俄罗斯相比，因为后者与中亚有着特别密切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联系。尽管先天优势缺失，但美国仍然在加强对中亚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上不断做出努力。首先，积极推进中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输出文化影响力。美国积极鼓励中亚国家政府提供更多政治、个人和宗教的自由空间，推动中亚国家政府就人权、媒体自由以及公民社会和工商界接触等问题展开双边磋商。并利

---

① Посол Казахстана в России: Среди казахов растёт популяр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ов, Редакция портала «Русский мир», 2018.12.24. [https://russkiymir.ru/news/250663/?sphrase\\_id=913162](https://russkiymir.ru/news/250663/?sphrase_id=913162)

② “EducationUSA - U.S. Higher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Facebook, 2018.4.14, <https://www.facebook.com/EdUSAHEI/photos/over-40000-students-from-kazakhstan-study-abroad-the-us-being-the-3rd-most-popul/2069090323333158/>

用欧安组织积极参与中亚国家的选举、人权保护等。同时，美国还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对中亚国家改善人权、推进民主化等方面提供援助。<sup>①</sup>资料显示，2013 年美国在对中亚国家改善人权、推进民主化等方面提供的援助总额为 1.76 亿美元。<sup>②</sup>其次，加强与中亚国家在科、教、文、卫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美国教育文化局每年向中亚派出艺术特使、体育特使<sup>③</sup>等，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通过“未来领袖交流”等文化合作项目，加强中亚年轻人对美国的认识和交流。近年来，中亚国家在美留学生人数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sup>④</sup>在塔吉克斯坦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图 1）充分反映了美国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在该项调查中，有超过 1/2 的受访者希望孩子学习英语，这体现出美国文化的较强影响力。<sup>⑤</sup>

俄罗斯文化对中亚的影响力颇深。从人口结构看，俄罗斯族人在中亚国家的分布非常广泛，这是俄罗斯能保持对中亚国家文化影响力的重要原因。2015 年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在中亚的形象是较为正面的，“80%的哈萨克斯坦人认为俄罗斯是最友好的国家；90%的吉尔吉斯斯坦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在中亚的作用是积极的”。<sup>⑥</sup>俄罗斯还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加大了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进一步深化，在科技、旅游、卫生防疫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渐升温。截至 2018 年，中国在中亚地区已经建立了 13 所孔子学院<sup>⑦</sup>，5 所在哈萨克斯坦，4 所在吉尔吉斯斯坦，

---

① 资料来源：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转引自肖斌：“美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的发展”，第 129 页。

② “Budget and Planning - International Affairs Budge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s/d/rm/c6112.htm>

③ “Exchange Program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https://exchanges.state.gov/us/tag/south-and-central-asia?type%5B%5D=exchange\\_program&field\\_audience\\_tid=28&term\\_referrer=node/578&term\\_referrer\\_title=smARTpower](https://exchanges.state.gov/us/tag/south-and-central-asia?type%5B%5D=exchange_program&field_audience_tid=28&term_referrer=node/578&term_referrer_title=smARTpower)

④ “All Places of Origin: Previous Years”, *The Powe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All-Places-of-Origin>

⑤ William Kennedy,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power: What is motivating China to adopt soft power strategies and how effective have these strategies been?”, p.46.

⑥ “大国接踵而至，中亚‘来者不拒’”，新华网，2015 年 11 月 17 日，[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11/17/c\\_134825005.htm](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5-11/17/c_134825005.htm)

⑦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 2018》，孔子学院，2018 年。

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各 2 所，学院都坐落在丝绸之路交通路线上的学区和大型城镇，有大量的中亚学生注册入学。孔子学院还组织了上百种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中亚民众参与。

同时，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投资不断增长，中国与中亚的民间交流也不断深入。近年来，中国游客每年都要占到哈萨克斯坦境外游客总数的 12%。中国也是哈萨克斯坦游客的第二大旅游目的地（俄罗斯第一），每年有超过 8.5 万哈萨克斯坦游客来华。另外，“汉语桥”中文比赛越来越受到重视，民众的参与度和关注度也在逐年提升。中国与中亚国家互办书画、图画展，书画等艺术交流频繁，双方媒体的交流成果也在日益显现，譬如哈萨克斯坦著名杂志《世界民族文学》就发行过中国文学专刊。

在文化合作的框架与机制层面，上海合作组织是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合作的重要多边机制，“中国-亚欧博览会”是中国与中亚各国人文交往的新载体，“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合作的重要纽带。<sup>①</sup>虽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与中亚国家人文交往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在塔吉克斯坦的民意调查（图 1）显示，希望孩子学习汉语的人仅有 2.7%。汉语及其推广是中国加强自身文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这一结果也反映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这项调查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想让你的孩子知道和了解哪一种语言”，汉语再次得分很低，只有 1% 的人选择汉语。<sup>②</sup>这表明，在未来，中亚人仍会将俄语、英语和阿拉伯语视为比汉语更有用的语言，中国文化在该地区仍未得到足够重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仍然不高。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判断中美俄与中亚国家的文化交流程度由高到低的排序是：俄>美>中。结合本文赋值法，这一指标俄罗斯的赋值为 8；美国和中国的赋值分别为 5.5 和 4。

文化影响力（D）的指标（ $D_a$  和  $D_b$ ）赋值情况可见表 20。

---

① 孙力、吴宏伟主编：《中亚国家发展报（2016）》，第 277-279 页。

② William Kennedy,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power: What is motivating China to adopt soft power strategies and how effective have these strategies been?”, p.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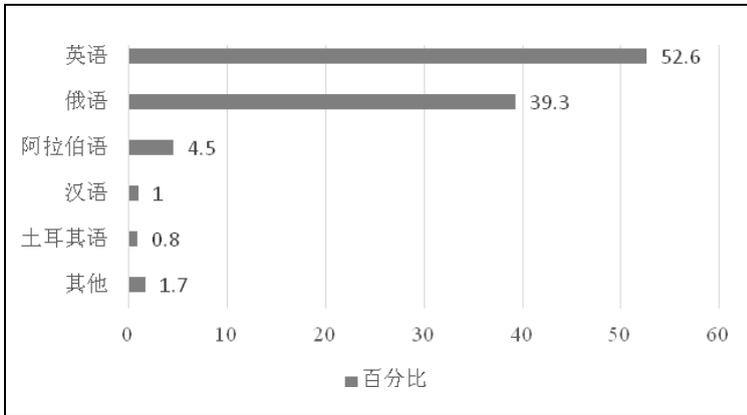


图 1 调查问题（塔吉克斯坦）：希望孩子学习的外语？

表 20 文化影响力的指标赋值结果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D <sub>a</sub>	1.0	8.5	1.5
D <sub>b</sub>	5.5	8	4
D	6.5	16.5	5.5

### （五）最终评估结果

综合上文的分析与赋值，参考表 7、13、18 和 20，再对照算法（表 4），本文得出的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评估结果（政治影响力 A、经济影响力 B、军事安全影响力 C、文化影响力 D、总影响力 T、影响力占比 M）如表 21 所示。影响力具体分布情况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现为图 2 和图 3 所示。

表 21 评估结果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A	1	14	3
B	6.5	7	14.5
C	10	16.5	2.5
D	6.5	16.5	5.5
T	24	54	25.5
M	30%	67.5%	3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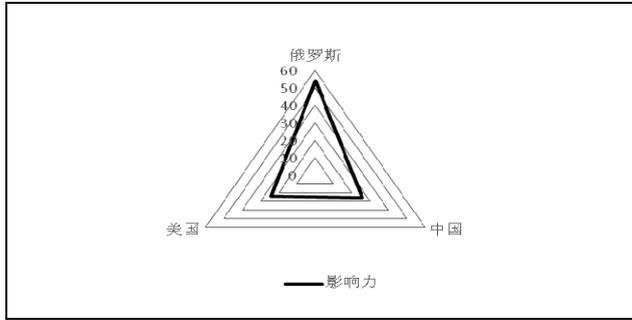


图 2 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分布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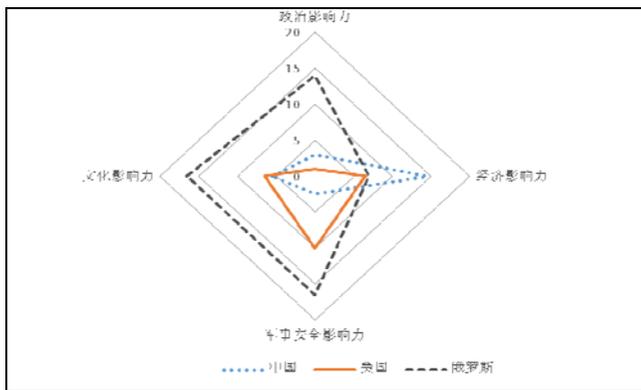


图 3 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具体分布简图

由以上图表可见，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竞争大致呈现出“一个指向俄罗斯的等腰三角形”的形态，且指向中国的“一腰”要比指向美国的稍长，但由于差距甚微，依然将其大致看作“等腰”。而影响力的分布则体现出“不规则的四边形”态势。

具体而言，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依然首屈一指，美国和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相当。中美俄在中亚的这场影响力博弈中，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力优势较为明显。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是其他国家无法代替的。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倚重的方面是政治、文化和军事安全领域，在这些方面俄罗斯的影响力都大大超过美国和中国。而在经济领域，受俄罗斯国内经济状况低迷以及中国经济状况持续走好的影响，再加上中国与

中亚国家双边贸易与经济合作水平的提高，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在政治领域内，中国的影响力介于俄美之间，接近于美国。在文化领域内，中国落后于美国和俄罗斯。虽然中国在中亚的文化影响力与俄罗斯相比仍有一定距离，但倘若持续关注与投入，中国有望在这一领域赶超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内，中国的影响力不及美国和俄罗斯，不过随着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共同利益不断上升，双边军事合作水平也在逐渐提升。

本文评估的结论是，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依然位居首位，其次是中国，紧接着是美国；倘若除去经济因素，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则位于美国之后。就目前而言，美国对中亚的关注表面在减少，但实际投入和影响却在加大。持续提供援助仍是美国对中亚政策的重要内容。另外，美国整合优势大力发展与中亚国家间的关系，积极消除撤离中亚军事基地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再将中亚的民主化作为其中亚战略的首要目标，通过“巧实力”<sup>①</sup>积极改善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这客观上增加了中亚国家对美国的亲近感。

俄罗斯也在尝试以经济整合中亚，但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俄罗斯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很大，而且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几乎都关乎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但当前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无法与苏联时期相提并论，其战略颓势明显。尽管如此，俄罗斯对中亚的影响力仍然深远，俄罗斯在中亚的主导地位不容低估。

中国旨在促进与中亚的共同发展，利用多边和双边机制，积极地与中亚各国开展合作，谋求深层次的整合。尤其在经济领域内，中国作为区域内第一大经济体，通过自身努力，正积极带动地区内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中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上升趋势明显。

#### 四、结语

中美俄作为世界大国，对中亚的影响力整体上影响着各自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和合作水平，同时也对该地区的整体发展态势产生了重要影响。美

---

<sup>①</sup>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Jr.,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Washington, D.C: The CSIS Press, 2007, pp.5-14.

国是对中亚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在政治领域，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并未达到预期。在经济领域，美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总量依然很小，但各个经济合作项目与投资项目在不同程度上加强着美国对中亚的影响力。在军事与安全领域，美军撤出中亚军事基地表明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减弱，已不是中亚国家安全保障的主要依靠，但美国的军事援助依然对中亚地区的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在人文关系领域，美国在中亚仍有较大的影响力，且仍具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俄罗斯是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在政治、文化和安全领域对中亚的影响力都有着绝对的优势。鉴于俄罗斯国内经济受挫使得它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下降，目前俄罗斯在中亚更多关注的是如何提升其经济影响力。“但对俄罗斯来说，经济利益仅为其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将中亚国家制度性地纳入由它建立和主导的体系中去。”<sup>①</sup>

中国在中亚整体影响力的上升更多依赖于经济领域，以及经济带动下的人文关系与政治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巨大并且富有生命力的经济体，在经济上对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亚洲地区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力。而在人文、政治和军事安全领域的影响力，近年来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都较为脆弱，且容易弱化。

本文对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及其分布进行的分析，可能存在着以下不足之处和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首先，本文所构建的评估框架以具体指标出发，投射到中美俄在不同领域内指标的赋值差异上，以此来衡量三国的影响力及其分布。通过本文评估，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关系是：俄罗斯>中国≥美国。本文所得结论与在中亚各国进行的关于国家形象的民意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出入。这从侧面反映出本文以地区为框架的整体性叙述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可能不一致。中亚五国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而且这种差异可能会对大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指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囊括国别与地区差异在内的评估体系是今后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次，关于影响力的方向问题，本文虽然也从中亚国家的一些民意调查

---

<sup>①</sup> 赵华胜：“中俄美在中亚的存在：上升和下降”，第102页。

出发，对中亚国家的立场有一些简单的审视，但主要还是从大国在中亚的活动出发，去考察其所反映出的影响力。正如赵常庆所言，国内研究没有充分考虑中亚国家的立场，而更多关注的是大国的意图。本文认为，在充分结合中亚各国立场的基础上，考虑大国与中亚各国的互动，既是本文的不足之处，也将是今后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再次，本文的赋值根据来源于具体的数据，但本文所需要运用的个别数据是不完整的，有些数据尚未更新。尽管在整合时尽量做到全面，但误差难以避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本文研究的难度和阻碍。

最后，本文的评估相对静态，主要针对近几年（2014-2018年）的相关情况进行评估。不过，这5年的时间取值，依然较能充分地说明在这一较为明确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俄在中亚的博弈情况。

尽管存在以上不足，本文构建的评估框架依然能为中美俄在中亚的影响力布局，提供较为清晰的论据。本文针对现有研究中对大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缺少直观比对这一缺陷，以中美俄在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安全和文化四个方面影响力的系统性赋值、计算所得出的结论，能更为充分地解释，在中亚地区俄罗斯的影响力稳居第一、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日渐趋近、且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综合影响力日益凸显这一事实。

---

**【Abstrac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Central Asia is special, which attracts the continuous attention of major countrie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external powers in Central Asia, but their influences in Central Asia varies in degree and with different emphases.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e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Central Asia could be observed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f operational indexes. Although the assignment of indexes simplifies the evaluation procedures, yet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its interpretation could not be ignored. According to the assessment, from 2014 to 2018 Russia's influences in Central Asia top while the U.S. and China ranks second. In addition,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es is also clear at a glance, that is, despite weak political influences in Central Asia,

the distribution of American influences in Central Asia is balanced in other three aspects, which is basically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ussia's influences in Central Asia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cultural and economic fields, while China's influences in Central Asi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conomic field.

**【Key Words】** China-U.S.-Russia Major Country Relationship,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the U.S. and Central Asia, China and Central Asia

**【Аннотация】**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занимает особ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привлекает постоя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крупных держав. Китай, США и Россия являю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влиятельными внешни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 их влияние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 Конкрет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влияния Китая,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жн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путём оценки назначения операционных показателей. Хотя присвоение показателей упрощает процесс оценки, однако его уник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проблемы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роигнорировано. Оценка влияния Китая, США и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2014-2018 годах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Россия не имеет себе равных, а США и Китай в основном находятся на одной стадии конкуренции. Конкретно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влияния также очевидно: влияние СШ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лаб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и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о в оставшихся трёх областях, в основном расположен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о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оенной сфере, а также в сфер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и экономики, а влияние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основном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о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Росси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ША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Кита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

(责任编辑 肖辉忠)

## 非正式制度、中心化国家构建 与现代中亚政治的形成\*

孙超\*\*

**【内容提要】**独立伊始，中亚就面临着构建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西方主流学界创造了中亚研究的核心概念体系与命题，强调中亚政治分析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二分法，夸大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甚至将新庇护主义模式作为解释中亚政治演进的核心内容，忽视中亚国家在国家建设中制度建设与制度互融的成就。制度构建不仅是中亚政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亚政治现代化的关键。通过不断发明和建立新制度，同时将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融入正式制度，这些是中亚现代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一些中亚国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s）发展模式：减少地方主义、族群矛盾以及部族政治给现代国家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吸纳地方政治精英以增强国家能力，发展象征符号来凝聚共识，构建国家意识形态以重建合法性。中亚政治突破了制度正式/非正式二元逻辑，正在形成现代中亚政治。

**【关键词】**中亚政治 中亚非正式制度 中亚中心化国家 中亚权力网络

**【中图分类号】**D73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5-0108(3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后欧洲民族分离运动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19CGJ014）的阶段成果。非常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张昕副教授、崔珩博士，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杨成教授和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肖斌副研究员提出的宝贵建议，文章一切错漏由作者承担。

\*\* 孙超，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兼职研究员。

## 一、导言

自 1991 年苏联解体以来，中亚五国政治转型历时近 30 年，其政治发展备受瞩目。在逐渐抛弃苏联时代治理体系的同时，中亚各国需直面第三波民主化的世界政治浪潮。对中亚体制变化甚为关注的西方政治学家，急切希望看到一度“消极”的民众组织起来，为争取自由民主积极努力。他们认为，中亚各国只有通过社会与政治动员才能加速摆脱苏联政治遗产，朝民主制跃进。尽管国际主流学术界对中亚政治转型甚为关心，但鲜有对中亚政治转型进行正面评价。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就有学者指出，中亚“轻松”获得独立，导致各国不会彻底推翻旧制度，也缺乏进行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的动力。<sup>①</sup>各国发展一时难以摆脱苏联政治遗产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惯性。<sup>②</sup>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警告美国战略界对中亚政治发展不能有乐观的期待，原因在于，迅速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和极端宗教思想的传播，导致中亚在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面临更大的暴力冲突和政治动荡。<sup>③</sup>凯罗塞斯（Thomas Carothers）认为，中亚进入了“灰色地带”，既非完全权威，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sup>④</sup>这些维度代表了长期观察中亚的西方政治学者情感倾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不过，可能会令这些观察家们诧异的是，尽管中亚各国面临诸般社会和经济问题，但多数中亚国家依然建立起强总统制政体，政治强人们牢牢控制着权力。自 2000 年以来，与其他后苏联空间的次地区相比，中亚政治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稳定性。<sup>⑤</sup>

---

① Jonathan Grant, “Decolonization by default: Independence in soviet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1994, Vol.13, No.1, pp.54-57.

② Jindřich Fibich, “The Post-Communist Mentality”, *Perspective*, 1995, No.5, p.64.

③ Zbigniew Brzezinski, *Strategic Vision: American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p.128-130.

④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1, pp.11-13.

⑤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详细参见孙超：“国家构建、民主化回应与中亚政治稳定的形成”，《国际关系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22-56 页。另见杨恕：“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形式及其评估”，载王缉思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7》，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 年，第 259-268 页；Mariya Y. Omelicheva, *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Fatima Kukeyeva, Oxana Shkapyak, “Central Asia’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3, Vol.81, pp.79-83；Donnacha Ó Beacháina, Rob Kevlihan, “Imagined

中亚国家的政治转型，演绎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政治去中心化到如今政治集权的有趣故事。<sup>①</sup>独立初期的国家治理困境并没有削弱统治阶层的权力控制，也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和政治分裂。由此中亚政治转型研究产生了新的方向，对中亚民主转型的研究逐渐转向对中亚政治变迁动力和政治前景的探讨。学界普遍批评中亚的政治转型，认为中亚内部的非制度因素——传统的部族政治、地方主义和权力网络等会给中亚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sup>②</sup>与此同时，受国际环境、阿富汗局势和大国博弈的影响，威胁中亚政权的内外因素容易相互缠绕、相互影响，威胁体制安全。<sup>③</sup>“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哈里发战士”、“圣战派萨拉菲”等恐怖组织以及“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回流，严重威胁中亚安全局势，甚或影响中亚体制生存。<sup>④</sup>

---

Democracy? Nation-Building and Elections in Central ASIA”,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2015, Vol.43, No.3, pp.1-18. 2015 年 *Nationalities Papers* 出版一期特刊，专门讨论中亚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成就和思路，强调学者要重视研究“想象共同体”与“现实共同体”之间的灰色地带（grey zones），以此推动中亚政治研究。参见特刊内容介绍 Rico Isaacs, Abel Poleseb, “Between ‘Imagined’ and ‘real’ nation-building: identities and nationhood in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5, Vol.43, No.3, pp.371-382. 具体内容参见 2015 年第 3 期 *Nationalities Papers* 刊载的文章。

① Alisher Ikhamov, “Neopatrimonialism, interest groups and patronage networks: the impasse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n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1, p.65.

② Shirin Akiner, “Melting pot, salad bowl cauldron? Manipul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Central As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997, Vol.20, No.2, pp.362-398; Kathleen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2004, Vol.56, No.2, pp.238-239; 对部族政治的研究还可参见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赵龙庚：“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骚乱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及其影响”，《世界民族》，2006 年第 5 期，第 3-29 页。

③ 苏畅：“论中亚安全威胁因素的集聚效应”，《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116-135 页。

④ 中国学界对中亚三股势力有大量的研究，甚至形成了中国中亚研究的传统。比较代表性的有陈联璧：“三个‘极端主义’与中亚安全”，《东欧中亚研究》，2002 年第 5 期，第 56-62 页；杨恕、林永锋：“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8 年第 5 期，第 62-70 页；古丽阿扎提·吐尔逊：《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年；苏畅：“中亚国家政治风险量化分析”，2013 年第 1 期，《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第 31-41 页；李琪：“中亚地区安全化矩阵中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第 49-59 页；杨恕、蒋海蛟：“‘圣战派萨拉菲’在中亚的活动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5 期，第 39-53 页；苏畅：“试析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面对威胁体制生存的急速发展的三股势力，中亚政治研究转向体制安全范畴实属必然。然而，学界对中亚政治安全的关注，相对弱化了对中亚政治转型内在逻辑的梳理，致使中亚政治研究呈现出安全研究占主导的局面。一方面，大国对中亚的关注提升，增加了其对中亚战略和局势的聚焦性关注，并采用不严谨的“概念”来推敲中亚政治变迁的逻辑，这方面以美国学界最为典型。“9·11”事件之后，美国介入中亚事务，致力于将中亚整合进西方的价值体系，塑造中亚的发展方向。<sup>①</sup>正因如此，美国中亚研究界需要塑造“危险话语”——通过片面或扭曲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的风险，建构出一种中亚地区危险重重、随时可能爆发各种危机的形象。<sup>②</sup>另一方面，中亚政治转型的不确定性，导致中亚政治的不稳定性增强。对中亚政治演进潜在风险的深度关注，成为中亚政治研究的核心。有学者发现，中亚政治安全是通过大量的表意政治（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技术——全民公投、去政治化战略以及政治空间的去族群化技术——实现的。<sup>③</sup>这种政治技术维持了中亚各国政治力量的动态平衡，但是表意政治技术中多维复杂的政治符号，也带来了新的政治风险，增加了现代国家建设的难度，对国家能力提升是巨大挑战。一些学者回避单纯的政治制度分析，使用“国家-社会”二分法，通过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意图展现国家政权强力维系“没有活力的中亚公民社会（Zombies）”如何引起社会对国家抗争，走向颜色革命。<sup>④</sup>在他们看来，之所以很多社会抗争没有胜利，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对中亚的权威护持。

---

2015年第3期，第71-78页；苏畅：“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由来及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期，第56-62页；宛程、杨恕：“‘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迷思还是现实？”，《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8-148页。

① 曾向红：“美国对中亚事务的介入及中亚国家的应对”，《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3期，第34-61页。

② 具体参见曾向红、杨恕：“美国中亚研究中的‘危险话语’及其政治效应”，《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93-113页。

③ 具体详见 Sally N. Cummings, “Inscapes, Landscapes and Greyscapes: The Politics of Signification in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9, Vol.61, No.7, pp.1083-1093.

④ Alexander Cooley, “Countering Democratic Norm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15, Vol.26, No.3, pp.53-56.

俄方通过各种手段，防止任何可能威胁中亚国家政权稳定的草根抗争。<sup>①</sup>

美国比较政治学界研究中亚政治的最高峰，是对中亚非正式制度体系的综合研究——即新庇护主义（neopatrimonialism）概念系统在中亚政治的创造性应用。新庇护主义是世袭主义在“后传统社会”的特定类型，即当代“世袭制”。<sup>②</sup>20世纪70年代埃森斯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首次将该概念运用到对拉丁美洲、南亚和中东的政治分析中，并提出了新庇护主义的概念系统。<sup>③</sup>新庇护主义指的是一种非正式的庇护关系，庇护人使用国家资源换取受庇护者的政治忠诚。这种结构在国家结构和乡村治理中普遍存在，构成了一种政体类型。胡安·林茨（Juan Linz）和斯泰潘（Alfred Stepan）为研究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民主转型，引入了庇护主义的极端类型——苏丹制，用于描述对民主进程进行抵制的极端政体类型。<sup>④</sup>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新庇护主义通常被视为腐败、恩庇主义（clientelism）、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强人政治、军阀主义（warlordism）、攫取型制度和盗贼政治（kleptocracy）等概念的同义词。<sup>⑤</sup>但很快，新庇护主义被运用到对中亚政体类型的分析中，并成为深度分析中亚政治的“默认”标准模型。<sup>⑥</sup>中亚国家精英由过去代表中央/宗主国的精英构成，制度规范被限制在国家行政范畴，而权力的实践

---

① Charles E. Ziegler, “Great Powers, Civil Society and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6, Vol.35, No.4, p.5; Charles E. Ziegler, edited,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5.

② 世袭制（patrimonialism）概念灵感来源于马克斯·韦伯（Marx Web）对家长制以及苏丹制（家长制的极端形式）的论述。世袭制是韦伯政治学中一种统治类型，其权威来自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对传统的虔敬，另一个是对主宰者的虔敬，后者会约束前者；政治规范来源于传统，相信自古已存在的传统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5-1214页。

③ 具体参见 Shmuel Noah Eisenstadt, *Traditional Patrimonialism and Modern Neopatrimoni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3, p.15; Daniel C. Bach, “Patrimonialism and neopatrimonialism: comparative trajectories and readings”,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July 2011, Vol.49, No.3, p.276.

④ [美]胡安·林茨、[美]阿尔弗雷德·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与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孙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58页。

⑤ Peter Evans, “The State as Problem and Solution: Predation, Embedded Autonomy and Structural Change”, in Stephan Haggard, Robert R. Kaufman,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Distributive Conflict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39-181.

⑥ Rico Isaacs, “Neopatrimonialism and beyond: reassessing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in the study of Central Asian politics”,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14, Vol.20, No.2, pp.229-230.

仍依照政治传统进行。换句话说，尽管中亚从制度层面完成了政治现代化，发展出了符合现代规范的国家结构，但中亚各政权内在的权力流动与分配，还是倚靠新庇护主义提供的权力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权力网络在中亚无所不在，他们通过出口原料来维持经济稳定，通过部族之间的协议实现国家稳定，甚至可以拿来同非洲新庇护主义进行直接比较。<sup>①</sup>从中亚半总统制的强化、能源出口为主的经济体系，再到中亚部族政治、国家治理能力弱化、腐败的盛行以及中亚地方主义等，都可以被整合进中亚新庇护主义的概念体系的分析中。新庇护主义被认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亚和后苏联空间各国的国家建设进程，是对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深描”。<sup>②</sup>

综上，美国版的“傲慢与偏见”在中亚研究领域展现得淋漓尽致。大量“危险话语”的创造，旨在为美国更多地介入中亚政治进程开路。作为单极世界领袖的美国，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能够避免让中亚沦为“仇外、极端主义和反西方”的前沿阵地，是中亚各国成为“负责任”国际行为体的必担之责。<sup>③</sup>这种心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国家学者对中亚政局的判断。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中亚安全形势往往也持悲观态度，这并不符合该地区维持较长时间稳定的现实。<sup>④</sup>当前，政治科学界的“制度主义”研究范式重新回归，制度对威权政体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确证。<sup>⑤</sup>本文认为，研究中亚政治不能回避制度分析，不能用“新庇护主义”替代正式制度理解中亚的政治演进。

“新庇护主义”概念体系助推了西方学术界研究中亚政治研究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二元逻辑的形成。但事实上，制度构建不仅是中亚政治的核

---

① Marlene Laruelle, “Discussing Neopatrimonialism and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in the Central Asian Context”,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20, No.4, p.308.

② Alisher Ilkhamov, “Neopatrimonialism, interest groups and patronage networks: the impasse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n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1, pp.65-84.

③ Jim Nichol, “Central Asia: Regional Developme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March 2014, RL33458, Summary.

④ 曾向红：“‘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力支持——中亚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国际展望》，2016年第5期，第12页。

⑤ Thomas Pepinsky,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3, Vol.44, No.3, pp.1-23.

心内容，也是中亚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制度渗透”（建立新的正式制度以减少非正式制度权力运作的空间）和“制度互融”（将非正式制度融入正式制度之中）扩张了国家在社会和地方层面的权力，是中亚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并推动着中亚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s）的形成。

当前，中亚政治突破了正式/非正式制度的二元逻辑，正在形成现代中亚政治。因此，对中亚政治发展的理解不仅要突破对权威政治的静态认知，更需要破除西方学术界的悲观共识（dismal consensus），即所谓“稳固僵化的权威政治带来衰朽的政治风险”，重新建立起对中亚政治现代化的研究议程，创造新的问题领域和研究范式。<sup>①</sup>下文分四个方面展开：首先，通过对现代国家建设初期强弱发展的正反比较，讨论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的演进，确立中亚现代政治研究的新范式，从制度互融的角度构建理解中亚政治演进的新框架；其次，分析乌兹别克斯坦与土库曼斯坦的案例，从现代国家建设视角讨论中亚各国如何将“非正式制度”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范畴，进而推动中亚中心化国家的形成；然后，将吉尔吉斯斯坦作为负面案例，论证缺乏非正式权力网络的持续支持、仅通过制度变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弱势政权，为什么难以维系中亚政治稳定；最后一部分是总体上的反思和讨论。

## 二、制度互融：中亚现代政治研究新范式的涌现

中亚政治研究建立在转型研究和制度主义范式基础之上，并孕育出中亚现代国家构建研究这一新领域。中亚政治分析，从这些国家独立之初就被带上“后殖民主义”的话语。苏联解体之后，新出现的国家突然转变为与苏联完全不同的“异质共同体”，这些国家是否能被称为“民族国家”在当时仍待检验。中亚各国不仅要在国际社会“为（被）承认而斗争”<sup>②</sup>，更需要在国内建立韦伯式的现代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巩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马克

---

① Vladimir Gel'man, “Bring Actors Back in: Political Choices and Sources of Post-Soviet Regime Dynamics”, *Post-Soviet Affairs*, 2018, Vol.34, No.5, pp.282-296.

② 具体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5-155页。

斯·韦伯（Marx Web）强调，现代国家是一种区域性强制组织，对它管辖权所及的区域内发生的一切行动行使具有约束力的权威。<sup>①</sup>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言，现代国家有确定的边界，在其领土之内是集权式的政治统治。<sup>②</sup>一个现代国家相对团结，其主要原因是国家精英保持了融入性，能融入各种市民社会的权力网络。<sup>③</sup>换句话说，现代国家要求政权必须确立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的权力结构，对境内各类权力网络拥有垄断性的统摄力。与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强调权力集中于中央不同，现代中心化国家强调国家实现意志的能力以及政治对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权力结构的绝对控制力，强调社会和市场向国家让渡权力，以换取现代国家给予保护和一定的自治权利。哈尔登（Peter Halden）继承了韦伯的国家观，认为国家获得自身安全及保障功能正常运转，是现代国家成功构建的基础。<sup>④</sup>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中心化国家构建极其重要，它指的是中央政府在境内持续享有最高管辖权，并可以采取行动顺利贯彻国家意志，任何力量都不能以任何形式或理由挑战国家权威。

现代国家是其领土内具有凝聚性和控制力的组织，这是中心化国家构建的目标。中心化国家是一切现代国家获得安全、实现国家各项功能顺利运转的重要保障。但在实践中，国家只是众多社会组织的一套组织，内在并不具备必然的凝聚力，甚至组织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也缺乏紧密的衔接和控制力，还要经常应对外部组织与社会权力网络的挑战。<sup>⑤</sup>中亚各国政权在独立之初就面临着三大难题：如何消除地方势力（民族共同体）的割据力量，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增强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建立健全的现代政治治理结构；

---

① [德]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中译本）第一卷，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50页。

② Mann Michael,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 Vol.25, No.2, p.63.

③ [美]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阶级与民族国家的兴起（1760-1914）下》，陈湘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3页。

④ Peter Halden, "Against endogeneity: the systemic preconditions of state formation", edited in *New Agendas in Statebuilding: Hybridity, Contingency and History*,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2013, p.33.

⑤ [美] 乔尔·米格代尔著：《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洋、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页。

如何克服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发展民族经济。<sup>①</sup>在新国家构建之初，中亚各国政权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社会势力和非制度权力网络的巨大挑战。<sup>②</sup>可以说，中亚各国独立之初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构建中心化国家。

在中亚，国家精英大都来自于苏联时代的精英集团，没有形成行政、司法和立法之间的制衡体制，总统个人依据宪法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和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分别是原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尽管五国都尝试建立现代中心化国家，但都遭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之初就面临着大、中、小玉兹之间争夺中央权力的矛盾；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的地区部族势力也异常强大；吉尔吉斯斯坦地区主义发展迅速，其境内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之间的族群矛盾突出；土库曼斯坦面临着因部落之间权力极其不对称而可能带来隐患。此外，还有民族矛盾、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及各种外部因素，同时社会发展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些都不利于中亚政治的巩固。

另外，国家认同仍需时日。民众对现代国家认识的模糊，导致爱国热情和民族认同一时难以形成。而中亚精英们紧抓权威政治，抵制政治发展的其他方向。<sup>③</sup>这些情势也催生了西方对中亚现代国家的误解，即，将中亚各国视为“不正常”的民族国家。当前，中亚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形象：一种是以哈萨克斯坦为代表的强国家形象，建立起强总统政治，通过各种现代政治技术，将社会塑造成适应国家发展之需的政治共同体；另一种则是以独立后迅速陷入内战的塔吉克斯坦为代表的弱国家形象，国家在令人眩晕的社会变化漩涡中几乎无能为力，面临多种力量挑战，

---

① Georg Sørensen, *Changes in Stateho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104.

② [美] 乔尔·米格代尔等主编：《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第三世界的统治与变革》，郭为桂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4页。

③ David Lewis, “Sovereignty after Empire: The Colonial Roots of Central Asian Authoritarianism”, edited by Sally Cummings and Raymond Hinnebusch, *Sovereignty After Empire: Comparing the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84.

自主性难以形成。<sup>①</sup>共同之处在于，强国家和弱国家都推动了中亚国家精英向社会寻求更多的权力，并以此构建“庇护关系”，依靠族群、部落、地区和其他传统政治，形成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权力网络。中亚国家的精英基本上是按照“家族-同族-同乡-其他”这样的差序格局自内向外辐射，缺乏维护国家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合法性。<sup>②</sup>这些非正式的“庇护网络”虽然推动了中亚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但却极大地制约着领袖在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反过来，政治领袖也同样能够通过现代国家管理技术影响“庇护网络”的发展。借助现代官僚政治和民事机构扩张的进程，一些中亚国家的领袖通过差序格局的权力网络，迅速建立起忠诚于个人的权力结构，将非正式权力网络融入正式的制度建设，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非正式制度已成为中亚政治的重要维度，深切影响到中亚现代国家构建。因此，对中亚非正式制度源起及发展脉络的分析显得十分必要。现代国家构建需要持久的政治动员，需要争夺忠诚度以及树立新的政治权威，并向公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遵从国家的例行程序、标志象征及行为方式，对他们今后的福利是必需的。但这需要面对自苏联时代以来形成的地方势力的挑战。自苏联时代以来的地方主义，因抵制苏维埃权力渗透而逐渐形成强力地方社会网络。这种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的形成，与苏联在中亚的民族治理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中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民族识别和划界工作，多数人在进行户籍调查时难以分清自己的身份类别，将自己所在的部族（clan）、部落（tribe）与民族（nation）混淆起来。1924年中亚地区加盟共和国的边界开始确定。尽管统计学家、民族学家和调查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所收集到的统计数据并不足以帮助政府官员了解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民族构成，导致对突厥斯坦的民族识别和划分工作，基本上是在“空白页”上进行的。尽管收到来自各州和次地区民族的大量请愿，苏联政府还是

---

① 对这两种典型的国家形象分析，参见[美]乔尔·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0-65页。

② 赵会荣：“论中亚国家整体发展进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62页。

坚持“分而治之”原则，改组了原有行政单元突厥斯坦。<sup>①</sup>苏联政府任命当地的教育精英（而非宗教精英）为地方领袖，将“民族”（nations）（而非传统的部族）视为重新组建中亚政治单位的原则，着力构建世俗化的、拥有新型民族特征的中亚加盟共和国。<sup>②</sup>1936年中亚地区民族识别和划界工作最终完成，形成了5个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但即便如此，部族的烙印却没有消除，反而随着农业集体化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形成了新的部族关系和庇护网络。<sup>③</sup>苏联尝试在中亚建立新的族群-国家认同，但这种现代认同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勃列日涅夫时代遭到削弱，中亚干部职位的长期稳定及高级干部的俄罗斯化，反而推动非正式制度的庇护网络复活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苏联中晚期中亚现代政治发展的阻力，延缓了中亚早应完成的政治现代化。

苏共中央努力实现中亚现代化，但部族的政治传统已经渗透到中亚地方社会，成为政治动员的工具。在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部族政治兴盛不衰；在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民众对本部族所在的地区认同强烈。<sup>④</sup>部族政治成为中亚政治的独特类型，它不仅意味着对血亲家庭及其所在的氏族和部落的忠诚，还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地域集团，构成了中亚权力结构的社会文化基础。在哈萨克，部族政治表现为大、中、小玉兹之间的权力斗争与平衡。吉尔吉斯部族政治表现为，吉北部和西部的平原地区的部族联盟以及吉南部

---

① 1924年，苏联政府组建乌兹别克和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9年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塔吉克斯坦升格为加盟共和国，1936年，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都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具体参见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25页。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中亚加盟共和国在划界过程中（不同时段）的主动性，以及央地之间、地方势力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可参见施越：“‘分而治之’还是‘自下而上’——再议苏联初期的中亚民族划界”，《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3期，第120页。

② Francine Hirsch,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0-165.

③ Kathleen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World Politics*, 2004, Vol.56, No.2, pp.238-239.

④ Rafis Abazov, “Central Asia’s Conflicting Legacy and ethnic policies revisiting a crisis zone of the Former USSR”,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1999, Vol.5, No.2, p.67.

山区和支持南部地区的地域集团。<sup>①</sup>塔吉克与乌兹别克由于长期的定居生活，逐渐发展出以一定的自然区域为核心、相对自给自足的绿洲文化群体，权力的地域分布不均衡。<sup>②</sup>塔吉克内部存在国家权力地域分布不均衡，形成了强烈的地方主义。这表现为以苦盖（列宁纳巴德）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库利亚布为中心的南部地区的权力分野。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则以伊斯兰历史古城（如，塔什干、撒马尔罕）为中心，形成了大小范围不同的伊斯兰城市自治组织马哈拉（Mahalla），发挥政治影响力。土库曼部族政治也表现出强烈的地域性，形成了西部部落、东部部落和北部部落三个部分；各部落人口不均，最大的两个部落特克和约穆德人口占到全国一半以上，分布占到全国总面积的60%。<sup>③</sup>

在中亚，一旦部族成员在地方党组织和经济行政系统中获得职位，就意味着其亲戚和部族很有可能获得庇护。这种传统的部族结构与正式的制度结构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着苏联国家建设工程，塑造出独特的中亚政治文化。为解决部族政治带来的政府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及民族歧视问题，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对中亚加盟共和国发动了政治清洗。这场清洗持续到1988年才结束，成千上万人被剥夺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俄罗斯族人开始在中亚加盟共和国的高层中占据优势，没有部族联系的俄罗斯人在此执行莫斯科中央的清洗政策。<sup>④</sup>但中亚政体内部的民族意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其他地区民族分离运动的涌现而逐步觉醒。同一时期，苏联的政策也给中亚各部族集团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影响其认同和经济利益。各部族联合起来强烈反抗苏共中央的各项政策。同时，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各部族内部达成政治妥协，维持权力的大体平衡。而塔吉克斯坦的列

---

① 吉尔吉斯斯坦部族分为三大地域集团：由萨雷巴嘎什、库什丘、索尔托、特纳伊、萨雅克、布库、萨鲁七大部族组成的吉北部集团，吉南部山区的埃迪基内集团以及伊奇基利克集团。参见焦一强：“影响吉尔吉斯政治转型的部族主义因素分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3期，第18页。

② 包毅：“简析中亚国家政治转型中的部族政治文化因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9年第5期，第8-9页。

③ 吴宏伟、肖飞：“土库曼人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40-41页。

④ Kathleen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p.240.

宁纳巴德地区部族精英因经济发达而能在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故能长期保持着对加盟共和国权力的绝对控制。

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独立，部族政治依然影响着中亚各国的政治进程。苏联成功改变了俄帝国时代中亚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使用“苏联人”（即，讲俄语、忠于莫斯科）的人民身份代替了之前的部落和亲族身份等，对中亚进行较为彻底的“苏联化”。<sup>①</sup>同时，中亚当地传统的社会结构演变为一系列非正式制度权力网络，在宗族势力基础之上与地方势力相融，发展成权力共同体。<sup>②</sup>在苏联对中亚各国进行强力的国家/民族构建时，对抗的共同体也潜流涌动，形成了对抗中央权威、世俗政府甚至是主体部族的政治势力。这些政治势力由部族、族群、地方大家族甚至是地方自治单元构成，这是一个权力网络，在苏联解体之后变得更为强大，承担着部分国家职能。<sup>③</sup>如何整合这些非正式制度，构建高效国家，是中亚政权生存的关键。强国家哈萨克斯坦巧妙利用制度建设和制度融合，推动了现代国家建设。纳扎尔巴耶夫在其执政之初就对哈萨克斯坦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现代国家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并利用非正式制度的权力网络巩固自身权力。除了巧妙利用正式制度让自己推荐的代表进入议会和宪法法院以获得最大支持之外，纳扎尔巴耶夫还发动全民公投修改宪法以延长总统任期，在建国初期就稳定了强总统制的权力结构。<sup>④</sup>纳扎尔巴耶夫通过人事政策，创造了新的庇护/被庇护的关系，同时利用个人权力巩固自身权力网络金字塔。

在独立之初，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为有效平衡部族利益，标榜专家治国并吸纳大、中、小玉兹的干部，但同时也逐渐将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吸纳进体制中占据高位，在制度内部培育了强大的个人势力。<sup>⑤</sup>另外，纳扎尔巴耶夫通过将中央巡视工作制度化、任命州长、空降地方长官、支持哈萨克族担任地

---

① 石婧：“中亚历史进程中的伊斯兰化、突厥化和俄罗斯化及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86页。

② Allworth Edward, edited, *Central Asia: 130Years of Russian Dominance: A Historical Overview*, 3rd e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93.

③ [美] 乔尔·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等译，第73页。

④ Cummings Sally edited, *Power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63-65.

⑤ Ibid, p.67.

方领导等做法，将庇护关系与地区管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广泛的国家庇护权力网络，推动了哈萨克斯坦中心化国家的形成。哈萨克族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以及纳扎尔巴耶夫在政治上对大玉兹和中玉兹的庇护，在行政改革中打击“以部族为基础”的地方主义，有效地遏制了小玉兹地区（哈西部地区）势力和分离主义的发展。在纳扎尔巴耶夫执政时期，哈萨克斯坦小玉兹和斯拉夫人在长达 20 多年的转型政治中没有获得相应政治权力，对此多有抱怨，一些地方还爆发了骚乱事件。<sup>①</sup>随着油气资源的开发和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逐步开展，哈萨克斯坦政治稳定，经济转型也较为成功，成为中亚地区凝聚力较高的国家，部族政治对当前政治秩序的影响相对较小。<sup>②</sup>

与哈萨克斯坦较为成功的强国家形象相比，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可以算是代表了非正式制度给国家建设带来负面效应的极端例子。非正式制度网络之所以能够在塔吉克斯坦部分承担国家职能，并且成为国家权力斗争的动力源，其根本原因在于，塔吉克斯坦因地理分割和信息闭塞，造成民众并没有意识到扰乱国家制度和规则所带来的危害，也没有足够渠道支持国家精英。这就导致塔吉克斯坦在建国初期，因国家精英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不得不求助于更弱小、但与其政权利益相一致的部族势力。在苏联时代，北方人就（列宁纳巴德地区部族）难以团结塔吉克地域内各部族来发挥领导作用。分处塔吉克各地的部族——塔吉克东南部库利亚布州的库利亚布人、西南部地区的哈特隆州塔吉克人以及东部地区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的塔吉克人——由于地理原因相对隔绝，相互之间联系有限，经济活动也有所不同。正是由于这些差异，苏共中央和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地区的支持力度也不同。北方地区靠近经济较为繁荣的费尔干纳谷地，经济较为发达，享有更多的财政支持；南方经济落后，犯罪率居高不下；东部地区相对隔绝。经济较为发达的北方地区的塔吉克人，容易获得在莫斯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库利亚布人通常能在塔吉克警察系统中获得职位，帕米尔塔吉克人盛

---

① 吴宏伟、张昊：“部落传统与哈萨克斯坦当代社会”，《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8-9 页。

②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7.

产穆斯林知识分子。<sup>①</sup>由于塔吉克斯坦靠近阿富汗，苏共中央为了防止塔吉克政权过于伊斯兰化，一直笼络列宁纳巴德的部族联盟，因此塔吉克精英在苏联时代并未经历过红色清洗。而列宁纳巴德集团中的苦盏部落在莫斯科的庇护下，获得了对塔吉克斯坦的绝对控制力。<sup>②</sup>从1946年到1991年，塔吉克政权一直都是由列宁纳巴德地区的部族主导，而库利亚布地区部族仅占该国精英的一小部分，其他地区的部族精英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1991年夏，苏联爆发八一九事件，各种集团势力参与政治的欲望得以伸张，以南方集团为核心的反对派开始崛起，对抗北方集团。<sup>③</sup>逐渐分化成型另外的四大地域集团——卡特拉津人、吉萨尔人、库利亚布人和帕米尔人——走上历史舞台，与北方人（苦盏地域集团）争夺权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势力迅速崛起，加入到权力争夺中。1991年由于反对派对总统选举不满，北方人和库利亚布集团同东部地区爆发部族集团冲突，冲突迅速升级为内战。尽管塔吉克斯坦内战随着1997年《关于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和平与民族和睦总协定》（简称《总协定》）的签署而结束，但塔吉克斯坦却面临更为艰巨的整合部族、文化、地域及政治派别等国家民族构建的任务，塔吉克斯坦仍然没有完成整合非正式制度的国家构建目标。<sup>④</sup>

通过对中亚典型的强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弱国家——塔吉克斯坦的政治转型分析，可以看到，非正式制度在塑造中亚国家性上的重要地位。这一现象也促使一些学者将中亚各国政治转型，视为传统部族势力或争夺或巩固中央权力的政治过程，用新庇护主义概念体系重新认识中亚政治，将其视为前现代政治在后冷战时期的具体展现。总统、部族首领、宗教长老在中亚

---

① Paul Goble, "Today's Ethno-Regional Clans in Tajikistan Are products of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Eurasia Daily Monitor*, 2015, Vol.12, Issue.136,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odays-ethno-regional-clans-in-tajikistan-are-products-of-soviet-nationality-policy/>

② Kathleen Collins, "The Logic of Clan Politics: Evidence from the Central Asian Trajectories", pp.242-243.

③ 孙超：“我们是谁——塔吉克斯坦的认同政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1期，第26页。

④ 塔内战还促成了中亚唯一宗教性政党——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的合法地位。具体参见曾向红、杨恕：“中亚各国国家民族的构建：以塔吉克斯坦为例”，《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2期，第155页。

政治中比正式制度更有力量塑造政治秩序，国家制度却无力影响精英竞争和政治手腕。<sup>①</sup>除了迅速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其他国家似乎都在有意维持“苏联政治体制”，而不是更新或革命。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中亚政治逐渐回归到前现代的政治治理结构呢？<sup>②</sup>

西方主流学界对民主制度的偏爱以及对转型理论的支持，导致对中亚制度构建的认识出现误区。将权威政治强调为非民主化的制度实践，显然忽视了权威政治对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与举措。民主尚未获得普遍的实践，却成为普世皆准的价值观。<sup>③</sup>这种认知将中亚的政治发展定位为“违背”民主价值的前现代政治，导致对非正式制度的刻意强调，将新庇护主义而不是正式的制度构建，视为中亚政治稳定的主要根源并强调其落后的特质。<sup>④</sup>从上文案例可以看出，中亚的政治起点，是对强力政权的需求，这要远远高于对政治民主化的诉求。甚至可以说，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并不是源于民主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而是来自领袖个人魅力和高效的权力庇护网络。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实践并不是“前现代的”，而是通过动态的制度调整，推动现代中心化国家的形成。这种动态的制度调整，造成非正式制度与制度之间形成复杂交融的关系，再难以完全按照之前的“非正式/正式制度”二元法来进行分类。这种制度互融，也是脆弱国家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所迫切需要的。<sup>⑤</sup>其表现为权威政治领袖有意将非正式网络建构为正式的制度化结构，从而推动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下文将进一步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进行案例研究，讨论两国领袖如何使用“制度创设”（建立新的正式制度）和“制度替代”（将非正式制度融入正式制度之中），推动新庇护主义走向台前，通过构建一整套现代国家机器，推

---

① Paul Kubicek, “Authoritarianism in Central Asia: Curse or Cure?”,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8, Vol.19, No.1, pp.30-31.

② Kathleen Collins, *Clan Politic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Central Asia*, p.246.

③ Amartya Sen, “Democracy as a universal valu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9, Vol.10, No.3, pp.3-17.

④ Alisher Ilkhamov, “Neopatrimonialism, interest groups and patronage networks: the impasse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n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1, pp.65-66.

⑤ 关于威权政治个人推动权力网络制度化的理论讨论可以参见 Thomas Pepinsky,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pp.14-18.

动中心化国家的形成，从而完成了中亚政权的正式制度构建。

### 三、现代中心化国家的形成：制度推进与合法性重建

巩固中亚强总统制的非制度权力网络，既不是对政治现代性的背反，也不是停留在庇护主义（patrimonialism）层次而一成不变。<sup>①</sup>部族政治、领袖的权力网络和庇护主义不是民主制的垫脚石，其自身发展有内在的逻辑。与透明的、以法理为根基的制度相比，这些因素难以直接转变为推动中亚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源。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权力网络与中亚政治现代化相冲突，甚至成为中亚政治现代化的障碍。理解中亚政治的现代性，需看清两种趋势的竞争，即，现代中心化国家构建的制度化倾向与盘根错节的部族势力扩展既有优势的政治博弈。除了现代国家建设颇具特色，在构建新制度和吸纳非正式制度上，中亚政权也形成了自身的独特风格。

作为非制度庇护网络较为活跃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从一开始就饱受西方诟病。在 2019 年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发布的数据中，乌兹别克斯坦在 50 个最不自由的国家中排名第 9，可以说是政治自由“极其糟糕”国家。<sup>②</sup>2019 年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腐败指数排名，乌兹别克斯坦自 1999 年到 2018 年平均排名第 140 位。2018 年，在 175 个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排在第 158 位。<sup>③</sup>但乌兹别克斯坦依然是当前世界上最稳定和安全的国家之一。<sup>④</sup>除了人均 GDP 仅次于哈萨克斯坦外，乌兹别克斯坦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工资收入和家庭收入也逐步提升，甚至形成了中亚

---

① Rico Isaacs, “Neopatrimonialism and beyond: reassessing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in the study of Central Asian politics”, p.230.

② “Democracy in Retreat”, *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 p.10,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eb2019\\_FH\\_FITW\\_2019\\_Report\\_ForWeb-compressed.pdf](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eb2019_FH_FITW_2019_Report_ForWeb-compressed.pdf)

③ “Uzbekistan Corruption Rank”, 2019,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zbekistan/corruption-rank>

④ 根据 2018 年美国调查机构盖洛普咨询公司来自 142 家国家的 14.8 万名 15 岁以上的居民问卷调查，2018 年全球最安全国家排名，乌兹别克斯坦排名第 5 名，得分 91 分。具体参见“乌兹别克斯坦入选 2018 年全球最安全的五个国家之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8 年 7 月 27 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807/20180702762418.shtml>

经济发展的“乌兹别克模式”。<sup>①</sup>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乌兹别克斯坦率先实施反危机措施，减少经济发展的波动性，避免了经济危机带来的震荡。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渐进地推动政治改革和培育公民社会，国家力量也得以不断巩固。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顺利继任总统，签署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一步发展战略》和《2017-2021年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五大优先方向行动战略》，在国家治理体系、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进行渐进性的社会变革。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巩固了乌兹别克斯坦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乌兹别克斯坦的威权政治，使比较政治学界对该国评价两极分化。但不容否认，乌兹别克斯坦的威权政治不仅持续存在，而且能顺应环境变化，在经济建设上也颇有成就。除了2005年爆发的安集延事件之外，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出现较大的抗争事件。依靠现代国家民族构建的强力逻辑，乌兹别克斯坦在借鉴西方国家和苏联行政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僚体制：通过制度创设和互融，对非正式制度进行规训，形成了中亚典型的发展模式，即现代中心化国家（centralized state）。

与塔吉克斯坦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深受地方主义（regionalism）的困扰。<sup>②</sup>直到今天，乌兹别克斯坦人会依据不同的方言、习惯和传统塑造认同

---

① 自2003年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历年GDP增长率维持在4%以上，2008-2013年维持在8%以上。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被视为中亚的“乌兹别克模式”。参见 Andrew Buchman, “The ‘Uzbek Model’ of Development: Slow, Stable and Showing Success”, *The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tical Article*, 28 January 2004, <https://www.cacianalyst.org/publications/analytical-articles/item/8704-analytical-articles-cacianalyst-2004-1-28-art-8704.html>; G.N.Khaki, Riyaz Ahmad Sheikh, “Uzbekistan: Karimov’s Model of Economy: Dynamic or Paradox A Critical Study”, *Studies in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6, Vol.3, No.1, pp. 58-59.

② 根据卡拉维茨（İdil Tunçer-Kılavuz）的田野调查，部族（clan）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被视为消极轻蔑的指称，也难以完全指称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单元马哈拉（乡邻）、村庄（qishlok）以及多斯提（教友）。这里用地方主义（regionalism）表示来自同一地域和行政单元（州）所形成的共同体建设。这并不是说地区就是一个单一行为体或是稳定内在一致的分类。来自同样地区的政治精英或许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来自不同地区的精英却可能结盟。但是这种强调地域差异的社区认同（mahallachilik）是普遍存在的。参见 İdil Tunçer-Kılavuz, “Political and social networks in Tajikistan and Uzbekistan: ‘clan’, region and beyond”,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9, Vol.28, No.3, p.324. 因为该英文单词在中文翻译上出现两难境地：地区主义在我国国际关系学术领域泛指地理上相邻或相近的一组国家，为了特定的共同目标而推动相互间整合的理论和实践；而地方主义有单独的英文

以区别他者。祖父的出生地往往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地区认同的源头，“你来自哪个地区”是再正常不过的问题。<sup>①</sup>受历史和传统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内部大体分为三大部分：原属浩罕汗国的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地区（塔什干、纳曼干、安集延与费尔干纳）；原属布哈拉汗国的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南部地区（布哈拉、撒马尔罕、卡什卡达利亚州、苏尔汉河州、吉扎克州以及纳沃伊州的一部分）以及原属希瓦汗国的乌兹别克斯坦西部和西北部地区（花刺子模州和卡拉克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sup>②</sup>地方情感渗透到社会行为中，影响着乌兹别克斯坦的群体政治。这其中又以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地区以及费尔干纳州最具代表性。在卡里莫夫当政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由于缺乏整体性的法治建设方案，导致精英通过非正式地区权力网络掠夺国家财富，形成强有力的庇护集团。<sup>③</sup>卡里莫夫小心谨慎，为求政权稳定而与各方势力合作达成政治平衡。为避免各派势力发生政治冲突，卡里莫夫拒绝采取任何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也避免引入竞争性选举，同时打击反对派，极力维护政治稳定。这使得乌兹别克斯坦逐渐成为中亚唯一不靠“民主选举”赢得合法性和国际支持的国家。<sup>④</sup>除此之外，乌兹别克斯坦还发展出一套依托社会组织吸纳精英、推动制度建设的新模式。这些组织不仅能够严格履行国家职能——对社会进行严格的安全控制，阻碍社会抗争的出现；而在另一方面，这些组织还承担着社会再分配的职能。<sup>⑤</sup>

乌兹别克斯坦极力将非正式权力网络吸纳为国家力量，保持地方政府长期的高雇佣率，维持高额的健康与教育开支，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乌兹别

---

词汇（localism）直接指称，泛指本地方的利益放在首位，不顾甚至破坏全局利益的思想 and 行为。这与中亚的地方主义也有所差别。为保持理解的准确性，除非文中特别说明，一律使用地方主义来特指中亚各国以地方单元为主体的亲缘、族群或文化共同体建设，旨在向中央争取更多的权力与利益。

① Ibid, p.325.

② Yury Fedorov, “Uzbekistan: Clans, Succession and Stability”, *Security Index*, 2012, Vol.18, No.2, pp.43-44.

③ Lawrence P. Markowitz, “Local Elites, prokurators and extraction in Rural Uzbek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7, No.1, pp.2-3.

④ Jennifer Murtazashvili, “Coloured by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tocratic stability in Uzbekistan”, *Democratization*, 2012, Vol.19, No.1, p.79.

⑤ Ibid, *Democratization*, p.88.

克斯坦政府逐渐给予地方组织，特别是给予“马哈拉”更多的行政权力。<sup>①</sup>“马哈拉”出自古阿拉伯语，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基层自治组织。1995年宪法第105条规定马哈拉为地方自治机关，地方主席（会长）及其副手由选举产生，通过制度吸纳，将马哈拉正式纳入到国家政治机构中。随后，1999年颁布《市民自治组织法》，明确了马哈拉等自治组织的社会地位、组织结构和主要职能，明确马哈拉等组织对政府的监督职能。<sup>②</sup>马哈拉有权决定辖区内贫困家庭和儿童的福利再分配，并在政府支持下调解民事纠纷，预防社会冲突，任命“安全员”充当社会安全阀；同时帮助政府当局执行法律，推动民族和谐。<sup>③</sup>这些马哈拉巩固了政府在基层的力量。将社会自治组织纳入国家管理范畴之中，是卡里莫夫进行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现代政治动员，推动国家仪式、象征和符号的建构。大量马哈拉组织的存在，维系了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政治的稳定，联系着最高层与基层之间的有机关系，减少了社会抗争与“民主”动荡的可能性。

此外，卡里莫夫还很好地整合了苏联时代发展起来的群团组织——青年组织卡莫罗特（Kamolot）和妇女委员会。这些非政府组织替代政府成为在社会中塑造强力国家的组织机器。其中，卡莫罗特是乌兹别克斯坦最大的组织，拥有1300万青年，其组织目标是培养新一代的青年干部，预防地区和亲族等离心型认同的形成。<sup>④</sup>作为志愿者组织，该组织广泛渗入学校、企业和政府部门，通过其全国性的影响，执行国家价值观，监督和处理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的势力。另外，卡莫罗特和妇女委员会两大组织常被授权参与各项由政府发起的现代政治运动：充当与国际社会联系的纽带，广泛宣传乌国家价值观，并倡导在健康、环保以及卫生公益领域的政治实践。

---

① Deniz Kandiyoti, “Post-Soviet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Paradoxes of the ‘Uzbek Path’”,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7, Vol.26, No.1, pp.31-48.

② 马哈拉有效实施社会安全职能，可监督可疑的穆斯林分子。王明昌：“乌兹别克民族传统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2页。

③ Deniz Kandiyoti, “Post-Soviet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Paradoxes of the ‘Uzbek Path’”, p.36.

④ D. Ziyaeva, “Changing Identities among Uzbek Youth: Transition from Regional to Socio-economic Ident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Conference, Seattle, June 2006.转引自 Mohd Aslam Bhat, “(Re)experiencing the Now-Gone: Youth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Soviet and Post-Soviet Central Asia”, *Asian Affairs*, 2014, Vol. 45, No.3, p.474.

除了将传统政治组织纳入到国家正式制度以外，庇护主义体系的制度替代，是乌兹别克斯坦渐进性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卡里莫夫利用传统的庇护主义体系构建了以其为核心的领袖集团。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与训练、通过竞争性考试进入体制的技术官僚，更感激卡里莫夫政府提供的机会和晋升机制。这些精英看重对国家忠诚所带来的资源和机遇，更容易将原有对地区和部族的认同转变为对总统的效忠。在强调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优先性的意识形态指引下，卡里莫夫政府的合法性得以牢固确立，地域集团的权力正当性逐渐失去了生存的观念土壤。卡里莫夫在谈到“地方主义和家族关系”如何构成对乌兹别克斯坦稳定的威胁时表示，“一个人首先应感到自己是乌兹别克斯坦公民，而后他才是花刺子模人、撒马尔罕人或费尔干纳谷地的人……过于膨胀的地方性爱国主义、它的野心勃勃的进攻性，阻碍民族的团结，不可避免地导致内部的分立主义和文化的孤立，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造成一系列威胁”。<sup>①</sup>卡里莫夫将地方主义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对立面，视为苏联时代的负面政治遗产，严重阻碍现代国家的发展。

通过对地方主义观念的批判，卡里莫夫提升了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值得指出的是，对地方主义的打击并不影响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庇护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庇护关系从地方特色的中层政治，拓展到领袖政治和官僚政治。当国家与基层建立起制度化的直接沟通管道，处于中层的精英集团就自觉受到上下两个方向的监督。这导致乌兹别克斯坦的地方离心化力量大为下降，难以有效地凝聚整合起来。最后，卡里莫夫通过加强国家安全局和内务部等强力部门进行纵向监督，并且推动机构改革和强化监察机关，削弱了地方主义力量，进而成为地方力量的强力仲裁者，从而减少地方主义对现代国家发展的阻力。

卡里莫夫纯熟地使用国家机器，将现代政治的诸多要素，如官僚政治、社会组织以及意识形态霸权，用来构建现代中心化国家。通过创设新的制度和制度替代及互融，逐渐实现现代国家机器的强效运转。卡里莫夫对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运用，证明了现代政治技术对中亚政治转型的吸引力。领袖对

---

<sup>①</sup>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拉姆·卡里莫夫著：《临近 21 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安全的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王英杰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年，第 79-80 页。

权力政治的掌控和政治现代化建设，推动了中亚的政治演进，而传统的权力网络也被自然地拉入到现代政治体系之中。

中亚的现代政治转型并不都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实现的。土库曼斯坦的政治现代化就是很好的证明。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族群土库曼人遍布全国，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 83%。<sup>①</sup>而第二大和第三大族群——乌兹别克族人和俄罗斯族人，仅占土库曼斯坦人口的很小部分，且分布较为集中。作为游牧民族，土库曼斯坦传统社会一直有家庭和部族（大家庭）意识。土库曼各部落的地域分布较为集中，部落之间人口相差较大，其中最大的两个部落是特克部和约穆德部，两个部落都有很多分支。土库曼斯坦精英的产生，也基于这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落。

土库曼斯坦在苏联时代就加速了政治现代化。在苏联时期的民族识别和地区共和国初步创立以后，中央在土库曼实施“部落政策”（tribal policy），即将游牧民族政治传统纳入到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来。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很早就意识到土库曼游牧民族存在“部落争斗”的风险，更担忧这种风险会扩散到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因此，在官员选拔上，正如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副局长卡尔克林（Отто Карклин）所说，要使用不偏不倚的政策，即，如果要任用这个部落的官员，那么另外一个部族的成员也要有一人担任同样的职务。<sup>②</sup>这样的部落政策尽管充满理想主义，却缓解了长久困扰土库曼部落之间的部落矛盾，将“血统和亲缘”关系逐步转化为更为现代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国家。

土库曼部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伴随着土库曼的经济和制度现代化迅速开展。1926 年，土库曼加盟共和国农业集体化开始，棉花种植被引入并大规模推广。到 1940 年，土库曼加盟共和国 90% 的地区建成集体农庄，土库曼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最大的棉花种植基地。集体农庄的建成密切了游牧各部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游牧族群向现代民族转化的进程。<sup>③</sup>在苏联时期，土

---

① 吴宏伟、肖飞：“土库曼人传统社会结构探析”，第 37 页。

② Adrienne L. Edgar, “Genealogy, Class and ‘Tribal Policy’ in Soviet Turkmenistan, 1924-1934”, *Slavic Review*, 2001, Vol.60, No.2, p.266.

③ INS Resource Information Centre, “Turkmenistan: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Post-Soviet Era”, February 1993, pp.5-7, <http://hrlibrary.umn.edu/ins/turkme94.pdf>

库曼游牧民族首次获得了确定的领地、标准的语言、集中且制度化层次较高的官僚机构以及国家强力机关，这也刺激了土库曼部族民族意识的发展。正是在苏联时代，土库曼部落从游牧民族迅速向现代国家民族跨越。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土库曼族人为主体的民族的国家话语和制度构建初步完成，各部落开始逐步塑造“统一的祖先”和辉煌的共同历史，认同土库曼族人的联合是理所当然的结果。<sup>①</sup>现代土库曼部族精英也随着苏联的现代国家建设成长起来，成为土库曼新一代政治精英。

20 世纪 30 年代推行的“部落政策”培养了土库曼部族精英的国家意识，在没有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的前提下，通过“平等”的手段培养部落之间的友谊和情感，结果必然是“国家式的成功，社会式的失败”。<sup>②</sup>土库曼精英培植起对苏共中央的忠诚和服从，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莫斯科的庇护关系处理古老的部落矛盾，导致每一次共和国领导人的更换，整个行政机关几乎都要换掉，政权沦为部落之间竞争的战利品。<sup>③</sup>这种部族政治在苏联晚期发生变化。时任土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尼亚佐夫，成功地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压制反对派，建立起了个人的领袖地位。<sup>④</sup>尼亚佐夫很早就强调，在“部落政治”尚未从国家赶走的前提下，推动任何急速的政治变革都是冒险，都会带来部落之间无穷的冲突、内战以及无政府状态。<sup>⑤</sup>尼亚佐夫在苏联尚未解体就已经建立起对其个人忠诚的政治结构，极力消解地方和各州政治精英之间的非权力网络，推动总统庇护制的“全国性”特质。<sup>⑥</sup>

在当前中亚诸国中，土库曼斯坦政治最接近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的苏联

---

① Adrienne Lynn Edgar, *Tribal Nation: The Making of Soviet Turkmeni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9-11.

② Drienne L. Edgar, “Genealogy, Class and ‘Tribal Policy’ in Soviet Turkmenistan, 1924-1934”, pp.267-268.

③ 吴宏伟、肖飞：“土库曼人传统社会结构探析”，第 42 页。

④ 具体参见 Karen Dawisha, Bruce Parrott edited,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17-319.

⑤ Saparmurat Turkmenbashi, *Address to the Peoples of Turkmenistan*, Ashgabat: Alhoda Publications, 1994, pp. 34-36, 39.

⑥ Sabonis-Helf, “The rise of the post-Soviet petro-states: energy exports and domestic governance in Turkmenistan and Kazakhstan”, in Daniel L. Burghart, Theresa Sabonis-Helf edited., *In the tracks of Tamerlane: Central Asia's path to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2004, p.162.

时代：立国者尼亚佐夫是土库曼斯坦之父（Turkmenbashi）；土民主党由土库曼斯坦共产党直接转变而来；土库曼斯坦依旧保留着苏联时代的福利制度，延续着苏联时代政府对石化工业的干预体制。<sup>①</sup>尼亚佐夫在任期间建立的威权政府，吸引外资开发本国丰富的油气资源，对外坚持中立原则，制定能源出口多元化政策。<sup>②</sup>2006年尼亚佐夫去世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imuhamedow）继任。两任总统都来自土库曼斯坦的特克部（特克人占据国家职务的3/4以上），并获得了特克部的极力支持。对于土库曼其他部落精英而言，这是特克部落的胜利。

和前任相比，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继续推动现代中心化国家的建设。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上台之后，宣布将各部委建设工程和公务员的人事管理，直接纳入总统办公厅的管辖范围，并组建了基于总统个人的超级内阁制度，以实施全国经济发展规划。<sup>③</sup>他多次推动修宪，取消总统年龄限制并延长总统任期至7年，同时取消人民委员会，将其权力划归总统和议会。这些强总统制的制度安排，不仅强化了基于总统个人的庇护政治，同时也不断冲击基于部落层级的恩庇关系。另外，他逐渐下放地方权力，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给其他部落更多的成长空间。特克部的主导地位，随着经济开放和地方精英的自由选拔而遭到削弱。这导致稳定的“部落政治”权力网络，被强调能力的地方精英以及强调与总统恩庇关系的高层官僚所削弱。在总统权威的强力冲击下，“部落政治”的权力网络日益转变为支持现代中心化国家的构建。这种强力总统制下的政治技术，推动着现代国家的形成，更带来社会的稳定。土库曼斯坦总统在构建国家民族方面也不遗余力，与中亚四国一样，对民族历史进行重新书写，支持伊斯兰复兴运动，逐步推动“去俄罗斯化”进程。<sup>④</sup>随着土库曼石油资源的开发，土库曼权威体制合

---

① Sabonis-Helf, “The rise of the post-Soviet petro-states: energy exports and domestic governance in Turkmenistan and Kazakhstan”, p.165.

② 王四海、秦屹：“中亚国家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重要作用——以土库曼斯坦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8-118页；赵龙庚：“土库曼斯坦：改革开放走新路”，《和平与发展》，2008年第2期，第60-61页。

③ Nicholas Kunysz, “From sultanism to neopatrimonialism? Regionalism within Turkmenistan”, *Central Asian Survey*, 2012, Vol.31, No.1, p.12.

④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3, 122-123, 133-134页。

法性得到更大的保证，新庇护主义权力网络演变为制度中性的中心化国家，而没有演化为部落争端和直接对抗。

通过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现代政治进程的分析可以发现，非制度化庇护主义网络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存在，但被有效地转变为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两国的总统顺利地將庇护主义政治，发展成为现代政治中的权力游戏。在强总统制度建成后，中亚的稳定秩序通过总统与基层的垂直联系有效运转。乌兹别克斯坦通过现代政治技术推动社会组织向政权靠拢，而土库曼斯坦则建设以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政治工程。中亚政治的多元现代性，加速了前现代的庇护主义体系退出历史舞台。中亚政权逐渐与国家、民族交融一体，其政治合法性得以重塑，有力地推动了中亚现代中心化国家的形成。

#### 四、民主化与中亚政治：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演进

中亚的前现代政治传统并未随着政治现代化逐渐消失，而是转变为新的形式继续影响国家政治。从哈萨克斯坦部族政治、乌兹别克斯坦地方主义再到土库曼斯坦部落政治，中亚国家在现代中心化国家构建上，并没有摆脱庇护政治的影响，反而主动通过新制度构建和制度替代，将其发展成为巩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积极因素。

这种政治传统逐步适应了苏联时代的地方政治结构，在苏联解体之后又随着政治转型发挥出新的作用。但部族政治也存在缺陷。部族政治与现代国家治理结构——法治、负责任政府相矛盾，如果处理不善，则会延缓政治的现代化。强大的部族政治依靠制度资源攫取社会财富，导致中亚国家腐败盛行。在中央权力弱势的情况下，部族政治还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精英分裂，甚至酿成国家动荡。这种情况除了在塔吉克斯坦表现得相当典型之外，在实行激进政治改革的吉尔吉斯斯坦也十分显著。

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演进，代表了一种相当罕见的民主化类型，即“民主政权难以巩固，重新回到威权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民主的崩溃”。研究民主崩溃的动力学可以发现，选民的政治分裂和民主国家能力的弱势，是

民主崩溃的重要原因。<sup>①</sup>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初就以急速民主转型著称于世，被誉为中亚的“民主之岛”。<sup>②</sup>这种虚幻的假象很快破灭，民主政治并没有推动国家能力的提升，反而加速了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的执政危机。1993年，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与议会之间因权力分配问题发生矛盾，双方在总统权力是否应该得到加强的问题上争执不下。很快，政府确定了新的制度框架：在1994年底初步形成“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确定了总统、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1996年举行的全民公投增加了总统的权限，总统在征得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任命政府总理，改变了1994年确定的“三权分立框架”，阿卡耶夫执掌大权。阿卡耶夫将民主制度建设的激情，转变为寻求威权模式，以确保政权的生存。1998年，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大改组，深孚众望的朱马古洛夫（Apas Jumagulov）辞职，取而代之的是阿卡耶夫的得意门生朱马里耶夫（Kubanychbek Jumaliyev）；其他忠于阿卡耶夫的亲信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阿卡耶夫的总统集权地位，更为巩固。

在1998年举行的全民公投中，阿卡耶夫倡导的修宪计划在96.4%投票率的全民公决中，获得95.4%的支持率。<sup>③</sup>不过，在获得巨大声望的同时，阿卡耶夫也面临着强大的民意压力。在民主化稳步推进的过程中，如果克里斯玛型领袖难以满足民众的期望，总统集权与民意膨胀的诉求之间会形成张力，危机事件会加剧这一矛盾。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经济危机，使原本脆弱的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雪上加霜。脆弱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涌现出的经济问题，更容易酝酿民众的不满情绪。随着议会反对派的兴起，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引发民众骚动，不断挑战着阿卡耶夫政权。正如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言，在民主转型中，经济改革的启动并不总是带来经济发展，也可能造成经济衰退和萧条。一些群体宁愿采取“长

---

①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选民分裂、政治制度与民主崩溃”，《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5期，第170-171页。

② Cummings Sally edited, *Power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80-81.

③ [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98\\_Kyrgyz\\_constitutional\\_referendum](https://en.wikipedia.org/wiki/1998_Kyrgyz_constitutional_referendum)（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8月20日）。

痛不如短痛”的策略，来结束漫长而前途不明的经济转型。<sup>①</sup>经济情势的恶化，让这个原本贫穷的国家经济改革更为艰难。阿卡耶夫寄希望用集权和十年来累积起来的政治合法性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努力也增强了其个人推动民主制向强总统制威权政治回归的动力。

与中亚其他四国不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方主义政治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以费尔干纳大断裂为界，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是农牧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低。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接近，使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深受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伊斯兰文化影响较深。<sup>②</sup>而中北部则是主要的工业分布区，与南部的情况差异巨大。这种由地理区隔和经济生产方式不同形成的部族政治传统，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单元成型之后，发展成独特的地方主义政治。在苏联时代，部族政治被保留并顺利融入制度框架和人事任命中。苏联解体后，吉南部的乌兹别克人成为跨境民族，乌兹别克人担心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会影响其生存。1990年，在乌兹根（Uzgen）和奥什（Osh）爆发了族群骚乱，当地乌兹别克人希望实现区域自治，并将乌兹别克语确定为官方语言。南方部族联盟也希望进行权力变革，实行地方自治，以保住南方部族仅剩的权力网络体系。<sup>③</sup>甚至有南部精英提出要建立联邦制国家，实现南北地区在联邦制框架下自治。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域集团的国家认同，随着南部乌兹别克人移民潮的到来而越来越薄弱。

在沙皇时代和苏联时代就一直存在的族群政治结构，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传统，并没有随着吉尔吉斯斯坦的独立而削弱。阿卡耶夫上台之后匆忙地推动民主化改革，实际上错过了央地关系重构的机会窗口。作为政治素人，阿卡耶夫崇尚自由主义，甚至一开始就做好了民主化的准备。这与当时

---

①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67-171.

② 雷琳、郎正文：“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5页；雷琳、王林兵：“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动态移民潮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89-90页。

③ Eugene Huskey, “Kyrgyzstan: The Politics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Frustration”,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ew States and New Politics: Building the Post-Soviet Nations*, 19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64-667.

中亚新独立初期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势力格格不入。<sup>①</sup>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阿卡耶夫难以用行政纪律约束各地区的分立主义，甚至中央要面临着地区和地方权威的抵制。在第一任期结束时，阿卡耶夫并没有获得地方州长的普遍支持，吉尔吉斯斯坦民主化转型又进一步削弱了政权的执行力。为解决权力弱势问题，阿卡耶夫求助于全民公投。在其执政期间，阿卡耶夫一共发起了四次全民公投，极大地提升了个人影响力。<sup>②</sup>全民公投增强了阿卡耶夫的政治自信，他拒绝与反对派妥协和谈判，甚至将地区主义视为可通过制度设计消除的问题。但问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所倚靠的，不是资本就是地方部族，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更难以获得全社会支持。中央政权的刚性统治与地区力量的柔性对抗，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的主要特征。

强硬的阿卡耶夫总统无法在经济改革上打开局面，而南北族群对抗却日益公开化和激进化。2000 年的议会选举，吉尔吉斯斯坦南部情势更加恶化，由选战引起的政治对立激化为族群对抗。在这样的局面下，就连反对派都认为阿卡耶夫的上台至少能代表吉尔吉斯人的利益，即，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一些支持者甚至鼓励阿卡耶夫走向强人政治以更好地保存实力，同时反对其继续进行民主改革。<sup>③</sup>但这种立场并未得到多数人的支持，破败的经济情势与激化的南北矛盾，酝酿着巨大的社会不满情绪。民主化的政治又推动了这一情绪的释放。在 2005 年的议会选举中，一些观察家批评存在舞弊行为。3 月 24 日，吉尔吉斯斯坦最高法院宣布选举无效。约 7000 名示威者走上比什凯克街头，冲击政府大楼，要求阿卡耶夫辞职。在数小时之内，形势急转直下，街头抗争催生新的临时政府。

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击垮了阿卡耶夫政府，但没有修复南北矛盾。阿卡耶夫时代所创制的不稳定政权带来巨大的破坏力。其建立的民主体制并不能实质上促成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现代化，反而因为中央权力弱

---

① Mariya Omelicheva, *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and Alternative Strategies*, p.79.

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tegory:Referendums\\_in\\_Kyrgyzst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tegory:Referendums_in_Kyrgyzstan) (最后访问时间: 2019 年 8 月 20 日)

③ Cummings Sally edited, *Power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pp.87-88.

势，加剧了南北分裂。以民主化转型开始，却被颜色革命所结束，阿卡耶夫执政的 15 年是中亚政治现代化的负面案例。这股民主化力量试图从外部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的制度框架，并按照这一框架逐步削弱吉尔吉斯斯坦长久以来形成的地方主义和族群矛盾。但问题在于，这些地区力量和部族传统并没有被及时规训，反而紧随民主化酝酿危机。一些地区的民众仍无视正式规则与制度，宁愿使用传统方式解决利益纠纷。<sup>①</sup>在缺乏强大中央力量和选民高度分裂的背景下，依靠克里斯马型权威迅速推动的民主化，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现代化的“毒药”。

在颜色革命之后，南方出身的巴基耶夫担任代总统，企图恢复苏联时期的部族权力平衡。然而，2010 年吉尔吉斯斯坦却再度发生政变，推翻了总统制，吉尔吉斯斯坦改换成了议会制政体。同时，南部奥什地区骚乱导致近 8 万乌兹别克族人返回乌兹别克斯坦，加剧了南部地区的族群矛盾。南部地区吉乌两族的族群仇恨，不仅促进了极端伊斯兰势力在吉南部的传播，更加剧了吉社会对乌兹别克族的仇视及乌兹别克族的疏离感。伴随着南部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以及巴特肯州居高不下的贫困率和失业率，宗教极端主义和族群矛盾更为突出。

随着 2010 年的政体改革，吉尔吉斯斯坦以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了实行议会制的宪法。议会制的出现否定了强力总统制的可能性，试图将政治矛盾和冲突纳入到体制内进行解决。议会制对多党制的支持以及“非零和博弈”的强调，使得政权的合法性逐渐归于一元，从而避免因族群或地方部族力量相互争夺最高权力而带来的合法性困境。<sup>②</sup>2011 年阿坦巴耶夫担任总统后，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秩序也渐趋稳定。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首次完成权力和平交接，社会民主党主席热恩别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继任总统。但吉尔吉斯斯坦早期民主化带来的社会与地区的撕裂，已经渗透到吉政治发展之中。议会制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如果不能吸收阿卡耶夫执政的教训，恐怕难免再度陷入弱势政府的困境。弱势政府难以构建现代中心化国家，这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现代化面临的一大障碍；日益严重的南北分裂问题，

---

① Shairbek Juraev, “Kyrgyz democracy? The Tulip Revolution and Beyond”,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8, Vol.28, No.3-4, p.260.

② 包毅：“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危机”，第 94-95 页。

更难以解决。随着 2020 年的临近，在议会制道路上磕磕碰碰的吉尔吉斯斯坦是否会就中央权力分散的问题修宪，还是会像其他中亚邻居一样，推行强力总统制以构建中心化现代国家，人们将拭目以待。<sup>①</sup>

## 五、结语

中亚的政治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场域：复杂的权力网络、多元的政治现代性以及民主实践的多样性，成为中亚政治演变令人着迷的地方。但也可以看出，中亚政治分析的理论文献，往往陷入地区和国别研究的细节讨论之中，而难以提炼出中观乃至宏观的理论模型。西方文献对中亚研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傲慢，这种偏见将中亚政治区分为制度/非制度两个维度，通过其对立来研究中亚政治的转型。这种通过两分法来研究整体的还原主义视角，不仅难以客观理解中亚政治，甚至还制造了新的理论难题，即如何看待制度与非制度之间的界限与张力、两者如何互动。

与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不同，中亚国家独立后政治演进近 30 年，难以像西方一样磨砺出精巧细密的政治理性。在中亚社会，可以看到庇护主义和部族政治、部落传统广泛存在，甚至渗透于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的多个层面。而现代国家本身才是晚近的产物，对于中亚社会和政治精英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政治技术。因此，作为西方理解中亚政治的新庇护主义概念系统，应该有更为明确的界定，而不应直接用于解释中亚政治的复杂性。本文通过对中亚五国政治发展中的庇护主义权力网络以及部族政治等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分析，可以看出非制度庇护网络是中性存在的政治现实，不是“前现代政治”的标签。中亚政治的现代化，不是单一线性的民主变革，而是基于多元现代性的现代中心化国家构建与治理。一些中亚国家已经在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上稳健前行，同时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稳定繁荣。

中亚政治的现代性特征即是将制度构建与传统政治紧密联系，通过现代政治技术吸纳政治精英，发展国家象征符号，构建现代国家意识形态，重塑

---

<sup>①</sup> 2011 年，吉尔吉斯斯坦过渡时期总统奥通巴耶娃（Roza Otunbayeva）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为了防止频繁修改宪法造成政治动荡，2020 年 9 月 1 日之前不得对宪法进行修改。

合法性。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构建中心化国家的道路上稳步迈进，通过制度构建和制度替代，将非制度化权力网络更好地用于现代国家的政治进程中，进一步推动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而土库曼斯坦在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上面临较多的庇护政治的困扰，但却也在强力总统制度的安排下逐渐消解其存在的权力根基，现代国家建设进一步推进。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仍需克服非正式制度对现代中心化国家构建的阻力，推动制度互融，提升国家能力。

也需看到，权力网络和庇护政治的存在，对中亚政治现代化的负面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在庇护政治与现代国家构建完全结合时，腐败和权力寻租则无处不在。波齐（Gianfranco Poggi）分析了其中一个侧面，认为“国家活动范围的高度扩张”，使得社会成为一个单一的组织，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力量。<sup>①</sup>中亚政治现代性所需要避免的，就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全面扩张，这种全能国家将政治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而抹杀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和区别。<sup>②</sup>随着现代中心化国家构建的逐步完成，中亚传统权力网络走向政治前台，成为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毛细血管。在这样的毛细血管的影响下，其更容易出现权力网络中利益斗争政治化的倾向，而政治冲突也会随着现代国家政治构建的完成而不断涌现，甚至酝酿政治危机。从反事实的角度推理，在没有政治强人领导的情况下，中亚政治现代化及以此构建的现代中心化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会更多。另外，我们仍需正视中亚政治现代化的不确定性。宗教极端势力、恐怖主义及族群冲突，可能会对一些脆弱的中亚政权产生极大的负面冲击，甚至可能会引起示范效应和连锁反应，影响中亚政治的整体稳定。当然，这种超越时空的政治想象将成为中亚政治研究的新议程。将庇护政治和权力网络等非制度政治“去污名化”，是当前研究中亚政治转型的关键课题，也是理解中亚政治现代进程的题中应有之意。

---

① 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86.

② Renato Cristi, *Carl Schmitt and Authoritarian Liberalism*, Wales: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6, pp.184-186.

---

**【Abstract】** Since its independence, Central Asia has faced an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country. Western mainstream scholars have created the core conceptual system and propositions of Central Asian studies, emphasizing the dichotomy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of political analysis in Central Asia, exagge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ven taking the new asylum model as the core content in explaining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in Central Asia, ignoring achievements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constantly inventing and establishing new institutions, and integrating the power network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to formal institutions, it has become the core content of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 in Central Asia. Som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formed a unique centralized national development model, reducing negative effects of localism, ethnic contradictions and tribal politic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untries. Meanwhile, local political elites are absorbed to enhance national capabilities, symbolic symbols are developed to build consensus, and the national ideology is built to reconstruct the legitimacy. At present, Central Asian politics has broken through the dual logic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shaping modern Central Asian politics.

**【Key Words】** Central Asian Politics, Central Asian Informal Institutions, Central Asian Centralized Countries, Power Network in Central Asia

**【Аннотация】**С обретением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еред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ей встала важная задача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сновные западные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создали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сист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дчеркивая дихотомию между формальными и неформальны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анализ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ни преувеличивают важность неформа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и даже используют модель нео-клиентелизм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ъясн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днако это упускает основ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достижений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в

системн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основ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полит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о и ключом к её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Постоянное изобретение и создание нов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интеграция неформальной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й сети власти в формальную систему стало основ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которые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и уникальную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ую модел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уменьшили негатив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локальности, этнически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и плем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для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стран, 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ни привлекли мест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для укрепл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и развития символического консенсуса, а также созд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для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легитимн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полити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реодолела формальную/неформальную бинарную логик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и формирует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политик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литик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неформальные институт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еть власт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责任编辑 崔 珩)

##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 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石靖\*\*

**【内容提要】**高加索地区历来以民族众多、分布复杂著称，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影响该地区乃至周边区域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高加索地区特殊的自然、人文地理特点是该地区民族多样交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发生在这里的历史往往带有鲜明的区域特征。“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基于该地区极为复杂的民族分布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与近代以来两次特殊的“窗口期”背景直接相关。不论是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出现的该组织的早期雏形，还是苏联末期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其“继承”组织，都代表了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团结并谋求以共同体模式发展的尝试。但从主权国家的视角出发，此种带有“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特点的实践，是对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高加索的民族复杂性会因其他客观条件成熟而再次对地区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 高加索地区民族冲突与分离问题 高加索地区安全 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

**【中图分类号】**D815**【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5-0141(28)

\*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俄文译作 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英文名称为 Confederation of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后改为 Confederation of the Peoples of the Caucasus，国内有文献译作“高加索山地民族联合会”、“高加索邦联”等。confederation 有邦联、联盟的含义，而“邦联”具有的特定政治学含义与当时高加索山地民族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并且考虑到该组织在苏联解体前后数次易名，因而本文将其称作“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

\*\* 石靖，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

20世纪80年代末期，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倡导推行以“公开性”、“民主化”为代表的改革措施，在全苏范围内引发了从政权内部到整个社会的动荡。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治改革，触碰到了隐藏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内部的民族问题，因民族主义情绪暴涨而引发的主权争夺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主义首先在波罗的海沿岸和高加索地区迅速兴起，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人民阵线运动。其诉求是脱离苏联，实现民族独立。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发起并推动分离运动的力量，并非仅来源于原加盟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在当时混乱的背景下，还有一些微小民族也希望脱离苏联，实现民族自治的目标。本文讨论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就是特定历史时期内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波澜中微小民族抱团谋求政治、军事目标的案例，其出现、存在以及实践，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以及独特的研究价值。

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便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路，地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多样的民族构成。历史上，这一地区经历了不计其数的争夺战争以及不同王朝的统治，加剧了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苏联局势的变化，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逐渐抬头，以民族独立为诉求的社会运动严重破坏了地区的稳定，并影响到整个苏联国家机器的运转。其中，亚美尼亚族和阿塞拜疆族裔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激化，发生了多起针对异族的暴力事件，南高加索地区在苏联时期形成的民族混居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同一时期，位于高加索山脉两侧的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和格鲁吉亚，也在国家过渡阶段受到民族分离问题的挑战。由此可见，基于复杂民族构成产生的分离问题，在苏联解体前后的高加索地区极为突出。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地区微小民族聚合力量，活动和影响范围超越了高加索山脉的自然阻隔，其分离诉求和实践对同时期相关地区行为体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山地民族联盟”这一案例出发，探讨其出现的原因、背景以及影响，是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具体而言，高加索山地复杂的民族构成特点，为该组织的形成和生存提供了“温床”，而特殊的历史背景则是其实践的“窗口期”。同一时期，夹杂在整个原苏联范围内加盟共和国独立浪潮中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在高加索地区进

行带有统合微小民族目标的分离实践，使这一组织成为困扰若干新独立国家的因素，其后续活动及影响，是后苏联时代初期高加索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 一、“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发展轨迹及其历史渊源

从苏联解体前后特殊的时代背景出发，“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作为联合地区微小民族的区域力量逐渐发展壮大，是一种特殊时代的产物。然而与此同时，该类型的组织与地域、人文环境息息相关，地区民族复杂性承载的历史渊源以及该组织的继承性特点，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内容。鉴于民族的多样性是“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形成发展以及后续实践活动的重要内生因素，因此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从民族分布的视角，对该组织所处的区域性环境进行梳理。

### （一）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概况

高加索地区位于欧、亚两大洲的连接处，横亘在这里的大高加索山脉是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它将这一区域划分为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和南高加索（South Caucasus/也称“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两个部分。在高加索广阔的山地、高原、坡地等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分布着众多不同的民族。可以说，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形态，是本地区民族极度多样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记载，罗马人在高加索地区开展贸易，需要80个掌握不同当地语言的翻译；而阿拉伯人更是将高加索称为语言之山，夸张又形象地描绘出这一地区民族和语言的多样。根据所使用语言的区别，目前在整个高加索地区生活着超过50个不同的民族。<sup>①</sup>

前人通过种类繁多的语言来认识高加索，不失为一种直观呈现其多样性的路径。通过语言划分认识和区分当地相当数量的民族，会发现高加索地区

---

<sup>①</sup> “Caucasian people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aucasian-peoples>

使用的语言至少隶属于4个语系<sup>①</sup>，分别是：卡特维尔人（Kartvelians，即格鲁吉亚人）<sup>②</sup>、东北部高加索民族以及西北部高加索民族使用的高加索语系语言<sup>③</sup>；亚美尼亚人、希腊族裔、伊朗族裔和斯拉夫人使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阿拉伯人、亚述人以及犹太人使用的亚非语系（Afro-Asiatic Languages）语言；以及阿塞拜疆人、巴尔卡尔人、卡拉恰伊人、库梅克人和诺盖人等民族群体使用的突厥语隶属阿尔泰语系。由此可见，不同语系的多种语言在高加索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使用，且这样的民族文化特点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反映出高加索地区民族历史和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高加索地区语言分布的复杂特点，也是当地民族多样性的体现，而不同民族在该地区的分布变化，也造就了独特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在数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高加索地区不同族裔对自身文化的世代传承，以及区域内外与民族因素相关事件带来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极为多样和复杂的民族地理分布。基于对高加索（特别是北高加索山地）历史传统的研究，可以发现，人们对于朋友、家族、村庄等具有亲近感对象的认同和忠诚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强于单纯语言文化建立的联系。北高加索特有的山民传统习俗，甚至能够聚合语言、文化、习惯不同的民族。<sup>④</sup>但与此同时，高加索山脉以南地区与北部的山地文化存在区别，即认同在更大程度上是以共同语言等文化因素

---

① 本文阐述高加索地区种类丰富的语言，目的是展现这一地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文中关于高加索地区语言划分的总结基于既有文献，但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具体的语言种类划分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② Kartvelians 来自格鲁吉亚语，即格鲁吉亚人对自己的称呼，格语为ქ ა რთვე ლე ბ ი ო，使用格鲁吉亚语（ქ ა რთული，Kartuli），属高加索语系的一支。

③ 目前隶属于高加索语系的语言主要依照地域因素进行划分，具体包括南高加索地区、东北高加索地区以及西北高加索地区使用的语言。有文献将高加索语系内部语言根据地域差别进一步划分为“语族”（可参见熊坤新：《苏联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但是相关提法在语言学范畴内仍存在争议。本文这一部分主要呈现依照地域对高加索语系的划分，并未涉及语言学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更多内容。

④ 参见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гор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в XIX веке/ Ш.М. Казиев, И.В. Карпеев. М. :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3. С.370-373. 俄语词“куначество”，指代（高加索地区）来自不同部落、民族的二人之间相互礼遇、维护友谊的古老习俗。“кунак”表示“亲友、友人、盟友”，是高加索山民用语。如此在民族学范畴内的概念，证实在北高加索地区存在维系不同族际联系的特别传统习俗。

来维系的。山地地区作为群体聚合的特殊地理因素，其作用不再明显。另外，虽然有关高加索身份和文化认同存在多种观点，但不同民族对高加索地域的认同却是真实存在的。<sup>①</sup>特别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基于自然地理空间称此地居民为“山民”、“高加索山民”以及“高加索人”，便足够清楚体现出地域身份认同。<sup>②</sup>

表1 高加索地区民族与所使用语言的语系归属

语系	进一步划分	语言及使用民族	
高加索语系	南高加索/卡特维尔(Kartvelian)语族	Georgian-Zan/Karto-Zan: Georgian(Georgians/Kartvelians), Zan (Mingrelians, Lazi) ; Svan (Svans)	
	东北高加索/那赫-达吉斯坦(Nakh-Daghestanian)语族	Avar-Andic languages	Akhvaks, Andis, Avars, Bagvalals, Botlikh people, Chamalals, Godoberi, Karata people, Tindi
		Lezgian languages	Aghuls, Archi people, Budukhs, Kryts, Lezgins, Rutuls, Tabasarans, Tsakhurs, Udis
		Tsezic languages	Bezhta people, Hinukh people, Hunzibs, Khwarshi people, Tsez people
		Nakh languages	Bats language: Bats people; Vainakh languages: Chechens, Ingush;
西北高加索/阿布哈兹-阿迪格(切尔克斯)(Abkhazo-Adyghean, Circassian)语族	Abkhaz-Abaza languages: Abkhazians, Abazinians; Circassian languages (West: Adyghe; East: Kabardian): Circassians/Адыгэ(Adyghe, Cherkess, Kabardians, Shapsugs)		
印欧语系	印度-伊朗语族	Iranian languages: Gilaks, Kurds, Mazanderani people, Ossetians, Talysh, Tats, Yazidis	
	斯拉夫语族	Russians, Ukrainians	
	其它语族	Armenians, Greeks	
亚非语系	闪语族(Semitic languages)	Arabs, Assyrians	
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	Azerbaijanis, Balkars, Karachays, Kumyks, Meskhetian Turks, Nogais, Turkmens	
	蒙古语族	Kalmyks	

① Бурькина Л.В, Бузаров А.Ш. Проблемы культур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Рецензирована)// Вестник Адыге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1: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2010.

② Шеуджен Э.А.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Влать. 2014. No.11. С.36.

大致按照自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顺序来梳理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布<sup>①</sup>，可以发现，高加索地区北部低地主要是诺盖人（Nogais）的居住地域，较早之前东部的草原区域，分布有从中国新疆北部迁徙而来的卡尔梅克人（Kalmyks）。此外，这里还分布有迁居至北高加索地区的捷列克哥萨克人（Terek Cossacks）以及部分土库曼人。由草原地域向南到达高加索山脉北坡山地，在该区域西部主要分布着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sup>②</sup>，紧邻其聚集地以东的地区则被卡巴尔达人（Kabardians）占据，而事实上两者都是阿迪格人（Адыгэ/Адыгэ）的分支，在语言、文化等方面都极为相似。另外，在阿迪格民族不同分支分布区域继续向东南方向延伸，有三支居住在高山地区，他们分别是卡拉恰伊人（Karachays）、巴尔卡尔人（Balkars）以及奥塞梯人（Ossetians），这里基本上已经到达高加索的中部地区。纵向大致以格鲁吉亚军用道路（Georgian Military Road）为界，沿高加索山脉向东，就来到了印古什人（Ingush）和车臣人（Chechens）居住的区域。从达吉斯坦山区一直到里海西岸的高加索山脉北坡地区，分布着众多使用高加索语系语言的民族。而从纵向来看，从阿斯特拉罕沿里海西岸向南到捷列克河（Terek River），分别是信仰佛教的卡尔梅克人（Kalmyks）以及哥萨克人（Cossacks），他们使用的语言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存在较大区别。从捷列克河至杰尔宾特分布着使用突厥语的库梅克人（Kumyks），向南主要为阿塞拜疆人和使用伊朗语、主要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塔特人（Tats）。

高加索山脉南坡最西边的黑海沿岸分布着阿布哈兹人（Abkhazians），

---

① 该部分中的不同民族分布整理基于相关历史文献和网络百科资源，参见 Arthur Tsutsiev, *Atlas of the Ethno-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Caucasu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在沙俄时代，现在的切尔克斯人、阿迪格人和卡巴尔达人被视为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民族，他们是同属切尔克斯（阿迪格）族的不同部落分支，分布位于北高加索西部地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将其称之为 Черкесы/Čerkesy，译为切尔克斯人，英文称 Circassians，而本民族的语言称为“阿迪格人（Адыгэ）”。苏俄及苏联时期，当局通过行政地域划分将切尔克斯人的主要分支予以体现，相关地域涉及的行政单位包括：北高加索边疆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迪格自治州，卡拉恰伊-切尔克斯自治州，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州（后改为“自治共和国”）。以上行政区划在苏联时期有过多变化。从当代俄罗斯北高加索联邦主体的情况来看，苏联时期在行政区划的命名设置得到沿用。

他们与北部的山地民族相近<sup>①</sup>，但同时受到来自格鲁吉亚的影响。向东分别是属于格鲁吉亚人的山地分支斯凡人（Svans），以及由北部迁徙来的奥塞梯人（Ossetians）。在格鲁吉亚东部的高加索山区，同时分布着格鲁吉亚人的山地分支赫维人（Mokheves; Khevi region）、赫雷苏维季人（Khevsurians; Khevsureti region）以及特塞季人（Tushetians; Tusheti region），在高加索北坡与印古什以及车臣接壤。需要注意的是，在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民族地域分布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跨越地理空间的民族迁移现象。正因此，不同文化因素出现交织的情况，例如在格鲁吉亚东部与阿塞拜疆语言交界处，存在使用格鲁吉亚语但信奉伊斯兰教的因吉洛伊人（Ingiloyts）。高加索山脉南部的大部分低地区域被信仰基督教并拥有独特语言的格鲁吉亚人占据，东部靠近里海的部分为使用突厥语的什叶派穆斯林——阿塞拜疆人的活动地域。再向南以远，分布着拉兹人（Lazi）、土耳其人（Turks）、库尔德人（Kurds）以及亚美尼亚人等。<sup>②</sup>

## （二）“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形成及其发展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是高加索地区囊括不同民族的联合体，在苏联解体前后出现，并对该地区的政治以及安全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该组织一系列新的内部建构以及相对于主权国家带有明确分离性质的政治目标，并于同一时期参加了高加索地区的战争，因此也被视为带有军事化特点的政治组织。20世纪80年代后期，“联盟”最初宣称要统合高加索不同民族，在苏联内部成立高加索共和国。<sup>③</sup>在苏联解体后，其带有民族主义

---

① *The Caspian Region, Vol. II. The Caucasus*, Edited by Moshe Gammer.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4, p.65. 阿布哈兹人与同样生活在高加索地区的阿迪格人相近，他们在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联系。虽然在地理上有高加索山脉的阻隔，但与阿布哈兹人更为相近的阿巴扎人（Абза/Abazinians），生活在距离阿迪格更近的北高加索西部，因而增进了这些族裔间的联系。

②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部分按照大致由西向东，分高加索南北地区介绍不同的民族分布，但并不囊括全部民族。有些在文中出现的民族及其汉语译法可能存在一定偏差，故大多同时标注了英语称谓。

③ 1922年苏联成立时，根据《苏联成立条约》，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1936年，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取代了之前的

性质的活动，发展成为对格鲁吉亚及俄罗斯联邦的主权声索，要求实现高加索民族的独立自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政治和社会的大环境导致全国各地民族主义情绪“抬头”，特别是在民族意识较强的地区，相关社会运动的能量强劲。高加索地区是全苏联范围内民族分布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出现在高加索山脉南北、带有统合地区的政治目标的组织，成为同时期当地民族活动的典型代表。1989年8月25-26日，高加索地区的民族运动代表在苏呼米召开了第一届高加索民族会议，并成立了高加索山地民族大会（Ассамблея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大会的召开与当时阿布哈兹社会政治运动“国家团结论坛（National Forum Aidgylara）”<sup>①</sup>的主张相关。加上后续爆发的阿布哈兹战争，不难发现，苏联解体前后出现的高加索民族团结实践，与阿布哈兹联系甚为紧密。

1990年10月13-14日，第二届高加索民族会议在纳利奇克召开，并宣布继承和实现20世纪初成立的“山民共和国”（Республика Союза Гор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宣告成立时的相关决定。这次会议认为，建立北高加索和阿布哈兹新国家建构的时机已经成熟，并再次强调了高加索民族的统一性。相关内容与1918年宣布“高加索山民共和国”成立并作为独立国家的决议相吻合。<sup>②</sup>1991年11月，共有10多个高加索民族的全权代表<sup>③</sup>参加了在苏呼米举行的第三届会议，确认“高加索山地

---

行政区划设置。1956年，苏联正式确立了15个加盟共和国的行政区划，并保持到1991年苏联解体。在苏联的行政区划中，涉及北高加索以及外高加索民族分布地区均作为相应加盟共和国的组成部分，针对个别民族地区采取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的行政设置。例如，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下辖阿扎尔和阿布哈兹两个自治共和国以及南奥塞梯自治州。

① “National Forum Aidgylara”中Aidgylara是阿布哈兹语Аидгылара，意为“团结，统一”。该组织于1988年末成立，是代表和反映阿布哈兹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

② Лакоба Станисла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Кавказской Конфедерации. 28 декабря 2008. <http://www.gazavat.ru/history3.php?rub=11&art=122>

③ 与会的民族代表有阿巴扎人、阿布哈兹人、阿瓦尔人、阿迪格人、车臣阿金人（чеченцы-ауховцы 或 чеченцы-аккинцы）、达尔金人、卡巴尔达人、拉克人（Лакцы）、奥塞梯人（北奥塞梯和南奥塞梯）、切尔克斯人、车臣人以及沙普苏格人（Шапсуги）。参见1991年11月2日在苏呼米“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第三届会议上签署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条约》（Договор о Конфедеративном Союзе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民族联盟”成立并签署协议。此外，本次会议还就诸如总统委员会、高加索议会、仲裁法庭、高加索共同体委员会等机构设置做出安排。这些细节验证了该组织的自身定位是主权国家建构。<sup>①</sup>之后，该组织名称中的“山地”一词被删去，易名为“高加索民族联盟（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1992至1993年，“联盟”参与了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的战争，并作为支持阿布哈兹一方的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该组织虽不像之前那样直接参与地区冲突，但其内部因关于地区安全的主张存在分歧，仍然影响着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其中的反俄力量更是成为莫斯科需要在高加索地区应对的负面因素。在1994年底爆发的第一次车臣战争中，“高加索民族联盟”没有直接参与杜达耶夫集团对抗莫斯科的行动。之所以呼吁摒弃用战争手段解决问题，是因为“高加索民族联盟”与莫斯科和杜达耶夫集团均存在立场差异。这一时期，该组织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都较为有限且不断减弱，时任领导者旨在重整该组织内部架构并恢复其影响力的努力也未奏效。2000年，该组织领导人尤素普·索斯拉姆别科夫（Юсуп Сосламбеков）在莫斯科被暗杀，“高加索民族联盟”的活动至此完全停止。

### （三）“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历史渊源

在北高加索地区出现山地民族政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19世纪上半叶，这一地区出现了神权制的伊斯兰教国家<sup>②</sup>，并在伊玛目沙米尔（Имам Шамиль）的领导达到全盛时期。彼时，山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域覆盖北高加索的车臣、达吉斯坦的部分地区以及西部的阿迪格（切尔克斯）等地。该政权一直存续至俄国势力伸入高加索地区，并最终于19世纪中叶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

俄罗斯帝国解体之后，在高加索地区出现了名为“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山民联盟（Союз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горце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sup>③</sup>

---

① «Договор о Конфедеративном Союзе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III съезд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в г. Сухуме, 2 ноября 1991 г.

② 国名的俄语和英语译法分别为 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имамат 和 Caucasian Imamate (1828-1859)。

③ 这一组织在俄语文献中也有其他名称，例如 Союз горцев, Союз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горцев, Союз горцев Кавказа, Союз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горцев Кавказа。

的组织。1917年11月，该组织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山民自治（Горская автономия），也称“山民共和国（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其地域涵盖北高加索、达吉斯坦以及阿布哈兹。鉴于实力和影响有限及地域属性相似，“山民共和国”政府与捷列克哥萨克军政府结盟，并组建捷列克-达吉斯坦临时政府（Временное Терско-Дагеста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但是，在新组建政府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山民共和国”只能在达吉斯坦的部分地区得到承认，在高加索地区的认同度较低。面对本地区受到资产阶级政府权力机关以及苏维埃支持下的自治机构的影响，“山民共和国”的存续面临严峻挑战。现实境况迫使“山民共和国”政府寻求外部支持，同时期接触过的对象包括土耳其和英国。1917年末至1918年初，整个高加索地区处在因俄罗斯帝国瓦解而出现的过渡时期。北高加索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的状况致使内战爆发，新宣告成立的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Тер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成为这一地区新的权力核心。随后“山民共和国”政府离开弗拉基高加索迁往格鲁吉亚境内，山民共和国政府第一阶段遂宣告结束。<sup>①</sup>

在迁往高加索南麓地区不久，获得奥斯曼土耳其及德国方面支持的“山民共和国”于1918年5月11日宣布独立并组建新政府。具体来说，新成立的“共和国”中，共有7个“独立州”，分别是达吉斯坦、车臣-印古什、奥塞梯、卡拉恰伊-巴尔卡尔、卡巴尔达、阿迪格以及阿布哈兹。<sup>②</sup>但由于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全俄境内开展清剿行动，“山民共和国”的存续和发展再次受到影响。在这一时期，“山民共和国”政府通过联合地区内其他力量维系自身的存在，并表现出对抗苏维埃政权的突出特点。然而，奥斯曼帝国以及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给依靠外部支持的“山民共和国”政府带来直接的影响，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寻求其他的外部支持力量。但是，高加索地区的“山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地方武装终究不敌苏俄红军，在20世纪初第一次“窗口期”的存续宣告终止。

根据1991年11月2日在苏呼米“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第三届会议上签

---

①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http://www.hrono.info/organ/ukaz\\_g/gorskaja.php](http://www.hrono.info/organ/ukaz_g/gorskaja.php); Википедия. Гор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https://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631086>

② Азамат Джанымбей. Черкес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еальность. <https://www.proza.ru/2013/6/25/823>

署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条约》第一款的内容，该组织声明要延续“高加索山民联盟”第一届会议（1917年5月1（14）日<sup>①</sup>，弗拉基高加索）的事业，作为1918年5月11日宣告成立的“北高加索山地共和国”的“法定继承者”，将启动恢复高加索山地民族主权国家体制。<sup>②</sup>“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实践方向，是促进高加索地区各山地民族以联盟或邦联的形式存在，而这样的目标在“山地共和国”时期未能实现。

## 二、高加索“微小民族”结盟实践的动因分析 ——基于俄国和苏联时期的状况比较

复杂的民族构成以及数个世纪形成的特殊文化地理环境，为高加索地区出现独一无二的山地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分布在高加索地区不同区域的“微小民族”，是20世纪出现“山民共和国”以及“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主要推动力量，更是地区特殊山地文化的载体。在梳理高加索地区的民族分布以及回顾类似山民联合体行为的历史演进之后，有必要对“微小民族”结盟谋求区域政治目标的动机进行挖掘。以山地“微小民族”为视角的分析，将分为俄国时期和苏联时期两个阶段，分别对应20世纪俄罗斯历史中对于高加索民族的两次“窗口期”以及所进行的区域结盟实践。另外，本文还将梳理和比较近代俄罗斯两个历史阶段中对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政策，作为考察山地“微小民族”行为的外部路径。

### （一）“山民共和国”产生和实践的动因分析：俄国时期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的视角

在俄国从北方将势力伸入高加索地区之前，鉴于山地、湖泊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北高加索多个民族保留着较为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受生产力限制而未能形成强大的国家建构。因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乏外来势力

---

① 此处的时间采用当时使用的俄历，与通用公历相差13天，因而会议召开的实际日期是公历1917年5月14日。

② «Договор о Конфедеративном Союзе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III съезд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в г. Сухуме, 2 ноября 1991 г.

的侵扰。而在18-19世纪，实力迅速增长的俄国扩张至高加索地区，并逐步确立了在这一区域的绝对优势地位。虽然俄国在与其他地区势力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上风，但在巩固控制高加索的长期实践中仍须面对本地民族的抗争。从19世纪初持续至中叶的“高加索战争”，作为俄国与高加索历史中的绝对重要内容，充斥了太多关于扩张与抵抗的历史细节。在后续俄国的统治下，虽然山地民族与之相比实力悬殊极大，但仍然坚持抵抗和反制俄化政策。

19世纪之初，高加索山地民族面对的主要冲突方是南下的俄罗斯帝国。为抵御俄国的入侵，高加索当地部族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顽强抵抗，使俄国直到1864年才完全控制北高加索地区。参与抵抗俄国的战事的，有位于达吉斯坦和车臣的北高加索伊玛玛特（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ий имамаг）<sup>①</sup>、阿布哈兹、奥塞梯以及其他众多山地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高加索地区的不同族裔需在周边大国势力之间周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选择不同的投靠对象。而在俄国展现出征服高加索的态势时，北高加索山民们在反抗俄国殖民入侵的基础上联合的条件逐渐成熟。<sup>②</sup>伊玛目沙米尔（Имам Шамиль）<sup>③</sup>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着手推进北高加索联合并建立统一国家。需要说明的是，沙米尔对抗俄国以及团结高加索山地民族是同时进行的。但由于权力、宗教等因素的限制，伊玛玛特希望团结、统一高加索的政治目标面临极大困难。

高加索民族众多，地理环境复杂，甚至有些同族民众因分布的地理环境差异而存在区别。以上提到的阿布哈兹族、奥塞梯族内存在不同分支，其中不乏因自然地理因素得名的情况。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同族裔具备团结的推动力，因此更易形成“共同体”。但是在高加索族际之间，往往因为实际权力、利益的冲突以及宗教文化差异而出现联合的障碍。虽然“高加索共同体”未能被巩固，但这类实践反映出高加索地区在历史上已孕育出团结、统一的思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认为，建立类似跨族际国家建构的思想，为后来进行维护地区自主的实践提供了范本支持。

---

① Имамаг 译为“伊玛玛特”，是穆斯林神权制国家的通称，是“教长国”的意思。参见侯艾君：《车臣始末》，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23页。

② 侯艾君：《车臣始末》，第23页。

③ “伊玛目沙米尔”是北高加索伊玛玛特第三任伊玛目（имам，来自阿拉伯语，译为清真寺神职领导，可被理解为宗教领袖、教长）。

从外部环境因素的角度看,不难发现高加索的团结往往出现在外来强敌入侵的背景下。事实上,民族数量多、差异大的高加索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出现“山民共和国”,符合团结聚力方可维护本地民族存续的逻辑。显然,就对于地区共同体形成的影响而言,来自外部的威胁要比山地民族之间内生的凝聚力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的解体,对于高加索山地民族来说,是再次实现自主的“窗口期”。俄国时期的统治使其意识到团结对于在地区生存的重要意义。此外,还不能忽视特殊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山地民族之性格,即,随时准备应对外来威胁和骁勇善战的显著特点<sup>①</sup>,也是出现类似“山民共和国”组织的助推因素。

## (二)“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继承性的内涵:苏联时期高加索地区“微小民族”的视角

20世纪20年代前后,类似山地民族共同体的运动因不敌苏俄军队的实力,再次成为自主联合区域民族的一次短暂尝试。短短数年,“山民联盟”、“山民共和国”等作为高加索山民联合的组织多次经历变化和迁移,也说明其实力着实有限,并且缺乏在族际联合问题上长期维系的稳定性。最终,在高加索地区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未能实现,实现山民共同体的设想失去了20世纪第一次“窗口期”。高加索战事结束以后,苏俄在接管北高加索地区的政策方面暂时体现出“保留山民自治”的思想,建立了囊括不同族裔的山民自治区。但由于族际差异等原因,苏俄政府逐渐放弃了在北高加索地区保持山民联合性质的行政区划设置。<sup>②</sup>

事实上,苏联政府后续在北高加索区划问题上多次进行调整,首要原因正是这里复杂的民族状况。可是,不论建立类似山民共同体类型的共和国,还是分别根据不同民族进行分别管辖,对于苏联政府而言都会面临相应的问

---

① Алиев Х.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и традиции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С.152.

② 根据苏俄政府1921年1月20日的命令,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Гор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隶属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区划,该共和国包含7个区(округ):巴尔卡尔区、季格拉区、印古什区、卡巴尔达区、卡拉恰伊区、奥塞梯区、车臣区。根据192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该共和国的民族数量超过20多个。

题。虽然管辖所面临的困难很大，但苏联一些强硬或“一刀切”管理的行事方式，招致了高加索本地民族的不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出现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地下反苏组织，也冠以“山民国家”的字眼<sup>①</sup>，其目标是在德意志帝国的委任下在高加索建立联邦共和国。<sup>②</sup>这一违背苏联国家利益的行径，直接招致了车臣、印古什等民族的流放。

回溯苏联时期高加索发展演进的历史，虽然描述和探讨该地区民族问题的史料有限，但事实上，高加索地区少数族裔问题，是这一时期该区域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涉及高加索民族运动时，俄罗斯学者大多会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谈起，即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国家政权的衰弱，所有累积下来的族际、领土矛盾开始露头；社会生活的政治化、民族知识阶层的出现、以及民族自觉意识的高涨，导致在北高加索出现民族运动和组织。<sup>③</sup>如此，便过渡到本文探讨的在苏联末期再次出现的山民联合组织。

从民族的视角审视，很容易发现北高加索地区的特殊性：即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未能在该地区形成统一的国家，但众多民族的分布也未使该区域完全割裂。这种情况说明，北高加索山民之间，存在着某种超越族裔差异的联系。形成族际间共同体的思想一直存在，适宜的外部环境是推动其实践的重要因素。在从民族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的视角审视高加索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民族之间、特别是山地微小民族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对于团结联合的内在需要。实力弱小、发展相对落后，使高加索山民长久以来难以完全实现自主，因而，在遭遇外来威胁或面临“窗口期”的情况下，聚合的需求会抵消族际差异并实现结盟。从这一点来看，“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继承了北高加索山民早期团结实践的思想，继续致力于将建立高加索国家的目标付诸实践。

---

① “车臣-山民国家社会主义地下组织（Чечено-гор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дпо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于1941年11月成立，该组织曾多次更名，组织者与苏维埃政权对立，反对俄罗斯的统治。这一出现在车臣、印古什的反苏运动，有法西斯德国的支持。

② Азаров Виталий, Марушенко Владимир. Кавказ в составе России// 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19 января 2001 г.

③ Литвинова Т.Н. Этно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движения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в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2013. №.9. С.236.

### （三）俄国后期及苏联时期对高加索地区民族政策的比较：审视“微小民族”联合实践的外部路径

时代更替无法改变长久以来的地域性文化积淀，特别是在分布有众多民族的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仍旧无法回避，需要新生政权进行治理探索。自19世纪开始，俄罗斯国家对高加索地区的管辖具有与中央政权属性相称的时代特点。在民族治理方面，政治上的残暴统治、经济上的掠夺以及文化上的俄罗斯化，是俄国为巩固扩张和兼并事实所采取的做法。<sup>①</sup>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政府在应对民族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存在欠缺。高加索是不同时期苏联中央政府施行民族政策的重要地区，政策和实践对分布在当地的众多微小民族影响巨大。

“高加索战争”是俄罗斯帝国征服北高加索的重要历史内容，标志着俄国开始加紧向高加索地区扩张。为巩固对当地的控制，俄国采取了强硬的殖民统治政策。在征服高加索的问题上，俄国认为，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和历史命运驱使其获取高加索，并为这一地区带去文明和进步。<sup>②</sup>与“俄罗斯化”政策同时存在的，是当地民族不断增强的自觉意识，加上山民与生俱来的坚毅气概，这些都是俄国需要面对的问题。俄国在北高加索的政策几经变化，徘徊于对山民较为宽松的管理和加紧“俄罗斯化”的进程之间。虽然俄化政策对北高加索产生了影响，但却无法完全改变山民的文化认同，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山民共和国”出现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内战结束后，苏俄设置了数个囊括众多北高加索微小民族的“自治区”，之后又下令建立“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sup>③</sup>对于布尔什维克政权而言，采取山民联合性质的行政设置，符合国家过渡阶段的需要。30-50年代，北高加索地区的行政区划经历多次变化，民族问题仍然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涉及民族地区治理方面，苏联政府实施的针对北高加索一些民族流放和回迁的政策，增加了族际之间的不满和矛盾。此外，在全苏

---

① 张建华：《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② Виталий Воропаев. Из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Власть. 2010. №.8. С.172.

③ Горская автономн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范围内推行的民族同化和“苏联人民”认同的政策，存在严重问题。<sup>①</sup>总的来看，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加索微小民族发起运动的影响因素之一，建立共同体的动力因“窗口期”的出现而显著加强。

### 三、“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地区分离冲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家体系内出现的危机以及国家机器的急剧崩塌，对于分布在高加索地区的众多少数族裔而言，是继20年代之后出现的第二个“窗口期”。继承了早期类似组织的思想和目标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在具有激进民族主义思想者的带领和参与下，逐渐成为影响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国家转型阶段的重要力量。鉴于该组织关于建立高加索独立共和国的目标，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混沌的高加索战事中，不难发现其活跃的存在。这一团结本地民族的运动，是高加索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实践的再次印证。对于高加索山脉南北两侧的主权国家而言，“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活动的分离性质及其影响，是他们在后苏联时代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 （一）后苏联时代“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地区分离实践

从18世纪开始，俄罗斯帝国的势力向高加索地区扩展，最终北高加索和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等所处的高加索南麓地区，都在这一时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1917年发生的俄国革命，给格鲁吉亚的独立抵抗力量带来了契机，包括格鲁吉亚在内的南高加索国家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获得了短暂的独立；而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兴起以及后续苏维埃红军势力的深入，标志着这一地区新阶段的开始。1921年12月，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签署了联盟条约<sup>②</sup>，确认阿布哈兹通过格鲁吉亚加入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随后，双方开始了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方面的联系与合作。苏联初期，格鲁吉亚和阿布哈兹的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些变化：1922年至1936年，格鲁吉亚作

① 熊坤新：《苏联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0-73页。

② «Союзный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Грузии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овет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Абхазии» от 16 декабря 1921 г.

为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其中阿布哈兹共和国在1931年被确认为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自治共和国。随后，格鲁吉亚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一直存续到苏联解体；而这一时期阿布哈兹追求“准独立”于格鲁吉亚的要求和示威活动从未停止。<sup>①</sup>

苏联的解体给高加索地区所有原加盟共和国造成了严重影响，除了独立初期与所有原苏联空间内国家一样共同面临“转轨”的任务，由民族矛盾、分离诉求引发的地区争端，成为困扰这一地区国家更加棘手的问题。长久以来，阿布哈兹的地位未能满足民族主义者的诉求，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动荡时期使得这一民族争端再次凸显。阿布哈兹方面不接受格鲁吉亚给予的自治方案，并于1992年7月通过了独立宣言。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激化，并最终导致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之间战争的爆发。需要强调的是，这场战争的交战方，除了直接当事方格鲁吉亚政府和阿布哈兹之外，还有这一时期活跃于本地区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该组织作为支持阿布哈兹一方的力量，直接参加了对抗第比利斯的战斗。

阿布哈兹战争于1992年8月14日爆发，在此背景下“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在格罗兹尼召开了第十次议会紧急扩大会议，并发表了该组织对于时下阿布哈兹局势的立场。归纳起来看，基于阿布哈兹局势的共计八条决定的内容<sup>②</sup>，反映了“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在危机局势下对阿布哈兹的坚定声援和支持，其中具体援助措施体现出与格鲁吉亚以及俄罗斯的对立。此外，联盟主席穆萨·沙尼波夫（Муса Шанибов）<sup>③</sup>和议会主席尤素普·索斯拉姆别科夫又再次共同颁布命令，内容涉及阿布哈兹局势以及“山地民族联盟”的行动。“由于无法阻止格鲁吉亚‘侵略者’对阿布哈兹主权和领土的侵犯”，我们发出以下命令：联盟所有部门需向阿布哈兹地区派遣志愿兵，以破坏侵略者武装；联盟全部军事部门需武装对抗一切反对力量，不惜一切抵达阿布哈兹境内；宣布第比利斯为灾难区，在此情况下使用包括恐怖行动在

---

① Stanislav Lakoba, “Abkhazia is Abkhazia”, *Central Asian Survey*, 1995, Vol.14, No.1, pp. 97-105.

② Svetlana Chervonnaya,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Georgia, Abkhazia and the Russian Shadow*, Glastonbury: Gothic Im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29-131.

③ 英文文献中也有 Musa Shanib 的译法。

内的所有手段；宣布在联盟境内的格鲁吉亚族为人质；所有目的地为格鲁吉亚的货物都将被扣留。<sup>①</sup>

阿布哈兹战争爆发后，“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政策完全倾向阿布哈兹方面，通过发布政令以及必要的前期准备，开始采取实际行动对抗“侵犯阿布哈兹的敌人”。1992年10月，由车臣武装运动领导人沙米尔·巴萨耶夫（Шамиль Басаев）指挥的“联盟”武装力量参与了加格拉战役（Battle of Gagra），为阿布哈兹方面提供了军事援助，并对战事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联盟”武装还参与了针对卡玛尼（Kamani）和什罗马（Shroma）等谷米斯塔河（Gumista River）沿岸村庄的军事行动，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由于上述一些地区是格鲁吉亚族人的聚居区，因而格方认定军事行动是分裂分子的种族屠杀行为。<sup>②</sup>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阿布哈兹战役中，支持阿布哈兹一方的，除了“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还有来自北高加索的哥萨克以及由阿布哈兹当地亚美尼亚族人组建的军事组织——巴格拉米扬营（Bagramyan Battalion）。俄罗斯方面，也当然高度关注事态发展，其干涉和介入策略对战事走向产生了多重影响。整个战事期间，虽然莫斯科官方持续保持着中立立场，但其关键角色却无法被低估。<sup>③</sup>

阿布哈兹战争以后，“高加索民族联盟”<sup>④</sup>的主要活动与当时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局势紧密相连，但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虽然在动荡的时代存在着该组织可以利用的因素，但就实力而言，仍无法与高加索地区其他主权国家相提并论。对于该组织而言，一面被内部架构问题所困扰，另一面又是团

---

① Svetlana Chervonnaya, *Conflict in the Caucasus: Georgia, Abkhazia and the Russian Shadow*, p.131.

② 可参见 1997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种族清除政策事实的结论报告”，О выявленных фактах политики этнической чистки—геноцида, проводимо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Абхазии (Грузия)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ередачи виновных лиц в руки правосуди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принципами надлежащего суд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Заключ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Грузии по установлению фактов политики этнической чистки — геноцида, проводимо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грузи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Абхазии, Грузия, и передач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трибунал.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1027111846/http://geocities.com/abkhazia\\_dream/public/19.htm](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1027111846/http://geocities.com/abkhazia_dream/public/19.htm)

③ Georgia/Abkhazia, “Violations of the laws of war and Russia’s role in the conflict”, *Human Rights Watch Arms Project, Human Rights Watch/Helsinki*, March 1995, Vol.7, No.7, pp.7-8.

④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于 1992 年 10 月去除了其名称中的“山地”一词。

结统合不同民族的艰巨目标，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实践方面，“高加索民族联盟”不再表现出那种在阿布哈兹危机时期的积极性，并与类似武装军事行动保持距离。在车臣动荡的背景下，该组织虽在北高加索问题上坚持原先的立场，但行动的组织力和积极性已无法和早前相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组织的运转面临挑战。

苏联解体前后，同样与复杂民族问题相关的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局势急剧动荡。其中，车臣问题的凸显，成为困扰和影响当代俄罗斯多年的“大患”。1991年6月，“车臣民族全民族代表大会”<sup>①</sup>在苏联空军指挥官杜达耶夫担任执委会主席后，迅速取代了苏共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领导地位。同年秋天，杜达耶夫在赢得选举之后宣布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sup>②</sup>脱离苏联“独立”。1994年12月，莫斯科向格罗兹尼派兵以解决困扰已久的分离问题，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面对莫斯科的重兵逼近，时任“高加索民族联盟”主席的沙尼波夫，组织兵力在通往前线的道路上阻断俄军。在战争阴云笼罩的背景下，时任该组织副主席的古巴奇科夫（Жантемир Губачиков）在俄罗斯杜马会议上表示，希望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车臣问题。与莫斯科的态度不同，“高加索民族联盟”认为应该承认车臣时任领导人的合法性，并将其视为政治谈判解决问题的一方。<sup>③</sup>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高加索民族联盟”内部关于高加索局势的立场和对待莫斯科的态度存在差异，另外参与地区事务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由于后续受到北高加索地区整体环境以及政治气氛的影响，沙尼波夫连同“高加索民族联盟”组织的影响力持续减弱。

## （二）高加索地区国家对这一组织的立场和应对措施

20世纪80年代末期，加姆萨胡尔季阿作为格鲁吉亚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多次组织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示威活动，以“大格鲁吉亚主义”回应南奥塞梯及其他少数民族问题的言论，成为他的鲜明特色。苏联解体前后，加姆萨胡尔季阿先后担任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

① Обще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нгресс Чеченского Народа/ОКЧН

② Чечен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Ичкерия

③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заседания 13 декабря 1994 г. Федера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 <http://transcript.duma.gov.ru/node/3123/>

以及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其执政表现出的强硬风格和民族主义特点，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格鲁吉亚国内的民族对抗。同一时期，针对“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联合高加索不同民族、试图在苏联框架内建立第十六个共和国的主张，加姆萨胡尔季阿的态度较为消极。他认为高加索人民有权自主选择未来的发展道路，但这一组织只不过是俄罗斯主导的、另一个帝国主义管控高加索地区的机制。<sup>①</sup>

加姆萨胡尔季阿被迫下台后，由于处境的变化，其势力与“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993年10月26日，来自北高加索地区多个民族的代表，参加了在苏呼米举行的“联盟”议会会议，并确认支持阿布哈兹分离势力。随后，该组织的代表到达祖格迪迪，并表达对加姆萨胡尔季阿及其追随者的支持。鉴于位于阿布哈兹的苏呼米被视为该组织总部的目标选项，格鲁吉亚政府认为“联盟”的行为是对主权国家属地的非法控制。<sup>②</sup>

谢瓦尔德纳泽回到格鲁吉亚时，正是阿布哈兹问题不断激化之际。对这位资深的政治家而言，首要目标是使国家平稳过渡，其中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妥善处理阿布哈兹危机。在格鲁吉亚主权和领土遭受侵犯的情况下，参加阿布哈兹战争并支持分离力量的“高加索高山民族联盟”被谢瓦尔德纳泽视为对格鲁吉亚的威胁，他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称该联盟本质上是“恐怖组织”。<sup>③</sup>1992年9月，应格鲁吉亚方面的要求，该组织的领导人沙尼波夫被俄罗斯检察机关逮捕，但数日之后他便越狱回到阿布哈兹。有传言称，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当局受到压力将其释放，而背后则是“山民联盟”与北高加索不同民族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sup>④</sup>

---

① “To the Chechen Delegation, Participating in the Assembly of the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Sakartvelos Respublika*, 5 September 1992, No.171, p.3; David Matsaberidze, “The Confederation of the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and the conflict over Abkhazia”, *The Caucasus & Globalization*, 2012, Vol.6, No.2, pp.40-41.

② “Appeal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oris Eltsin”, *Sakartvelos Respublika*, 3 November 1993, No.238, p.2; David Matsaberidze, “The Confederation of the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and the conflict over Abkhazia”, p.43.

③ “Press Conference of Eduard Shevardnadze”, *Sakartvelos Respublika*, 7 October 1992, No. 204; David Matsaberidze, “The Confederation of the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and the conflict over Abkhazia”, p.45.

④ *The Caspian Region, Vol. II. The Caucasus*, Edited by Moshe Gammer,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04, p.47.

谢瓦尔德纳泽清楚“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在阿布哈兹地区势力的发展对格鲁吉亚的消极影响，他也曾就相关问题与俄罗斯领导人进行沟通，希望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俄方的配合和支持。俄罗斯当时对其境内类似的政治组织采取不支持、不承认的态度，特别是在不受莫斯科掌控的北高加索地区更是如此。<sup>①</sup>当时俄罗斯面临的状况是：北高加索地区的不稳定态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开启实质性的分离实践对俄构成主权挑战和安全威胁。俄罗斯官方曾针对“联盟”表明反对态度，但考虑到该组织在阿布哈兹战争后影响逐渐减弱的事实，以及同时期车臣问题的逐渐凸显，因而对其关注度有所降低。

#### 四、“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对后苏联时代地区局势和转型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因独特的民族运动形式成为高加索历史中的特别内容。在近两个世纪的高加索历史中，山地民族团结运动的目标指向，从应对外来威胁发展成独立建国，在碎片化的历史中不难发现思想的继承性。作为带有“泛高加索主义”色彩的跨族际运动，“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活动与后苏联时代高加索地区的安全问题存在联系，也对相关地区国家的转型产生重要影响。

##### （一）“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体现“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的实践

在既有的一些文献中，有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些旨在联合本地区不同民族的合作实践，体现出“泛高加索主义”思想。<sup>②</sup>具体而言，这种思想主张：建立囊括不同民族的联盟，改变旧时因自然地理或人为界线阻隔的生产生活方式，使高加索真正成为本地民族共有的生存地域。“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作为20世纪初“山民共和国”的“继承

---

<sup>①</sup> David Matsaberidze, “The Confederation of the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and the conflict over Abkhazia”, p.45.

<sup>②</sup> “泛高加索主义”的概念出现在一些介绍高加索地区历史的文献中，特别针对苏联解体前后在这一地区建立不同民族之间合作、联合关系的主张。例如类似“高加索共同家园”的概念，体现出“泛高加索主义”思想。可参见 Georgi M. Derluguian, *Bourdieu's Secret Admirer in the Caucasus*, VERSO, London, New York, 2004, pp.264-265, 271.

者”，延续了谋求高加索不同民族合作的思想主张，并将建立共同属于高加索山地民族的邦联式政治实体作为目标<sup>①</sup>，希望完全与高加索南北的外部强大势力划清界限。“山民共和国”的主张产生于俄罗斯帝国解体之后，但是，最终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未能长期存续。20世纪80年代末，统合高加索不同民族的思想，由于苏联末期的动荡局势被再次唤醒，与20世纪20年代的主张一脉相承。从俄国后期到苏联时代的历史验证了：当外界主导的整合力量缺失时，来自高加索地区内部的力量会取而代之。但从20世纪类似运动的实践结果来看，带有“泛高加索主义”色彩的内部整合并不成功。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产生以及后续实践的思想根源，均带有明显的“泛高加索主义”色彩，即主张抛开同时代所处空间地域作为主权国家合法管理的一系列因素，以民族为单位，建立覆盖高加索山脉南北区域的民族联合体。和历史上体现“泛高加索主义”思想的其他主张以及实践相似，它们都必须面对本地区复杂民族状况的互异性以及宗教、习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为了实现联合，该思想的倡导者着力于强调高加索作为共同生活地域的趋同性，旨在抵消民族之间的差异。与之相类似，政治家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也曾提出过“联合高加索（United Caucasus）”的主张，实现的路径是共同市场、共同利益以及政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sup>②</sup>但是，现实中的复杂因素对弥合族际差异造成困难，相关的设想最终未能更进一步。或许一些学者所言揭示了原因所在，即“不存在政治或是社会概念上的高加索地区，也不存在‘高加索身份（Caucasus identity）’”<sup>③</sup>。本地区的民族缺乏内在联系的推动力，除了地理因素是无法选择的相似性之外，别无其他。

回顾历史上具有“泛高加索主义”色彩的实践以及相关研究，大多采用“邦联、联盟（confederation）”、“联邦（commonwealth）”<sup>④</sup>来代表松

---

① «Договор о Конфедеративном Союзе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III съезд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в г. Сухуме, 2 ноября 1991 г.

② 参见“Remarks of Georgian President Mikheil Saakashvili at the 65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3, 2010, New York.

③ Tracy Germ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Caucasus, Good Neighbours or Distant Relatives?*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12, p.17.

④ 参见 *Commonwealth and independence in post-Soviet Eurasia*, Ed. by Bruno Coppieters et al., London, Potland(Or.): Cass, 1998.

散联合体的政治概念，或是用“家园（Home）”这种带有地域感召力和情感的字眼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泛高加索主义”倡导者尽力将地域的同一性置于民族差异性之前，这就意味着此类想法缺乏强有力的民族认同支撑。与其类似的概念，如“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等，都是建立在民族相似或趋近的基础之上的，而以相似地域来联合不同民族的思想相对较少，实践中的难度较大，影响力也相对较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思想和实践在当今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中，往往被认为是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的，是对国际和地区安全产生挑战的因素。

## （二）“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与后苏联时代的高加索安全问题

“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最为活跃的时期出现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几年：苏联末期，动荡的环境为这一组织的出现和发展壮大提供了客观条件；民族及地域意识的觉醒，则是类似组织出现并作为新的整合尝试的主观因素。由于“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主张和实践，与有关当事国（即分别位于高加索山脉南北两侧的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直接对立，其与分离分子的同盟以及合作关系，对当时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产生了影响。

事实上，建立“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这一地域性族际联盟，最初与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之间的矛盾存在关联，即阿布哈兹希望通过联合北高加索民族的力量来对抗第比利斯。1989年8月在苏呼米召开的第一届高加索民族会议，邀请了北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激进分子，包括穆萨·沙尼波夫、泽利姆汗·扬达尔比耶夫等，而会议的组织以及经费均来自阿布哈兹官方。<sup>①</sup>之后，随着该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在联合的背景下支持阿布哈兹的立场愈加鲜明。“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参与的战争严重影响了地区的稳定，最终造成了阿布哈兹事实上与格鲁吉亚分离的状态，至今仍然是困扰格鲁吉亚的首要问题。

阿布哈兹战争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平民伤亡，因战争产生的大量难民给当时刚刚独立的格鲁吉亚带来了沉重负担。在外部力量的参与下，第比利斯失

---

<sup>①</sup> Georgi M. Derluguan, *Bourdieu's Secret Admirer in the Caucasus*,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4, p.236.

去了对本国领土的有效管控，所造成的后苏联时代“被冻结的冲突（frozen conflict）”至今仍然是高加索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影响着格鲁吉亚和整个地区的安全。“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作为当时参与战争的一股力量，配合阿布哈兹分离分子，给第比利斯方面造成困难；而其所谓的“胜利”，却给整个高加索地区的安全打了“死结”。

阿布哈兹战争之后，“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实力以及活动的积极性开始萎缩。相比之下，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则在杜达耶夫集团的领导下坚持独立主张并固守北高加索一隅。在杜达耶夫看来，“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泛高加索主义”从想法变为现实，只能寄希望于车臣。由于当时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只有车臣地区处于事实上独立的状态，所以想要联合高加索地区其他民族并真正建立不受外部势力控制的实体，车臣的力量不可忽视。为了固守自己在高加索地区的地盘并借机做大，杜达耶夫集团有接管“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考虑。<sup>①</sup>

在时任“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主席沙尼波夫的领导下，该组织大部分力量都来自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但是，受制于莫斯科对北高加索局势施加的影响，该组织逐渐失去了活动的基础，影响力也逐渐减弱。因而，与直接参与阿布哈兹战争不同，“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并未再次以组织的名义参加与莫斯科的直接对抗，而与车臣杜达耶夫方面的微妙关系则使其难以获得外援。需要注意的是，“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虽未与车臣分裂分子结成联盟，但其支持高加索地区民族的团结和联合，因而也是俄罗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必须予以关注的因素之一。

### （三）“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对高加索地区国家建构与转型的影响

对于格鲁吉亚来说，苏联时代的终结意味着重获独立，但真正“当家做主”后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却并不轻松。从19世纪初东格鲁吉亚王国<sup>②</sup>并入俄罗斯帝国开始，这个高加索山脉南麓的小国便鲜有独立的历史。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阶段里，虽然被誉为格鲁吉亚“国父”的恰夫恰瓦泽（Ilia

---

① Georgi M. Derluguian, *Bourdieu's Secret Admirer in the Caucasus*, pp.263-264.

② Kingdom of Kartli-Kakheti

Chavchavadze) 提出格鲁吉亚民族性的三要素：祖国、语言和信仰，力求保护格鲁吉亚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独特性，<sup>①</sup>但与邻国的共同历史以及高加索地区民族迁移等因素，使重新独立的格鲁吉亚再次面临国家建构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此外，转轨时期的高加索地区国家所面临的建构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在后苏联时代将独立的国家机构、制度等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这无疑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加姆萨胡尔季阿，迎合时代的特点和格鲁吉亚人民的意愿，于1991年当选为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后的首任总统，但不到一年他便被迫下台。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本人并不是资深政治家，而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对其领导人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加氏是靠被“公开性”点燃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情绪赢得总统选举的，然而强调民族主义只会带来更多矛盾，并不利于民族状况本就复杂的格鲁吉亚找到缓和与解决问题的出路。同一时期“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出现以及在阿布哈兹的活动，便是过渡时期民族矛盾凸显并进一步恶化的体现。

或许，我们很难将格鲁吉亚在后苏联时代的国家建构与转型问题，直接与某一组织或者单一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并归结为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但通过分析格鲁吉亚的案例，我们会发现，民族问题与包括苏联后期的“加姆萨胡尔季阿现象”、“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第比利斯在后苏联时代面临的转型任务都直接相关。具体来说，即在苏联后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高加索地区不同民族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导致了民族独立诉求以及联合谋求发展的现象出现，而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地区，因历史的关系以及现实中民族间的差异，致使矛盾激化，最终引发了阿布哈兹战争。对于格鲁吉亚来说，自身面临的民族问题以及苏联解体前后复杂的地区民族状况，是其国家建构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民族矛盾的激化使刚刚获得独立的格鲁吉亚遭受战争的重创，致使新国家建构的工作严重滞后，国家转型在整个90年代进展缓慢。而类似“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组织，作为民族问题复杂交错中的额外因素，在时代更替中出现、发展，并发挥着自己的独

---

<sup>①</sup> Ghia Nodia, “Components of the Georgian National Idea: An Outline”, *Identity Studies*, 2010, p.88.

特影响。

俄罗斯作为大国以及苏联的国际法继承者，虽然具体情况与格鲁吉亚不同，但从后苏联时代国家建构以及转型任务的角度来看，原苏联国家的身份决定了它们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苏联解体前后，活跃并发展迅速的民族分离思潮同样出现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苏联“8·19”事件后，车臣局势持续动荡。叶利钦发布联邦总统紧急状态令，制衡车臣持续膨胀的分离势力。在此情况下，由14个民族组成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合会也宣布志愿人员总动员，以武力对抗俄联邦总统令。<sup>①</sup>

为解决民族分离问题，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两次车臣战争，最终使地区局势趋于缓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复杂形势以及严重的民族分离问题，考验了俄罗斯在新国家建构方面的决心和能力。但与此同时，因作战而产生的巨大消耗，也使刚经历国家剧变的俄罗斯负担沉重。在北高加索地区出现分离主义实践是一种客观结果，其产生的原因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及身份转型过程中民族主义话语权分量加大有关。而在后苏联时代，此类情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sup>②</sup>本文主要探讨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正是这一时期掺杂在影响北高加索局势诸因素中的一个。虽然其活动在车臣问题愈演愈烈时已经逐渐减弱，但该组织跨越族际谋求合作尝试的特殊性，可算得上在高加索地区独树一帜。

## 五、结语

高加索地区民族分布状况十分复杂，历史上诸多问题的产生和激化都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苏联解体前后，“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是高加索地区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寻求族际合作的实践，旨在排除外

---

① 王逸舟等著：《恐怖主义溯源（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2页。此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合会”正是本文中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在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实施紧急状态》（«О введении чрезвычай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в Чечено-Ингуш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的命令于1991年11月7日签发。

② 参见 Маркедонов.С.М. Сепаратизм на Большом Кавказе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итог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Европы: проблемно-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2009. С.39-64.

部力量、建立纯粹属于高加索山地民族的共同体。该组织参与了阿布哈兹战争并支持分离势力，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也存在与莫斯科对抗的因素。该组织是20世纪90年代初引发高加索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地区安全局势造成消极影响，使相关国家在后苏联时代的转型任务面临困难。

总结来看，高加索地区复杂的民族地理环境、众多微小民族出于生存考量和发挥影响的动机，是“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出现的最重要因素。另外，地区剧变产生的“窗口期”，是其产生以及活动的特殊时代背景。带有典型“泛高加索主义”特点的“高加索山地民族联盟”，其活动反映出在这一地区存在来自内部的整合力量，并且继承了不同历史时期类似组织的思想，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发挥了一定影响。但是，从多个历史阶段的山民共同体实践来看，整合的向心力仍然受到民族差异的影响。该组织具有的分离倾向，对格鲁吉亚和俄罗斯联邦的领土主权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对于高加索国家而言，复杂的民族状况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可以预见，当客观条件允许时，类似的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作为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还会对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演进产生影响。

---

**【Abstract】** Caucasus is widely known for its various peoples and their complex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times, there happened important events which had influences on the local history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s. The unique natural and human geography of this region contributes to the complexity of different peoples, and therefore, the local history is featured with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nfederation of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is mainly associated with two factors, namely, the extremely complicated distribution of peoples, and two special “window phases” since modern times. No matter the early form of this organiza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Russian Empire, or the inheriting organization in the end of the Soviet period, they both represent attempts of tiny ethnic groups in Caucasus in collaborating for development. Nevertheless, in the view of sovereign countries, this pan-caucasianism practice is a severe challenge to nation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Predictably, the complexity of peoples in Caucasus will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regional situation if other objective conditions are mature.

**【Key Words】** Confederation of Mountain Peoples of the Caucasus, Ethnic Conflicts and Separatism of Caucasian Peoples, Security in Caucasus, Tiny Ethnic Groups in Caucasus

**【Аннотация】** Кавказ всегда был известен своими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ми этническими группами и их сложны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м, в раз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эпохи он был свидетелем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й, влияющих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е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 и его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Особая природная и гуманитар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Кавказ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факторов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региона, поэтому местная история часто имеет чётк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Конфедерации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сновано на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ложном этническом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и в регионе, 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с двумя особым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ыми периодам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Будь то ранняя форма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л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на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торая снова вышла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арену в конц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сё это представляло собой попытки объеди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меньшинств на Кавказе и их стремление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по модели сообщества. Однак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увер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такая практика с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доктрины пан-Кавказа» является серьёзным вызовом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ложная этн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на Кавказе при иных объектив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вновь окажет важ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развитие регион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Конфедерация горских народов Кавказа, кавказский этниче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и сепаратиз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вка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меньшинства Кавказа

---

(责任编辑 崔 珩)

## 国家身份视角下蒙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汪金国 陈亚州\*\*

**【内容提要】**国家身份构建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而且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国家身份（预期）面临被弱化或强化的趋势，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认同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与特定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蒙古国在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方面，均致力于重构国家身份。对国家新身份内容与意义稳定性的珍视，影响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的提高，进而导致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显著差异，制约了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其次，相对于邻国和“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使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再次，蒙古国对自身民主国家类属身份面临弱化的担忧，成为阻碍其对上合组织认同水平提升的深层次原因。上合组织扩员后，蒙古国持“积极参与，缩小距离”的态度，尝试增进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关键词】**上海合作组织 蒙古国外交 蒙古国国家身份 蒙古国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D814.1;D831.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19)05-0169-(33)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亚五国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7VDL003）、2018年度新疆智库项目“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与‘一带’建设”（项目批准号：XJZK2018YW008）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9jbkyjd005、2019jbkytd002、2019jbkyzx014）的资助。感谢《俄罗斯研究》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 汪金国，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陈亚州，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一、问题的提出

蒙古国是首个获得上海合作组织（下简称“上合组织”）观察员地位的国家，也是迄今为止在上合组织内保持这一地位时间最长的国家。从 2004 年被接纳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至 2019 年，蒙古国保持观察员国地位已长达 15 年之久。在上合组织成立伊始，由于组织制度构建尚不完善及对组织缺乏了解，蒙古国对这一新型区域多边合作组织并未表现出较多关注。随着上合组织制度化进程臻于完成及其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相应地由平淡转向积极。<sup>①</sup>2004 年上合组织观察员国机制启动初期，蒙古国就提出申请，并于同年 6 月在塔什干元首理事会上被接纳为观察员国。此次元首理事会是上合组织正式结束初创阶段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的关键节点，<sup>②</sup>在此之际，蒙古国率先成为组织观察员国，不仅对与其抱有类似意愿的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而且对上合组织的存续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一定程度上受此影响，巴基斯坦、伊朗和印度分别提出申请，并于 2005 年被给予了观察员国地位。通过吸收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上合组织不断拓宽伙伴关系网络，不仅构建了覆盖正式成员、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区域合作网络，而且实现了自身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当今世界幅员最广、拥有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在 2017 年上合组织扩员前，蒙古国基本上已具备了成为正式成员国所需的诸多客观条件。一方面，蒙古国不仅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平稳向好，而且在国际社会拥有较好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在扩员前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序列中（蒙古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阿富汗），蒙古国具有其他观察员国短期内难以企及的显著优势。这是因为，尽管阿富汗和伊朗具有加入上合组织的较强愿望，但由于前者受国内政局动荡等问题的牵制，后者受美伊关系紧张及中东复杂多变局势的影响，以及部分成员国对两国国内问题可能产生的外溢风险存在较多顾虑，在两国国内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

---

① 黄家驊：《驻蒙外交官二十年工作实录：五进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84 页。

②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8 年 3 月，[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jbqk\\_683096/](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lhg_683094/jbqk_683096/)

解的情况下，阿富汗和伊朗距离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可能为时尚远。<sup>①</sup>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历史积怨较深且现实中冲突时有发生，倘若将两国之间的冲突带入上合组织，很可能对组织的平稳运行带来潜在隐患，这在上合组织扩员进程中颇受争议。总之，与其他观察员国在转正过程中均面临或多或少的问题相比，蒙古国如果选择加入上合组织，无疑具有显著的优势。<sup>②</sup>因此，倘若其申请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也会获得中国、俄罗斯及组织其他成员国较程度的支持。<sup>③</sup>也正基于此，时任上合组织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Rashid Alimov)在2017年底不无遗憾、同时颇具期待地说道：“如果蒙古国加入，上合组织版图范围内就没有空白点了”。<sup>④</sup>不仅如此，在关于上合组织扩员问题的学术探讨中，不少学者曾明确表示，吸收蒙古国等国内问题较少的国家，应是上合组织扩员的优先考虑。<sup>⑤</sup>

然而，与外界的观察与期冀所不同的是，尽管蒙古国基本具备成为上合组织首批扩员对象所需的内外部条件，但蒙古国官方对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这一议题，始终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导致其与上合组织的首次扩员失之交臂。2014年，在上合组织扩员引发热议期间，时任蒙古国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Sakhiagiin Elbegdorj)表示：“蒙古国准备好更加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但目前还没有做出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全权成员的决定”。<sup>⑥</sup>此后，蒙古国的这一立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许多学者的认知与预期。那么，由此引发的疑问是：为何蒙古国在转

---

① Shahram Akbarzadeh, “Iran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deology and Realpolitik in Iranian Fo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5, Vol.69, No.1, pp. 92-95.

② 陈小鼎、王亚琪：“东盟扩员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启示与借鉴——兼论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前景”，《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第124-125页。

③ 李超、杨恕：“缘何蒙古国仍未加入上合组织”，《国际展望》，2015年第1期，第72-73页；M K Bhadrakumar, “China and Russia Welcome Iran, India, Pakistan and Mongolia into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2006, Vol.4, No. 4, <https://apjif.org/-M-K-Bhadrakumar/2052/article.html>

④ “上合组织秘书长：巴林和卡塔尔申请加入上合”，环球网，2017年12月6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7-12/11425315.html>

⑤ 曾向红、李廷康：“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学理与政治分析”，《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125页。

⑥ “蒙古国总统：尚未决定蒙古成为上合组织全权成员”，环球网，2014年8月19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8/5110839.html>

为正式成员国的种种条件均已具备的情况下，迟迟没有做出正式加入上合组织的决定？截至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并未展开充分的探讨，导致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sup>①</sup>

事实上，蒙古国不愿加入上合组织与其国家身份之间具有密切关系。冷战结束后，蒙古国开启国家身份构建历程，并形成了新的国家身份。对国家身份的有意维护，很大程度上导致其与上合组织的关系长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为此，本文拟从国家身份的视角，考察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状况，进而对涉及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主要问题予以解释。从国家身份的视角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第一，过去近 20 年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缺状态。第二，尽管认同问题始终是困扰国际组织特别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过，整体而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国际关系学界尚未就地区组织的认同问题予以充分的重视和探究。<sup>②</sup>鉴于此，将国家身份与国际组织认同研究相结合，探析蒙古国为何选择不加入上合组织的原因，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蒙古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加强并不断拓展与蒙古国的合作，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在要求。2014 年 8 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国期间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辟了中蒙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同年 9 月，在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以将“欧亚大陆桥”“草原之路”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对接。而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所倚靠的重要平台，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可为“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的对接，提供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sup>③</sup>

---

①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李超、杨恕：“缘何蒙古国仍未加入上合组织”，《国际展望》，2015 年第 1 期；宝勒尔：《蒙古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年 6 月；国外的英文研究成果主要有 Anthony V. Rinn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and Mongolia’s Quest for Security”,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2014-2015, Vol.27/28, No.1/2; Mendee Jargalsaikhan, “Factoring Mongolia’s Non-Membership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Voices from Central Asia*, July 2012, No.3.

② Andrea Oelsner, “The Institutional Identity of Regional Organizations, or Mercosur’s Identity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3, Vol.57, No.1, pp.116-117.

③ 王海燕：“‘一带一路’视域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机制保障与实施路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第 115 页。

## 二、国家身份视角下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

行为体的身份属性与其对所属群体的认同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社会认同理论、组织认同理论和国际关系建构主义这三种关于认同问题的主流理论，对此均予以认可。社会认同理论认为，源自个体对自我作为某个或某些社会群体的一员并由此获得相应的成员身份，以及由成员身份衍生并附着其上的认知的（cognitive）、价值的（evaluative）和情感的（emotional）内涵和意义，共同构成社会认同的核心内容。<sup>①</sup>组织认同理论同样强调认同发生过程中的身份因素，并认为组织认同的生成，主要基于个体身份与组织身份之间的契合度。这里的组织身份，可视为一个组织所具有的重要且相对稳定的特征。由于它是构成诸多个体共享的关于组织的认知模式，因而可为个体提供认知的和情感的基础。当个体感知到自我身份特征与组织身份特征存在一定的重合时，个体往往会产生对组织的归属感，即认同。个体对组织认同程度的高低，则取决于组织身份特征投射到个体身上所产生的重合范围的大小。<sup>②</sup>国际政治建构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理论。<sup>③</sup>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的“集体身份”，而集体身份的构建需要行为体重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界限，构建一个“共同的自群体身份”（in-group identity），

---

①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82, Vol.33, No.1, p.2; 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第476-477页；李明明：“国际关系集体认同的欧洲社会心理学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5期，第67页。

②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 Jane E. Dutton, Janet M. Dukerich and Celia V. Harquail, “Organizational Images and Member Ident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4, Vol.39, No.2, pp.239-263; Blake E. Ashforth, Spencer H. Harrison, Kevin G. Corley, “Identif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An Examination of Four Fundamental Quest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June 2008, pp.334-360; 国内关于组织认同理论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评述，可见苏雪梅、葛建华：“组织认同理论研究评述与展望”，《南大商学评论》，2007年第4期，第150-153页；宝贡敏、徐碧祥：“组织认同理论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1期，第39-44页；韩雪松：“西方组织认同理论对我国企业管理的启示”，《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5期，第152-155页，等。

③ 秦亚青：“译者前言”，载于[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2页。

或者称为群我意识。这种集体身份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其逻辑得出结论的过程，即认同（identification）。<sup>①</sup>由此可见，尽管三种理论在认同问题上的偏好不同，但三者无一例外地承认，个体的身份在行为体认同生成与演变过程中，具有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作用。

这种逻辑可以顺延至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之中。<sup>②</sup>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前提是，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亦属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范畴。据此并结合相关的认同理论，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可视为一个国家对该组织产生归属感心理状态。<sup>③</sup>国家因归属特定国际组织从而获得某种社会认同，或者说一种共享的/集体的表征（representation），它关乎国家的身份属性与国际组织属性之间的契合度。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程度，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过，由于受国家身份调整、国际组织构成要素变化、国际组织变迁以及外部环境变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水平及认同内容，也会发生相应地改变。国家身份具有多元维度，国际政治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主要包括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三种类型。<sup>④</sup>第一，国家的个体身份是其他身份生成的基点，往往以该国在文化、语言、历史、成就等方面的特性为基础。由于不同国家往往在上述方面具有较为显著的异质性，因而国家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被行为体视为区分自我和他者的重要因素。<sup>⑤</sup>第二，国家的角色身份存在于与他者的关系

---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329页。

②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文尝试从国家身份的视角理解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因而本文所使用的“国际组织”主要指“政府间国际组织”。

③ 这里所指的“国家”，主要包括组织正式成员国和具有观察员资格的非正式成员国两类。正式成员国无疑是国际组织认同的最主要行为体。此外，由于观察员国往往是组织内最具潜力发展成为正式成员国的对象，而且它们对国际组织的认同能否得到有效提升，是影响其未来是否选择正式加入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意义上，享有观察员资格的国家亦可纳入该分析框架中。

④ 需要说明的是，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归入”他者时才会形成所谓的集体身份。温特对此的界定过于严格，据此，国家间几乎不可能形成集体身份，故本文对集体身份不予讨论。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128页。

⑤ Ulrika Möller, *The Prospects of Security Cooperation: A Matter of Relative Gains or Recognition?*, Göteborg: Göteborg Studies in Politics, 2007, p.60.

中，是行为体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某一位置、并且以符合行为规范的方式与具有反向身份的行为体互动所形成的。<sup>①</sup>第三，国家的类属身份是由“具有社会内容或意义的相同特征”的多个行为体共同构建而成，因此，类属身份类型具有外在的社会向度与内在的文化向度。在国家体系里，类属身份的对应物是政权类型（民主国家、“集权国家”）和国家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sup>②</sup>当国家身份在一定时期内基本成型后，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国家往往追求国际社会行为体对自身国家身份予以必要的承认。为此，国家也会积极采取有助于强化身份认同的措施，以提高国家身份的稳定性。

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进程，是国家感知自身身份是否受到尊重，及国家身份与国际组织特征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的主要实践场域。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国家身份视角下关于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存在两个基本假设：第一，国家身份选择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首先，国际组织内不同国家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塑造而非决定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他们对国际组织的认同程度。换言之，同一组织框架下成员国之间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越小，他们对该组织的认同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较低。其次，国家相对于显著他者构建的角色身份会影响其对外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再次，在国家所拥有的诸多类属身份中，国家最为珍视的类属身份与特定国际组织特征之间的契合程度，影响国家对该组织的认同和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第二，在与国际组织的互动中，国家身份面临或预期面临弱化或强化的趋势，会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变化。这是因为，由于能否维持身份的相对稳定与连贯关乎国家的本体安全意识，因此，国家在社会互动中对自身身份得到强化或弱化的认知较为敏感，由此将在心理层面引发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变化。

由国家身份因素引发的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影响国家与特定国际组织的关系。由于认知、价值判断、情感等是构成认同的主要因素，因此，国家在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身份体验，至少在三个维度上将对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一，在认知维度上，认同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

---

①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22页。

② 同上，第221-222页。

的认知，具体包括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宗旨、规范、制度、功能、发展方向等的认知，及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评价等。积极的认同会促使国家对组织的认知朝着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方向发展，而消极认同可能产生认知偏差甚至错误认知。其二，在情感维度上，认同影响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情感投入。由于维持身份稳定是国家的一项内在需要，因而当国家在社会互动中遭遇焦虑、蔑视或羞耻等情感体验，且在威胁国家身份稳定性的情况下，<sup>①</sup>国家往往会减少对特定国际组织的情感投入，包括弱化对其与特定国际组织关系定位的情感表达，减少与组织其他成员国的高层互动，以及减少民间情感的官方宣传等。<sup>②</sup>反之，国家则会维持甚至追加对特定国际组织的情感投入。其三，在行为维度上，在国家感知到自身身份在社会互动中面临被强化的情况下，国际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对国际组织会展现出更加积极的认同。国际组织内的观察员国受此激励，可能采取追求成为正式成员的行为。与此相反，当国家身份在社会互动中面临被弱化的趋势时，国家对国际组织则会表现出消极认同。在此情况下，国家会通过身份管理策略改变现状，以维护和提高国家身份的显著性。<sup>③</sup>

总之，国家身份在国家对国际组织的认同中居于核心地位，不仅国家身份构建影响国家对特定国际组织的认同，而且在与国际组织成员国、特定国际组织及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中，一国国家身份及其（预期）面临强化或弱化的趋势，将引发国家对国际组织的积极认同或消极认同，进而在认知、情感与行为方面影响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下文将分别对蒙古国国家身份的构建、蒙古国国家身份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影响，以及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

① 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51-68页。

② 刘博文：“中国对周边中小国家的情感投入——双向逻辑与双重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97-109页。

③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第133-136页。

### 三、苏联解体后蒙古国国家身份的构建

苏联解体后，蒙古国面临的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蒙古国开启了国家身份重构的历史进程。而在此之前的 70 多年间，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长期处于苏联的实际控制之下并深受其影响，蒙古国始终未获得一种显著有别于他者且被国际社会予以广泛承认的国家身份。具体而言，这种由特定历史境遇塑造的身份特征，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蒙古国政治体系很大程度上被纳入苏联意识形态的框架，而且其经济高度依赖经济互助委员会。此外，在军事方面，蒙古国防政策和军事力量，被整合成为苏联全球军事战略的构成部分。尽管这一时期完全倒向苏联主要是基于维护生存、安全与发展等利益的考虑而做出的战略选择，不过，该战略产生的消极后果在于，蒙古国内政外交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主性。换言之，在苏联解体前，尽管蒙古国表面上拥有主权国家的身份，但实际上并未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sup>①</sup>由于采取全面追随苏联的政策，关于蒙古国的国家身份，外界曾一度视其为“苏联的第 16 个加盟共和国”“卫星国”和“附属国”等。

鉴于此，对国家身份进行重构与革新，成为冷战结束后蒙古国政府亟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这种内在需求主要受到以下三种因素的驱动。首先，蒙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欲摆脱以往对苏联过度依赖的局面，进而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现实诉求，需要从国家层面同步实现国家身份的转换予以有效配合。两者在相互构建进程中产生的合力，有助于蒙古国以焕然一新的国家形象参与国际事务。其次，蒙古国重构国家身份的需求，也与其 20 世纪 90 年代在国际体系深刻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具有密切关系。从苏联解体到 1992 年，叶利钦政府急于摆脱束缚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故对蒙古国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采取了疏远与冷漠的态度，由此导致蒙古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陷入了全面危机。由于一时无法准确定位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明确本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蒙古国国内弥漫着广泛

---

<sup>①</sup> 范丽君：“蒙古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综述”，《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1 年第 6 期，第 16 页。

的失落和焦虑情绪。再次，蒙古民族曾在历史上建立过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这种昔日荣耀与近代以来曲折复杂的历史遭遇对比所引发的巨大心理落差、怀旧情结甚至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促使蒙古国在冷战后重新审视自我并重构国家身份的重要原因。

为了消除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国际社会形成的有关蒙古国身份的僵化认知，同时赋予国家身份以积极的评价和情感体验，苏联解体后，蒙古国致力于构建在东亚地区和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身份，并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国家身份的显著性，旨在使蒙古国国内民众获得一种共享的国家尊严。<sup>①</sup>蒙古国国家身份的构建，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并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蒙古国初步建立起了在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这三个维度上国家身份所具有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身份的构建过程，并不具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侧面。下文将分别就蒙古国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的构建及其成效，进行具体分析。

### （一）蒙古国个体身份的构建

国家的个体身份是其他类型的身份生成的基础，往往基于国家的自我领悟，并以其在文化、语言、历史、成就等多方面的特性为基础。在这方面，蒙古国通过恢复传统宗教、构建民族共同体、复兴传统文字等具体措施，开展国家个体身份的构建活动。

首先，在振兴传统宗教方面，通过宗教复兴运动，推动以佛教为主导的宗教在国家文化中回归。尽管蒙古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宗教多元与并存的宗教信仰格局，不过，自1924年后，蒙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限制、批判和消灭宗教转而推行无神论的政策，导致其国内宗教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前几乎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sup>②</sup>苏联解体后，面对国内要求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日益高涨的呼声，蒙古国逐渐通过修缮宗教场所、成立宗教管理机构和民间宗教协会等措施，旨在提升宗教在

---

① 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比较研究”，《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第105-106页。

② “蒙古国国家与寺庙关系法”，图门其其格译，《世界宗教文化》，1999年第4期，第26页。

国家文化中的地位，由此导致国内宗教组织的数量从 1994 年的 24 家增加到 2010 年的 214 家。<sup>①</sup>与此同时，蒙古国于 1992 年和 1993 年相继颁布《蒙古国宪法》和《国家与寺庙关系法》。这两部重要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崇尚人民和睦的文化历史传统、以及尊重佛教在蒙古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等，予以确立和保障，使其成为国家个体身份的显著特征。

其次，蒙古国在语言文字方面加快推进去俄罗斯（苏）化的进程，以渐进的方式消除阻碍国家身份构建的不利因素。20 世纪 40 年代，蒙古国引入斯拉夫字母创制了西里尔蒙古文并强制推广。这一举措不仅打断了 1941 年刚刚确立的拉丁化文字改革方向，而且使此后蒙古国的文字和书写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sup>②</sup>为了有效改变这种状况，蒙古国政府于 20 世纪 90 年代做出了《关于组织全民学习传统文字活动》的决议，在全国范围内号召恢复使用回鹘体蒙古文。此后，蒙古国关于恢复传统文字的政策取向愈加明晰。2010 年，时任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再次下达关于恢复并扩大回鹘体蒙古文使用的命令，要求国家高级别官员在对外交流时所出具的公文和信函，必须使用回鹘体蒙古文。蒙古国还通过举办“蒙古文字日”等形式的活动，加强对传统蒙文的研究、推广和培训等，并予以大力支持。<sup>③</sup>

再次，蒙古国对以往因照搬苏联民族政策产生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除通过制定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以缓解民族矛盾外，蒙古国在少数民族聚集且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增加财政投入，以奠定国家认同的民族基础。<sup>④</sup>除了官方采取的民族国家构建措施外，不少蒙古国学者的研究对蒙古国国家个体身份的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蒙古国著名民族学家 S·巴达姆哈坦（С. Бадамхаган）通过考察成吉思汗墓葬、发掘古代先汗与贵族的墓地等实地调研方式，并结合对国内族群个案的深入研究，论证了喀尔喀蒙

---

① 王皓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蒙古国宗教风险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 年第 2 期，第 23 页。

② 冯福林：《蒙古国教育发展史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 5 月，第 40 页。

③ “蒙古国加紧恢复传统蒙文 有望与内蒙古语言相通”，环球网，2013 年 11 月 19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11/4576551.html>

④ 图门其其格、恩和：“蒙古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西北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第 204-205 页。

古人是蒙古民族主体和超越血缘与氏族关系的民族共同体。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做出了重要的奠基。<sup>①</sup>

蒙古国构建的个体身份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佛教为主要文化特征、以喀尔喀蒙古人为主体的，和以回鹘体蒙文为主要使用文字的独立主权国家。蒙古国推动个体身份转换的各项措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如宗教复兴运动不仅在恢复蒙古国传统文化、维护公共道德和缓解信仰危机方面具有积极意义，<sup>②</sup>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复兴宗教，蒙古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明显区别于苏联时期的文化氛围、民众精神状态和民族心理，进而在文化层面摆脱了苏联时期的国家个体身份特征。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促使蒙古国发生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其基本上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建构。在此过程中，蒙古国从具有深刻苏联烙印的国家，实现了向享有独特性和独立性的主权国家的嬗变。而且，不论在宗教、语言文字、民族构成等方面，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东欧国家等欧亚大陆国家相比，蒙古国的个体身份特征具有较高度度的显著性和识别度。蒙古国对于来之不易的个体身份珍视有加，并将其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在蒙古国国家安全政策中，涵盖基础文字、历史、文化、习俗等内容的“文明安全”，被置于与生存安全、政治安全同等重要的水平。<sup>③</sup>

## （二）蒙古国角色身份的构建

与国家赋予自身的个体身份特征不同，国家角色身份的形成往往有赖于与其他行为体的互动。蒙古国近代以来复杂曲折的历史遭遇、深处内陆的地理位置及居于两大国之间的战略地位、国家实力，以及实现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等，共同决定了其开展国际交往的主要行为体，是邻国和其他世界强国。因此，俄罗斯、中国、美国等成为蒙古国开展对外交往的优先对象，以

---

① 黄莹：“蒙古国民族学家 S·巴达姆哈坦与蒙古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建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 期，第 24-31 页。

② 图门其其格：“蒙古宗教组织现状及其社会影响”，《当代亚太》，2004 年第 10 期，第 62-63 页。

③ 欧德卡：《21 世纪蒙古国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12 月，第 56 页。

及角色身份构建的主要参照国。需要指出的是，蒙古国相对于上述国家的角色身份，首先是基于实力不对称而对其小国身份的自我认知。囿于自身的小国地位及因地处两大邻国之间，客观上给其造成的不安全感，促使蒙古国致力于突破小国-大国角色关系施加的束缚，以构建与地区和世界大国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

首先，相对于俄罗斯的角色身份而言，苏联解体后，双方互构的角色身份，经历了从睦邻传统伙伴（2003年）到战略伙伴（2009年）的转变，且目前两国正在朝着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在各领域积极开展务实合作。<sup>①</sup>在此过程中，两国已完成从具有较高同质性且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兄弟国家”，到政治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的身份转变。其次，相对于中国的角色身份而言，通过保持双方高层频繁互访，两国持续增信释疑。在此过程中，蒙古国与中国实现了角色身份的转化升级，两国的角色身份经历了四次具有标志性的更新，依次分别为：睦邻友好伙伴（1998年）、睦邻互信伙伴（2002年）、战略伙伴（2011年）和全面战略伙伴（2014年）。角色身份的不断升级，带动两国合作领域向政治、经贸与经济技术、军事安全、文化、科技与教育等领域不断拓展。再次，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角色身份而言，蒙古国将美国、日本、欧盟、韩国等视为自己的“第三邻国”，并在“第三邻国”框架内赋予各国不同的角色内涵，如美国的“政治与战略邻国”身份，日本的“经济邻国”身份和欧盟的“教育邻国”身份，并将印度、德国、加拿大作为自己的“精神邻国”并致力于发展为“全面伙伴”。<sup>②</sup>

尽管俄罗斯、中国和“第三邻国”均构成蒙古国角色身份中的重要他者，但这三组角色身份体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份特征。在蒙古国与俄罗斯的角色身份中，情感与积习的纽带作用体现得更为明显。蒙古国民间调查机构SMF财团的一项长期民调结果显示，从1997年至2014年，在被认为是蒙古国“最

---

① “普京：俄蒙两国正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之声，2014年9月3日，[http://sputniknews.cn/radiovr.com.cn/news/2014\\_09\\_03/276806337/](http://sputniknews.cn/radiovr.com.cn/news/2014_09_03/276806337/)

② [蒙]Saikhansanaa Khurelbaatar：“中立战略与蒙古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7年第2期，第68-69页。

合适的合作伙伴”行列中，俄罗斯连续多年稳居第一。<sup>①</sup>这不仅与蒙俄的历史亲密关系有关，而且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构建的适当角色身份相关。尽管在与“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中不乏功利主义特征，但与其他两类角色身份相比，其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浓厚的价值观色彩。如蒙、日在双边关系中均强调基于共同价值观开展国际合作，而美国更是对蒙古国的民主化改革成果不吝溢美之词。与上述两类角色身份不同，在与中国的角色身份中，由于受到特殊历史因素的影响，蒙古国对中国始终抱有警惕与戒备心理，以及难以释怀的民族主义情绪。<sup>②</sup>加上中国对蒙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因而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思维，在中蒙角色身份中居于主导地位。

也正是上述原因，在俄罗斯、中国和“第三邻国”之间维持角色身份的大体平衡，往往面临来自内在和外在的张力。蒙古国角色身份的构建与其外交政策相辅相成。正如后结构主义研究者所认为的，身份的重要性在于它构成了国家对外政策的一种前提条件，国家对外政策一定程度上取决对角色身份的话语表述，而角色身份同时又通过对外政策的形成和合法性而得以建构和再造。因此，身份和对外政策通过一个不断调整的叙事过程，实现相互影响和构建。<sup>③</sup>蒙古国目前奉行的以开放、不结盟、多支点和“第三邻国”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政策，与其相对于世界主要行为体构建形成的角色身份格局相辅相成。为了尝试在俄罗斯、中国与“第三邻国”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蒙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选择了无核国家和中立国身份。<sup>④</sup>不过，平衡与俄、中、“第三邻国”之间的角色身份关系，往往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张力。就蒙古国内部而言，民主党倾向于强化与“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认为这能够确保蒙古国有效实施平衡战略以避免潜在威胁；而人民党则认为，无论存在何种威胁，与邻国的角色身份都要比与“第三邻国”的角色身

---

① “普京访问蒙古 邀请蒙古国总统明年纪念卫国战争”，《环球时报》，2014年9月4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4-09/5127836.html>

② 华倩：“‘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研究”，《国际展望》，2015年第6期，第61-62页。

③ 孙吉胜：“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45-52页。

④ 李超：“蒙古国永久中立政策构想探析”，《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2期，第34-35页。

份更重要，只要与两个邻国保持正常关系就能够避免威胁。<sup>①</sup>就外部而言，俄罗斯、中国和美国分别基于各自的战略目的，不断强化与蒙古国的双边关系。这使蒙古国的角色身份格局承受着来自外部大国的压力，进而影响蒙古国的对外行为选择。

### （三）蒙古国类属身份的构建

蒙古国“集权国家”的类属身份，实际上属于由特殊历史情境造就的身份类型，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进行强制干预而形成的。苏联解体后，这一类属身份对蒙古国而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故亟须一种新的类属身份及其认同来加以替代。而促使蒙古国寻求新类属身份的诉求，既源自外部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同时具有内生的强劲动力。一方面，由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引发的民主扩散运动，构成蒙古国类属身份发生蜕变的外部助推力量。与 20 世纪的其他任何政治潮流相比，示范效应在 20 世纪末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具有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特别是地理上毗邻、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之间，这种作用体现得尤为明显。<sup>②</sup>受此影响，蒙古国涌现出包括姜巴·巴特蒙赫在内的一批活跃的民主启蒙思想家。由于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蒙古国发生了群众自发的民主运动。另一方面，蒙古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人民革命党主动放弃了其执政地位及“集权国家”的类属身份，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变为具有民族民主性质的政治组织，成为蒙古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的内生动力。在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蒙古国构建并采取多种途径，来强化“民主国家”这一新的类属身份及其认同，从而与其旧有身份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决裂。

蒙古国“民主国家”身份的属性，突出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首先，在政治方面，通过政治民主化改革，蒙古国实现了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向遵循三权分立原则的民主体制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总统制、多党制、议会（大呼拉尔）制和选举制为核心支柱的民主政治制

---

① [蒙]Saikhansanaa Khurelbaatar：“中立战略与蒙古国对外安全战略选择”，第 68-69 页。

② [美]塞缪尔·P. 亨廷顿：《第三波：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86 页。

度。就政党而言, 据统计, 截至 2016 年, 蒙古国共有包括蒙古人民党和民主党在内的 22 个政党。<sup>①</sup>而作为实现民主政治主要途径的政治选举, 从 1992 年到 2017 年, 蒙古国共举行总统选举 6 次, 国家大呼拉尔和省、市、县、区公民代表会议选举各 7 次。<sup>②</sup>其次, 在经济方面, 通过私有化改革, 蒙古国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从 1990-2000 年, 尽管推进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工作在各领域已全面铺开, 不过, 这一时期在蒙古国宏观经济形势方面并未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国内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状态。2004 年以来, 通过合理规划经济发展目标、调整经济结构、建立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等, 蒙古国保持了恢复性增长势头, 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比较平稳。<sup>③</sup>在蒙古国政府制订的 2007-2021 年发展总体规划中, 2016-2021 年经济年均增长目标不低于 12%, 人均 GDP 不低于 1.2 万美元, 并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sup>④</sup>在思想文化方面, 蒙古国同样改弦易辙, 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同时引入西方式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 如崇尚人权、自由与平等, 由此致使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实现了类属身份的民主化转向。

大部分蒙古国民众对国家构建的民主国家身份, 持有较高度度的认可。美国著名政治人类学家保拉·沙博洛夫 (Paula L.W. Sabloff) 通过对乌兰巴托和科布多民众开展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后认为, 在使蒙古国成为民主国家的诸多因素中, 认可度最高的三项依次分别为个人自由、由多党选举体制决定的代议制政府和崇尚人权, 认可程度依次是 56%、51% 和 40%。此外, 市场经济、法治等其他因素, 同样被认为是蒙古国民主国家身份的重要构成要素。<sup>⑤</sup>不仅如此, 而且有相当部分民众认为, 蒙古国民主国家的身份属性

---

① “蒙古国家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2016 年 12 月,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1206x0\\_676742/](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1206x0_676742/)

② 图美: 《当代蒙古国民主选举制度形成与变革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7 年 6 月, 第 57-59 页。

③ 黄健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 蒙古国经济》,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年, 第 75-81 页。

④ “数据简报: 蒙古国对外贸易统计及投资指南”, 中国经济网, 2014 年 8 月 21 日, [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408/21/t20140821\\_3400711.shtml](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408/21/t20140821_3400711.shtml)

⑤ Paula L.W. Sabloff, “Why Mongolia?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 Emerging Democracy”,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2, Vol.21, No.1, p.24.

与成吉思汗时代形成的传统政治文化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传承关系。他们认为，尽管成吉思汗并未培育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但其已将参与型政府、法治、公民平等、个人自由与人权等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主要核心理念融入其治域范围，这对现代蒙古国民主转型的顺利推进，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sup>①</sup>除民众外，蒙古国政府官员对其民主国家身份同样予以认可。如蒙古国人权委员会首席专员巴道尔吉·扎木斯楞在 2015 年指出，“回顾过去 25 年，不难发现，蒙古国作为一个国家，在民主转型、法治、启蒙和赋予其人权和自由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sup>②</sup>而蒙古国积极推动人权规范建设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于期待借此摆脱自身的身份劣势并确立积极身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国家获得身份积极性承认动机的强烈驱动下，倡助人权规范往往是国家积极追求身份的重要策略选择。<sup>③</sup>此外，蒙古国追求民主国家的身份不仅得到国内民众较高程度的拥护，而且在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获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sup>④</sup>

综上所述，蒙古国在苏联解体后开启的国家身份构建进程，已持续了近 30 年，包括个体身份、角色身份和类属身份在内的国家身份已基本成型并趋于巩固。在个体身份维度，蒙古国构建并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文化特征、以喀尔喀蒙古人为民族主体、以回鹘体蒙文为主要使用文字的独立主权国家。在角色身份维度，以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世界主要国家为参照，蒙古国逐渐明确了自身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身份。在类属身份维度，蒙古国完成了向民主国家类属身份的转换。国家身份确立后，国家往往会维护国家

---

① Paula L.W Sabloff, “Why Mongolia?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an Emerging Democracy”, pp.26-27.

② “‘2015·北京人权论坛’发言摘编”，人民网，2015 年 9 月 19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19/c1001-27606738.html>

③ 陈拯：“身份追求与规范建设——‘边缘大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动机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5 期，第 124-125 页。

④ Tsendendamba Batbayar,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Reform in Mongol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003, Vol.22, No.1, p.51; 王嘉伟：“冷战后美国对蒙古外交战略的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6 年第 8 期，第 12 页；“美媒：美国视蒙古为牵制好斗中国的可靠伙伴”，环球网，2012 年 8 月 8 日，<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2-08/3004503.html>

身份的稳定并追求其他行为体的承认，且倾向于采取有利于提升国家身份的策略，这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选择。

#### 四、国家身份对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影响

国家身份是影响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进而影响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重要因素，这在蒙古国国家身份的三个维度上均有体现。大体而言，首先，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制约了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其次，相对于俄罗斯、中国和“第三邻国”构建的角色身份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使蒙古国刻意与上合组织保持适当的距离。再次，蒙古国对其民主国家的类属身份面临弱化的担忧，成为阻碍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获得提升的深层原因。

##### （一）个体身份对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影响

尽管蒙古国与俄罗斯、中国和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曾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拥有诸多共享的个体表征。<sup>①</sup>不过，苏联解体后，它们长期处于蛰伏状态的个体属性充分凸显出来。为了构建显著有别于其他行为体的个体身份，各国的独特性进一步被有意放大与强化。虽然上述国家在构建个体身份的进程中采取的途径存在一些共通之处，不过，由于受历史传统和国家道路选择等因素的影响，蒙古国、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和俄罗斯各自构建的个体身份，在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进而一定程度影响了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各领域的关系。

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表现在语言、文化、历史、民族、风俗等多个方面。不过，鉴于宗教文化在国家个体身份中占据重要地位，故选择各国宗教文化属性方面的差别来说明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及其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历史发展中，蒙古国和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分别形成了氛围迥异的佛教文化、

---

<sup>①</sup> 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在个体身份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故为了简化讨论，本文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并各自展现出较高级度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不仅是国民对本民族主流文化的归属意识，而且是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进而塑造国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构建。<sup>①</sup>就中亚成员国而言，在独立以来的国家身份构建进程中，“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担当了‘去俄罗斯化’与‘国际化’的前驱，意味着一个国家自我识别的手段，一种将自身从莫斯科获取精神解放的工具，一种剥离共产主义体系和作为外国殖民统治的斯拉夫文化的门径”。<sup>②</sup>加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亚成员国推行的伊斯兰教“再政治化”政策产生的广泛社会效应，伊斯兰教对中亚各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成为其个体身份的显著标识。<sup>③</sup>与此类似，苏联解体同样引发了俄罗斯对其个体身份认同的审视与反思，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民族认同和文化归属的重构。俄罗斯国民中存在大量东正教追随者，在国家转型过程中，东正教不仅是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更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和国家身份认同的显著象征。<sup>④</sup>由此可见，中亚各成员国、俄罗斯和中国，与佛教文化在信仰与传统习俗、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蒙古国，在个体身份上具有明显的不同，这对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互动造成了消极影响。不过，由于蒙俄、蒙中之间具有较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消极影响尽管并未完全消除，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对他们之间关系产生的某些负面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在政治领域，蒙古国承认与中亚成员国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历史联系，故在苏联解体初期，蒙古国就与中亚成员国建立了官方层面的联系，不过，它们在政治领域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和协议，事实上有一部分并没有付诸相应的行动。除了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建立大使馆外，蒙古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政治交往水平较为有

---

① 詹小美、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政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第 28-30 页。

② 杨成：“去俄罗斯化、在地化与国际化：后苏联时期中亚新独立国家个体与集体身份的生成和巩固路径解析”，《俄罗斯研究》，2012 年第 5 期，第 94 页。

③ 孙静、罗锡政：“中亚伊斯兰教‘再政治化’：实质、原因及其影响”，《科学社会主义》，2014 年第 3 期，第 66 页。

④ 赵凤彩：“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国民信仰及自我认同”，《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 5 期，第 115-116 页。

限。<sup>①</sup>在经贸领域，蒙古国与中亚成员国不论在双边还是多边经贸合作层面均处于较低水平。就双边层面的合作而言，蒙古国在中亚成员国中优先发展与哈萨克斯坦的双边经贸合作，两国合作领域涵盖农业、工业、交通运输、旅游文化等领域，且比较重视东哈萨克斯坦州同蒙古国西部各省之间的区域性合作。<sup>②</sup>尽管如此，整体来看，蒙古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经贸合作水平滞后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水平。<sup>③</sup>就多边层面的合作而言，蒙古国主要借助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sup>④</sup>，并在此框架内与哈、乌、吉、塔就交通、能源、贸易政策和贸易便利化等开展经贸合作。该组织内部国家之间贸易政策互联程度很低，加上他们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并不显著，因而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的多边合作，同样难以摆脱成效不彰的处境。长期处于“政冷经冷”的境遇，也制约了蒙古国与中亚成员国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等。

整体来看，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之间的互动频率和互动质量，均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除了苏联以往执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政策阻碍了蒙古国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在各领域的联系，以及这些国家深居内陆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经济因素，决定了各自外交优先方向并非彼此而是俄罗斯、欧洲、东北亚和中东等地区和国家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蒙古国与中亚国家在个体身份上差异较大且对彼此了解不充分。蒙古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其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互动水平的差异，就是明证。蒙古国与哈萨克斯坦均有相当数量的哈萨克族人口，据 2010 年蒙古国人口普查显示，蒙古国境内有 10.1 万哈萨克族民众，占全国总人口的 3.68%。不仅如此，据蒙古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2009 年 6 月统计，共有 7.68 万包括非哈萨克族在内的蒙古国民众申请变更国籍，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另有 4.6 万人持有蒙哈双重国籍。<sup>⑤</sup>加上这些跨境民族之间存在亲缘关

---

① Mendee Jargalsaikhan, “Factoring Mongolia’s Non-Membership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Voices from Central Asia*, July 2012, No.3, pp.2-3.

② “蒙古愿扩大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伊里旦·伊斯哈科夫译，《中亚信息》，2004 年第 3 期，第 33-34 页。

③ “哈萨克斯坦与蒙古强调提升两国经贸关系的必要性”，中国经济网，2007 年 8 月 14 日，[http://www.ce.cn/xwzx/gjss/gdxw/200708/14/t20070814\\_12538156.shtml](http://www.ce.cn/xwzx/gjss/gdxw/200708/14/t20070814_12538156.shtml)

④ 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⑤ Mendee Jargalsaikhan, “Factoring Mongolia’s Non-Membership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5, note 6.

系，因而使蒙哈两国在个体身份上具有一些共同特征，这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而吉尔吉斯斯坦尽管与蒙古国不存在数量较大的跨境民族，但吉尔吉斯斯坦相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较为开放的国内社会与经济生活，与蒙古国个体身份中的一些特征相契合，对于两国之间的社会互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过，蒙古国与中亚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整体上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制约了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归属感。

## （二）角色身份对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影响

在与邻国、“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互构中，囿于自身实力，蒙古国致力于在与邻国和“第三邻国”维持角色身份相对平衡的同时，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属性。“第三邻国”概念及其政策取向，既有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一面，也有针对美国的含义。通过实施“第三邻国”政策，蒙古国欲摆脱过度依赖某一大国的局面。正如蒙古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指出的：“与俄罗斯、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发展方向。蒙古国不会采取倒向哪一边的政策，而是与二者保持平衡的关系并与他们开展睦邻合作。之所以如此，传统关系和经济合作的特殊属性均考虑在内。”<sup>①</sup>不过，维持与显著他者角色身份格局的相对平衡往往面临压力。因此，管控在大国之间的角色身份，影响着蒙古国处理与上合组织的关系。

1993年，蒙古国领导人对俄开展的破冰之旅，是两国角色身份重构的历史起点。直到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后，俄罗斯才将蒙古国视为“老朋友”和“可靠伙伴”，以恢复两国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获得明显改善，这一时期可视为两国角色身份相互调整与适应的阶段。2009年，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0年双方恢复到了苏联时期建立起来的合作水平。<sup>②</sup>俄罗斯积极发展与蒙古国的关系，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重视蒙古国在俄罗斯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防止

---

① Edgar A. Porter, “Mongolia, North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eking the Right Balance”,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2009, [http://en.apu.ac.jp/rcaps/uploads/fckeditor/publications/journal/RJAPS\\_V26\\_PorterE\\_df.pdf](http://en.apu.ac.jp/rcaps/uploads/fckeditor/publications/journal/RJAPS_V26_PorterE_df.pdf), p.8.

② 范丽君、李超：“俄蒙关系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东北亚学刊》，2016年第3期，第13页。

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俄罗斯的前沿阵地。二是重视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并试图将其纳入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进而摆脱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经济恢复乏力的困境。同时，俄罗斯对蒙古国的政策取向，也契合蒙古国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国内经济的诉求。

就蒙古国与中国的角色关系而言，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且趋于紧密。近年来，中蒙关系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蒙俄、蒙美双边关系的发展速度。除政治互信增强外，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也不断扩大，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2017 年，蒙古国对华贸易总额就达到 67.35 亿美元，较上年了增长 35.8%。<sup>①</sup>由于蒙古国将中俄视为其外交优先发展方向，故三国在多边框架内的合作日益紧密，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机制和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等积极推进。

中俄两国均支持蒙古国进一步提升与上合组织的合作水平，对于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具有积极作用。俄罗斯在蒙古国还未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时，就对蒙古国积极参与组织事务表示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与蒙古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还就一些重大问题协调立场。<sup>②</sup>中国同样希望蒙古国进一步强化与上合组织的关系。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中蒙俄元首第四次会晤时表示，需“提升蒙方同上海合作组织关系水平，欢迎蒙方更加深入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合作”。<sup>③</sup>基于与邻国的角色身份，蒙古国对上合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不过，这种认同更多是基于工具理性主义动机。在参与上合组织事务过程中，蒙古国更看重上合组织为其带来的物质收益，如积极举办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会议等。蒙古国对 2014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6+5”会晤反响热烈，因为该机制旨在为组织成员国与观察员国之间搭建合作的平台。蒙古国表示希望该会晤保持机制化运作模式，并制定成员国与观察员国之间

---

① “中国同蒙古国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8 年 6 月，[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sbgx\\_676744/](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sbgx_676744/)

② 李超、杨恕：“缘何蒙古国未正式加入上合组织”，第 73 页。

③ “习近平主持中俄蒙元首第四次会晤”，2018 年 6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xgxw\\_676746/t1567385.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740/xgxw_676746/t1567385.shtml)

的中长期合作规划。<sup>①</sup>因此，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的基础不是很稳固。除受到获益分配的影响外，蒙古国与“第三邻国”的角色身份，也对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具有一定的影响。

美国的蒙古国政策，大体经历了从地缘文化到地缘安全，再到地缘政治的演变历程。由于奥巴马政府对外反恐投入整体缩减，美国对蒙古国的政策也进行了相应调整，更加强调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综合施策。因此，美国的蒙古国政策呈现显著的地缘政治特征，强化蒙古国在抵消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力方面的作用。在奥巴马上台伊始，美国学界就出现了呼吁美国政府反思与调整对蒙古国政策的呼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斯蒂芬·诺尔波(Stephen E. Noerper)提出的“蒙古国行动计划”(Mongolia Action Plan)，该计划主要包括：(1) 升级美蒙关系；(2) 提高对蒙经济支持、教育交流和制度建设；(3) 支持蒙古国实施其新战略的能力；(4) 支持蒙古国在地区安全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促进其与韩国、中亚地区的联系；(5) 支持蒙古国新经济倡议，包括提高对该国的直接投资。<sup>②</sup>同时，该计划还体现出美国对中国在蒙古国经济影响力持续增事实，奥巴马政府的对蒙政策与上述计划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时任国务卿希拉里 2012 年 7 月访问蒙古国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传递美国支持“中国影响力持续增强的地区”的民主这一明确信号。<sup>③</sup>与此同时，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对蒙古国各怀心思的强大邻国，表现出对中俄的不信任和戒备心理。<sup>④</sup>总之，美国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与外交等各方面，将蒙古国纳入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战略体系之中。在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俄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美国的蒙古国政策难以突破地缘政治思维。

蒙古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及地缘政治合作伙伴关系，很大程度上削弱了

---

① 王浩：“中俄蒙合作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191 页。

② Stephen E. Noerper, “Land of the Rising Khan: Moving the United States Forward on a Mongolia Action Plan”, 2009,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60528051.pdf>, pp.22-24

③ “希拉里访问蒙古国 赞‘中国邻居’民主制度”，环球网，2012 年 7 月 10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07/2899953.html>

④ Alicia Campi, “The Message Behind Secretary Clinton’s Trip to Mongolia”, *Asia Pacific Bulletin*, July 26, 2012, No.174, <https://scholarspace.manoa.hawaii.edu/bitstream/10125/23302/1/APB%20no.%20174.pdf>

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于上合组织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美国部分人士秉持地缘政治思维，将上合组织视为大国竞争的产物。换言之，他们认为上合组织是中国和俄罗斯为反对美国而建立的组织。当然，也有观点承认上合组织的存在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以及美国与上合组织在一些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可能，因而其未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尽管如此，但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对上合组织内部利益多元化、能力不足等做出的判断，这与出于对组织目标、理念和价值等认可做出的判断具有天壤之别。因此，在美国看来，上合组织在多个方面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主要包括阻碍美在中亚地区推进民主化，不利于美国民主价值观的扩散，妨碍中亚国家的自由选择等。<sup>①</sup>美国关于上合组织认知中的地缘政治思维，与其蒙古国政策的地缘政治思维，具有较高度度的契合。因此，美国对于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合作水平的提升始终心怀疑惧。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对蒙古国具有物质资源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美国经历15年漫长时间才确认两国的“第三邻国”角色身份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制衡中俄和传播“民主价值观”的需要。<sup>②</sup>对蒙古国而言，鉴于与邻国实力的不对称性，其也需要引入美国的力量，以缓解因处于两大邻国之间客观上给其带来的不安全感。<sup>③</sup>在此情况下，出于对蒙古国与美国关系受损的顾虑，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始终刻意保持适当的距离。

### （三）类属身份对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影响

蒙古国“民主国家”的类属身份，对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自身的“民主国家”身份，蒙古国学者蒙迪·杰戈尔赛罕（Mendee Jargalsaikhan）认为，蒙古国是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能自信

---

① 赵华胜：“美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从布什到奥巴马”，《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第33-35页。

② 1990年时任国务卿贝克（James Addison Baker III）首次提出“第三邻国”概念，直到2005年美国总统小布什访蒙期间才正式予以确认。之所以经历如此漫长的时期，主要在于美国制衡中俄、传播“民主价值观”和对蒙古国物质资源的需求。参见王建军：《蒙古与美国的关系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117-125页。

③ 马立国：“既是平衡也是被制约：蒙古国‘第三邻国’外交战略探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2-15页。

地宣布自己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尽管吉尔吉斯斯坦也开启了民主化进程，但蒙古国的民主进程更加坚定和平静。<sup>①</sup>另一位学者图格斯宝尔干毫不忌讳地批评中亚国家所谓的“中亚特色的民主道路，因为没有公平选举、透明的政府和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其实质仍是民主原则的退步”。<sup>②</sup>基于这种认知，蒙古国流露出对自身“民主国家”身份的自豪感与优越感，不仅使其与距离民主政治精神尚远的中亚国家相提并论心存抵触，而且基于相近的价值观，致力于发展与西方民主国家的亲密关系。

此外，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分别应对上合组织与欧安组织社会化的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了类属身份对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影响。在欧亚大陆，存在诸如北约、欧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安组织和上合组织等多个影响地区安全规范的国际组织。这些既存的地域性国际组织，在关于国际和国内安全政策的理念、信念、规范和实践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话语竞争。<sup>③</sup>相对其他国际组织而言，由于欧安组织和上合组织具有更为清晰和明确的规范议程，以及其相对于北约、集安组织而言具有较弱的军事联盟色彩，因而其社会化的范围广泛弥散于欧亚大陆，并在这些国家中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化效应。尽管欧安组织和上合组织均致力于对蒙古国和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进行社会化的尝试，不过，这两个国际组织试图推进社会化的努力，却在中亚成员国和蒙古国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简言之，欧安组织在中亚成员国中并未实现该组织的社会化目标，然而却在蒙古国实现了其目标；而上海合作组织对中亚成员国的社会化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在蒙古国，该组织的社会化效果并不理想。

蒙古国和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类属身份上的差异，是欧安组织与上合组织社会化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欧安组织的社会化效果而言，由于安

---

① Jargalsaikhan, “Factoring Mongolia’s Non-Membership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3. 转引自李超、杨恕：“缘何蒙古国仍未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第85页。

② T. Tugsbilguun, “Democracy in Central Asia: Authoritarian Regimes or Hybrid Regimes? ”, *The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3, No.18, pp.125-126. 转引自李超、杨恕：“缘何蒙古国仍未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第85页。

③ David Lewis, “Who’s Socialising Whom? Regional Organisations and Contested Norms in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12, Vol.64, No.7, p.1219.

全合作机制被西方国家视为不仅是在国家层面有效管理国家间军事竞争的产物，而且更是国家之间为有效应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挑战所做的制度安排。基于这种理解，欧安组织在社会化进程中，有意无意地将安全议程涵盖的领域向目标国家的内部事务拓展，惯于采取与目标国的国内人权状况、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相关联的社会化模式。在欧安组织的规范话语体系中，居于核心的是人权、民主、自由等话语。中亚成员国尽管曾经试图推进国内民主化改革，但整体上并未触及威权主义的国家类属身份。欧安组织的社会化进程，对中亚成员国类属身份的维持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不仅对中亚国家普遍珍视的主权原则构成了挑战，而且由于遭到地方精英的反对，导致这些国家国内经济与政治改革步履艰难。由此产生的隔阂与对立，成为西方国家与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源头。<sup>①</sup>与此相反，由于蒙古国“民主国家”的类属身份，与欧安组织倡导的社会化话语体系具有较高的契合度，该组织的社会化措施不仅为蒙古国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而且有助于其类属身份的维护与提升，故欧安组织的社会化在蒙古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由此导致的结果是，2004年蒙古国成为欧安组织亚洲伙伴国，2012年8月，欧安组织同意吸收蒙古国为正式成员国。

与欧安组织采取的社会化路径不同，上合组织的社会化叙事话语将国家主权置于组织规范体系的核心位置，强调国家在经济政策、政治发展和冲突管理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上合组织并不寻求在推动国内民主化和国际安全合作之间建立关联。在此意义上，基于国家边界神圣性的信念，上合组织在促进中亚成员国政权稳定的同时，强化了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上合组织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规范框架，并且利用话语权力使一些规范合法化，同时削弱其他规范的合法性。此外，构成性权力（constitutive power）在上合组织塑造意义、议程和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定的国家行为被合法化，其他行为被视为不适当、社会不能接受或与成员国共同接受的规范相抵触。<sup>②</sup>而欧安组织的社会化路径更类似于学者强调的一个强有力的霸权国家通过说服、强制等手段社会化较弱小国家。

---

① David Lewis, “Who’s Socialising Whom? Regional Organisations and Contested Norms in Central Asia”, pp.1222-1223.

② Ibid, pp.1224-1226.

即使没有地区或全球霸权国家，“关键国家”（critical states）或“关键组织”在产生“规范”（norm cascade）中减少规范碎片、吸纳规范追随者过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sup>①</sup>与此不同，在上合组织的规范互动中，不存在明显的规范传播者和竞争者。上合组织通过复杂的峰会文本协商，通过精心挑选语言等，使文本的语言协商在界定成员国对组织的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作用。<sup>②</sup>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蒙古国出于对自身的“民主国家”类属身份的维护，对上合组织提升权威主义规范心存疑虑，而对欧安组织的社会化却坦然接受。欧安组织期望中亚成员国接受其自由主义的规范性框架这一目标，没有实现。中亚成员国基于自身的类属身份，更倾向于接受上合组织基于多边互动的社会化模式。<sup>③</sup>

综上所述，蒙古国囿于其个体身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存在较大差距，担心角色身份格局之间出现失衡，以及出于对自身类属身份的维护，自 2004 年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以来，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在此基础上，蒙古国发展与上合组织的关系很大程度基于对成本-收益的权衡。蒙古国重视参与上合组织框架内合作所获得的物质收益，主要关心与经济有关的合作事项，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和过境交通等。曾有日本学者指出，蒙古国更希望发展与美、日等“第三邻国”的关系，因此并不看重“上海精神”。<sup>④</sup>

## 五、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前景

上合组织 2017 年首次扩员后，蒙古国与上合组织的关系发生了些许变化。蒙古国总统哈勒特马·巴特图勒嘎（Khaltmaa Battulga）在 2018 年青岛峰会期间表示，“蒙古国正在对本国是否应提升参与上合组织活动的水平进

---

① Thomas Ambrosio, “Catching the ‘Shanghai Spirit’: How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Promotes Authoritarian Norms in Central Asia”, *Europe-Asia Studies*, 2008, Vol. 60, No.8, p.1323.

② David Lewis, “Who’s Socialising Whom? Regional Organisations and Contested Norms in Central Asia”, p.1228.

③ Ibid, p.1220.

④ T.Tugsbilguun, “Doe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Represent an Example of a Military Alliance?”, *The Mongo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8-2009, No.15-16, p.91.

行可行性研究，该议题也已在本国的政界和社会中引起广泛讨论”。<sup>①</sup>尽管从官方最新表态来看，蒙古国是否选择加入上合组织的前景目前仍不明朗，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较以往蒙古国持有的较为审慎的态度相比，蒙古国总统的这次表态更为积极，这意味着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态度发生了细微变化。这与蒙古国在 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举办的关于上合组织的高级别讨论具有密切联系。2018 年 5 月，为了进一步明晰与上合组织的关系及前景，蒙古国举办了主题为“蒙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地位与该组织发展前景”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来自蒙古国不同部门和领域，而总统和外交部部长的亲临，体现了蒙古国对此次会议的高度重视。此后不久，蒙古国大呼拉尔举行了由总统和总理共同参加的非例行闭门会议，再次对这一议题进行集中讨论。<sup>②</sup>尽管讨论的详细内容外界暂时无从知晓，不过，如此密集地商讨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之间的关系至少表明，蒙古国开始尝试朝“积极参与，缩小距离”的方向，密切与上合组织的关系。对于蒙古国表现出来的积极变化，习近平主席指出，“蒙古国是上海合作组织首个观察员国，中方支持蒙方提升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水平”。<sup>③</sup>作为回应，巴特图勒嘎表示，“蒙方愿努力提升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水平”。<sup>④</sup>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同样对蒙古国的积极态度表示赞赏，时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曾表示，哈方“全力支持蒙古国参与上合组织工作”。<sup>⑤</sup>

蒙古国对上合组织态度的变化，与其近些年对上合组织的认同程度有所提升有关。近年来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互动，增进了蒙古国对各方角色的认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内的大国

---

① 李超：“蒙古国何时能加入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行列？”，2018 年 6 月 30 日，[http://dunjiaodu.com/xinxingguojia/2018-06-30/3083\\_2.html](http://dunjiaodu.com/xinxingguojia/2018-06-30/3083_2.html)

② “President Attends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ongolia’s Participation’”,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https://president.mn/en/2018/05/28/president-attends-discussion-on-sco/>

③ “习近平晤伊朗白俄罗斯阿富汗蒙古四国总统”，《解放日报》，2018 年 6 月 11 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8-06/11/content\\_88280.htm](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8-06/11/content_88280.htm)

④ “习近平会见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新华网，2018 年 6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883.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0/c_1122964883.htm)

⑤ “纳扎尔巴耶夫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哈通社，2018 年 6 月 10 日，[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284129](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284129)

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角色身份趋于稳定,提高了蒙古国与相关国家对彼此行为的可预期性,为开展地区合作持续增信释疑。通过参与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等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效缓解了蒙古国国内对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些错误认知,而且也进一步密切了与俄罗斯的角色关系。其二,蒙古国与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在各领域的合作有明显提升,为他们之间的角色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2018年4月,蒙古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大使馆,这是继2014年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领事馆后,两国关系发展的又一突破。这也是继哈萨克斯坦外,蒙古国在中亚设立的第二个大使馆。2018年,蒙古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包括水果、蔬菜等在内的农产品贸易和汽车贸易方面进一步加强了联系。<sup>①</sup>2019年4月10日,蒙古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进行政策协调,以促进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sup>②</sup>整体而言,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互动更趋活跃,有助于提升蒙古国对该组织的认同水平。

在此背景下,蒙古国正式加入上合不仅被相关国家寄予了较大期望,且有利于蒙古国各领域的发展,同时对上合组织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就加入上合组织对蒙古国的积极影响而言,首先,在处理与大国关系方面,蒙古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可得到更有效的调适。加入上合组织不仅在安全上有助于缓解蒙古国对其北方面临战略压力的一贯担忧,而且在经济上,蒙古国“草原之路”战略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均可进行有效对接,进而有助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其次,有助于加强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在各领域的联系。尽管中亚成员国与蒙古国地理位置相近,但这些国家始终未能成为蒙古国的外交重点。而加入上合组织,有助于双方加强在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水平。

其二,就其成为正式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积极影响而言,首先,在成员国构成方面,将使上合组织在涵盖地域上连接成为一个没有空白版图的地理整体,并将赋予上合组织崭新的国际形象和象征意义。其次,在地区合作方

---

① 李超:“蒙古国何时能加入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行列?”,2018年6月30日,[http://dunjiaodu.com/xinxingguojia/2018-06-30/3083\\_2.html](http://dunjiaodu.com/xinxingguojia/2018-06-30/3083_2.html)

② “Tashkent to Host Uzbekistan-Mongolia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the Government Portal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April 10, 2019, <https://www.gov.uz/en/events/view/515>

面，蒙古国的加入将使上合组织在地区基础设施联通、国家间政治与战略互信、区域经济合作、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实现合作共赢。总之，蒙古国的加入将使上合组织在创建国际合作模式、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提供更加丰富的非西方经验素材。

当然，蒙古国加入上合组织，也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达成有效共识的难度可能进一步增大，上合组织的工作机制需作相应的调整等。不过，这些可以预见的问题也是其他国际组织在扩员过程中或多或少遇到的现实困扰，需要各方秉持“上海精神”，并在此指引下群策群力，由此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有望通过机制化途径得到缓解甚至有效解决。此外，尽管蒙古国加入上合组织的意义深远，但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其目前仍面临的一些阻碍因素。这主要源自蒙古国国内的一些顾虑，包括如何避免与两大邻国和“第三邻国”之间在角色互动中出现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如何确定自身在上合组织中的地位，及如何处理加入上合组织给蒙古国国家身份维持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等。此外，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蒙古国“第三邻国”外交的重要对象，因而它们对蒙古国加入上合组织可能表现出的强烈反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不确定性后果，也是蒙古国在选择是否加入上合组织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考虑因素。美国虽不太可能对蒙古国加入上合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至少会造成一些干扰。

在此情况下，上合组织需通过多种途径，进一步提升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水平。从国家身份的视角出发，大体可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在个体身份方面，坚持尊重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尊重不同成员国在个体身份上的差异，促使成员国之间对彼此的个体身份理解和相互接受。鉴于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是中亚成员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及表现在文化认同上的深层差异，制约了蒙古国对上合组织认同的提高。因此，在“尊重多样文明”这一上合组织对待成员国文化差异基本态度的基础上，需要通过机制化途径，促使国家之间文化认同上的差异为各方所接受与理解。具体措施可以包括：建立跨国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的科学研

究合作机制，以及加强多元文化认同国际化平台建设等。<sup>①</sup>

第二，在角色身份方面，尽管蒙古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尤其是中亚成员国的角色互动进程明显加快，不过，这种互动仍处于较低水平，进而导致蒙古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社会互动中未能有效构建一种共享的集体表征，即各成员国并未将自身与其他成员国视为“想象的共同体”。此外，由于中亚成员国之间在边界、水资源、能源、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导致他们之间关系并不顺畅，使他们并未形成深层次的地区认同，进而限制了上合组织整体认同水平的提高。鉴于此，上海合作组织需要在观察员国与正式成员国之间建立机制化交流平台，加强各方在政治、经济与人文交流方面的交往与合作，促进角色身份的构建进程。

第三，上合组织需给予蒙古国“民主国家”类属身份必要的尊重与承认，增强蒙古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上合组织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注意满足蒙古国对其“民主国家”身份获得尊重和承认的心理需要，避免因忽视或挑战蒙古国这一身份而影响其对上合组织的认同。诚如阿克塞尔·霍纳特（Axel Honneth）所言：“尽管政治承认的符号不足以为跨国合作创立一个牢固的基础”，不过，承认国家的“文化产品与历史成就”就表明注意到了“跨国信任建立的情感根源”，从而为跨国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sup>②</sup>为此，在认知层面，上合组织需要及时澄清蒙古国的存疑之处，防止蒙古国对上合组织产生认知偏差或错误认知。如蒙古国部分人士担忧，扩员后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时是否依然遵循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及在相毗邻地区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条款是否会一贯遵循等。另外，还需明确蒙古国加入上合组织后的地位安排和充当的角色。此外，上合组织需要对蒙古国进行必要的官方和民间情感投入，增强其对上合组织的归属感和与其他成员国的“我们感”。

作为小结，本文从国家身份的视角出发，考察了蒙古国在转为正式成员国所需的客观条件均已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并未选择加入上合组织的原因，以

---

① 孙玉华、彭文钊、刘宏：“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合作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6期，第52-55页。

②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between States: on the Moral Substra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omas Lindemann and Erik Ringmar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Boulder: Paradigm, 2011, p.36. 转引自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第154页。

及扩员后蒙古国对上合组织态度出现微妙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就蒙古国与上合组织关系的前景作了展望。需要说明的是，对上述问题从国家身份的视角予以考察，并不意味着否定其他层面的解释因素，而是对其他解释路径的一种补充与完善。此外，内部成员对国际组织的认同，仍然是一个值得开展系统研究的议题，因为不少国际组织，尤其是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均会不同程度地遭遇认同困境，这些认同困境的存在，成为制约国际组织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

---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affects a country's identification with specific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uring intera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national identity (expected) will be weakened or strengthened, which will affect a country'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n affect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ongolia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erms of individual identity, role identity and type identity. The emphasis on the stability of content and meaning of the new national identity hinders the improvement of Mongolia's identification level with the SCO, which causes no breakthrough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 and the SCO for a long time. Firs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ndividual identity between Mongolia and the SCO member states restricts its level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CO. Secondly, Mongolia keeps a proper distance from the SCO due to its role identity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ir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heir inherent tension. Third, Mongolia's concern about the weakening of its democratic status as a member state has become a deep-rooted reason hindering the improvement of i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CO. After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 Mongolia has adopted an attitude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narrowing the distance", trying to improve its relations with the SCO.

**【Key Word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ongolian Diplomacy, Mongolian National Identity, Mongolian Social Identity

**【Аннотац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влияет на признание страной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а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ожидаемая), сталкиваясь с тенденцией ослабления или усиления, влияет на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ризн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оказывает влияние на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онкретны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Монголия стремилась к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ролев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и обще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Забота о новом содержании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траны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его значения повлияли на повышение Монголией уровня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с ШОС,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отсутствию долгосрочного прорыва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Монголией и ШОС. Во-первых, существен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между Монголией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членами ШОС ограничивают её уровень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с ШОС; во-вторых, Монголия держится на должном расстоянии от ШОС из-за ролев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с соседн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треть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и внутренней напряжённости между ними; в-третьих,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Монголии по поводу ослабления её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статуса в качест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члена стало глубоко укоренившейся причиной, препятствующей повышению уровня её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с ШОС. После расширения ШОС Монголия, придерживаясь позиции «активного участия, сужения дистанции», пытается укрепить сво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ШОС.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ШОС,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ци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Монголии

---

(责任编辑 肖辉忠)